

國立國會

31.1.17

圖書館

# 政法研究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毛澤東

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蘇特輯（七篇）

史良等

從國際法論和平共處的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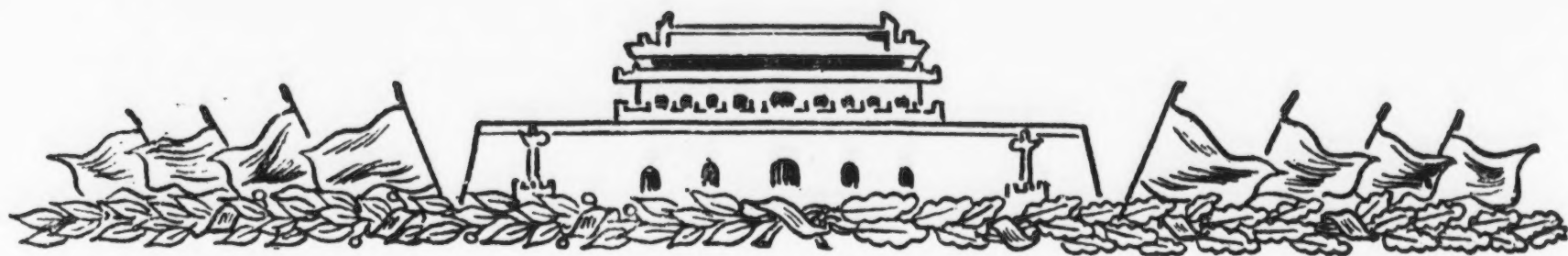
周鯁生

朝鮮停戰協定的法律觀

波蘭 穆斯克特

6

一九五五年



#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一）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市委和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

迎接和配合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新高潮……………編者（二）

對蘇聯司法工作的幾點體會……………史良（三）

訪問蘇維埃法院的幾點體會……………曾漢周 何蘭階 林亨元（二六）

蘇聯檢察機關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劉惠之（二〇）

蘇聯司法幹部是優秀的，幹部工作的經驗是豐富的……………王懷安（二三）

蘇聯律師的工作與組織……………王汝琪（二四）

訪 蘇 特 輯  
蘇聯的法律教育……………毛鐸（二六）

蘇聯的法律科學研究工作……………郭綸（三）

從國際法論和平共處的原則……………周鯁生（三七）

朝鮮停戰協定的法律觀……………波蘭 穆斯克特（四一）

人民審判員卡梅柯夫同志的工作經驗……………蘇聯 耶·伊林娜（四四）

（大誠譯）

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建國（四八）

——北京市司法工作實踐中的經驗——

關於檢察機關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幾點初步體會……………金珂（五〇）

我國訴訟制度中實行民族語言原則的重要意義……………時偉超 楊蓉馨（五四）

書刊評介  
介紹「蘇維埃勞動法教程」……………關 懷（五五）

學術動態（三則）

編輯者：政法研究編輯委員會  
北京東四王駙馬胡同三號 電話：4.4351

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北京東四老君堂九號 電話4.4383

總發行處：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全國各地郵局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 政法研究

（雙月刊）

一九五五年第六期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本期印數：25,480



#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和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

毛澤東

一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羣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却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羣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後退。運動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幹部中和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幹部和農民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前進的，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農入社，不照顧貧農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強迫富裕中農入社，侵犯他們

的利益。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進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進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大胆指導運動，不要前怕龍，後怕虎。幹部和農民在自己的鬥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幹。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前怕龍後怕虎的態度不能造就幹部。必須由上面派出大批經過短期訓練的幹部，到農村中去指導和幫助合作化運動；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幹部也要在運動中才能學會怎樣做工作。光是進了訓練班，聽到教員講了幾十條，還不一定就會做工作。

總之，領導不應當落在羣眾運動的後頭。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羣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 二

現在，全國合作化運動已經在大規模進展中，我們却還需要辯論這樣的問題：合作社能不能發展呢？能不能鞏固呢？就某些同志來說，看來問題的中心是在他們憂慮現有的幾十萬個半社會主義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幾戶）合作社能不能鞏固。如果果不能鞏固，當然談不到發展。某些同志看了過去幾年合作化發展



的歷史還是不相信，他們還要看一看一九五五年這一年的發展情況怎麼樣。他們也許還要在一九五六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鞏固了，他們才會真正相信農業合作化是可能的，他們也才會相信我黨中央的方針是正確的。所以，這兩年的工作很要緊。

為了證明農業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黨中央對於農業合作化的方針的正確性，我們現在就來談一談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也許不是無益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我黨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後，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那時，在江西是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在陝北是變工隊，在華北、華東和東北各地是互助組。那時，半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也已經個別地產生。例如，在抗日時期，在陝北的安塞縣，就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不過，這種合作社在當時還沒有推廣。

我黨領導農民更廣泛地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在互助組的基礎上開始成批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到現在，又已經有了差不多六年的歷史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黨中央做出第一個先向地方黨組織發布並且在各地試行的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草案的時候（這個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報紙上以正式決議的形式發表），已經有了三百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過了兩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黨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決議的時候，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發展到一萬四千多個，兩年時間增加了四十六倍。這個決議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時候，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一萬四千多個，發展到三萬五千八百多個，即只準備增加一倍半，而其結果，這一年却發展到了十萬個合作社，成為一萬四千多個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黨中央決定，由十萬個合作社增加五倍，發

展到六十萬個合作社，結果完成了六十七萬個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為止，經過初步整理之後，縮減了兩萬個社，留下了六十五萬個社，較計劃數字超過了五萬個社。入社農戶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九萬戶，平均每社二十六戶。

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幾個解放較早的省份。在全國大多數解放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經建立了一批農業生產合作社，安徽、浙江兩省建立的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數目還不很多。

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戶，有的一百多戶，有的達到幾百戶。

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會主義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發展成了社會主義的高級社。

同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同時，我國已經有了少數社會主義的國營農場。到一九五七年，國營農場將達到三千零三十個，耕地面積將達到一千六百八十七萬畝。其中，機械化農場將達到一百四十個（包括一九五二年原有的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增加的），耕地面積將達到七百五十八萬畝，非機械化的地方國營農場二千八百九十七個，耕地面積將達到九百二十九萬畝。國營農業在第二第三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將有大規模的發展。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黨中央決定，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一百萬個。這個數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萬個社比較，只增加三十五萬個，即只增加半倍多一點。我覺得似乎少了一點，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萬個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萬個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國二十幾萬個鄉，除了某些邊疆地區以外，每鄉都有一個至幾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作榜樣。這些合作社，過一兩年就有經驗了，就成了老社了，別人就會向它們學習了。由現在到一九五六年十月秋收以前，還有十四個月，完成這樣一個建社計劃，應當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區的負責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實際情況定出一個適當的計劃，於兩個月內報告中央。



那時我們再來討論一次，最後定案。

問題是能不能鞏固。有人說，去年的五十萬個合作社的計劃太大了，冒進了，今年的三十五萬個合作社的計劃也太大了，也冒進了。他們懷疑建立這樣多的合作社不能鞏固。究竟能不能鞏固呢？

當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將大約一億一千万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為集體經營，並且進而完成農業的技術改革，確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應當相信，我們黨是能夠領導羣眾克服這些困難的。

就農業合作化問題來說，我認為我們應當相信：（1）貧農、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困難（貧農），或者他們的經濟地位雖然比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農），因此，他們是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的，他們是積極地響應黨的合作社化号召的，特別是他們中間的覺悟較高的分子，這種積極性更大。

我認為我們應當相信：（2）黨是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我們黨已經勝利地領導了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一定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在大約三年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於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樣，我們已經有了足以說服人的有力量的証據。請看第一批三百個合作社，第二批一萬三千七百個合作社，第三批八萬六千個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萬個合作社，都是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來的，都鞏固了，為什麼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萬個），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第五批合作社（暫定控制數字為三十五萬個，尚待最後確定）就不能鞏固呢？

我們應當相信羣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

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 三

為了使全國農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須認真地整頓已有的合作社。

必須強調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合作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偏向。因此，必須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兩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經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還沒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議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現有六十五萬個合作社中，有五十五萬個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較鞏固的所謂「一類社」。加上以前的十萬個已經鞏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經鞏固的社是不不少的。可以不可以由這些已經鞏固的合作社帶領其餘尚待鞏固的合作社逐步地獲得鞏固呢？應當肯定地說是可以的。

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幹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應當去挫折它。我們應當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幹部和縣、區、鄉幹部共命運，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積極性。

要下決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體社員或幾乎全體社員都堅決不願意幹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個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堅決不願意幹，那就讓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繼續幹。如果大部分人不堅決不願意幹，只有一小部分人願意幹，那就讓大部分人不退出去，而將小部分人留下繼續幹。即使這樣，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個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戶，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幹下去，結果讓他們走了；三戶貧農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幹下去，結果讓他們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實，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於採取所謂「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農戶的合作社，引起羣眾和幹部的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並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可是有些同志不願意聽。

在勝利面前，我認為有兩種不好：（1）勝利衝昏了頭腦，使自己的頭腦大大膨脹起來，犯出「左」的錯誤，這當然不好。（2）勝利嚇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這也不好。現在的情況是屬於後一種，有些同志被幾十萬个小型合作社嚇昏了。

#### 四

必須認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準備工作。

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地追求數量的偏向。不打無準備的仗，不打無把握的仗。這是我黨在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著名口號。這個口號也可以用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中來。

要有把握，就要有準備，而且要有充分的準備。要在一個省、一個專區和一個縣裏面建設一批新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事前做好許多的準備工作。這些工作大體是：（1）批判錯誤思想，總結工作經驗。（2）在農民羣眾中，有系統地和反覆地宣傳我黨關於農業

合作化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在向農民作宣傳的時候，不但要解釋合作化的好處，也要指出合作化過程中會遇到的困難，使農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3）按照實際情況，擬定全省的、全專區的、全縣的、全區的和全鄉的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全面規劃，從其中擬定年度規劃。（4）用短期方式訓練辦社幹部。（5）普遍地大量地發展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許多互助組互相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的聯合組，打好進一步聯合起來建立合作社的基礎。

有了這些條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發展的數量和質量統一的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但是還要在第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後，跟着就去進行整頓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來以後能不能鞏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準備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後的整頓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黨和青年團的鄉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鄉村中的建黨建團工作和整黨整團工作密切地相結合。

不論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應當以鄉村中當地的幹部為主要力量，鼓勵和責成他們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幹部為輔助力量，在那裏起指導和幫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辦代替一切。

#### 五

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必須比較單幹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決不能老是等於單幹戶或互助組的產量，如果這樣就失敗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減低產量。已經建立起來了的六十五萬个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農作物的產量，這是極好的情況，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合作社勝過互助組，更勝過單幹戶。

為了要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就必須：（1）堅持自願、互利原則；（2）改善經營管理（生產計劃、生產管理、勞動組織等）；（3）提高耕作技術（深耕細作、小株密植、增加複種面積、採用良種、推廣新式農具、同病蟲害作鬥爭等）；（4）增加生產資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農具等）。這是鞏固合作社和保證增產的幾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堅持自願、互利原則，現在必須注意解決以下各項問題：（1）耕畜和大農具是否以遲一兩年再入社為適宜，入社作價是否公道和



还款時間是否過長；(2) 土地報酬和勞動報酬的比例是否適當；(3) 合作社所需要的資金如何籌集；(4) 某些社員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力去從事某些副業生產（因為現在我們建立起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般地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所以，上述四個問題必須注意解決得恰當，才不致於違反貧農和中農之間的互利原則，只有在互利的基礎之上才能實現自願）；(5) 社員的自留地應有多少；(6) 社員成份問題；等等。

這裏談一個社員成份問題。我以為在目前一兩年內，在一切合作社還在開始推廣或者推廣不久的地區，即目前的大多數地區，應當是：(1) 貧農；(2) 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3) 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這幾部分人中間的積極分子，讓他們首先組織起來。這幾部分人中間暫時還不積極的分子則不要勉強地拉進來。等到他們的覺悟程度提高了，他們對於合作社感到興趣了，然後再分批地把他們吸收進合作社。這幾部分人的經濟地位是比較接近的。他們的生活或者還是困難的（貧農，他們分得了土地，比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還因為人力畜力和農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難），或者還不富裕（下中農），因此，他們有一種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雖然如此，他們中間的積極性的程度，由於種種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積極，有些人暫時還不大積極，有些人還要看一看。因此，我們對於一切暫時還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們是貧農和下中農也罷，要有一段向他們進行教育的時間，要耐心地等待他們的覺悟，不要違反自願原則，勉強地把他們拉進來。

至於新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即一切經濟地位較為富裕的中農，除開若干已經有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覺悟，真正自願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們入社以外，其餘暫時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強地把他們拉進來。這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覺悟，只有等到農村中大多數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到同這些富裕中農的單位面積產量相

等甚至更高了，他們感到再單幹下去在各方面都對他們不利，而唯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較為有利的時候，他們才會下決心加入合作社。這樣，先將經濟地位貧苦或者還不富裕的人們（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覺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幾年內，組成合作社，然後再去吸收富裕中農。這樣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最近幾年內，在一切還沒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區，堅決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農加入合作社。在已經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區，在那些已經鞏固的合作社內，則可以有條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棄剝削、從事勞動、並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來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加入合作社，參加集体的勞動，並且在勞動中繼續改造他們。

## 六

在發展的問題上，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說現在合作社的發展「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羣眾的覺悟水平」，這是不對的。中國的情況是：由於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後，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後，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佔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進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對於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佔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感覺，已經在廣大的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迅速地發展起來。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農民，只佔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們是動搖



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面說過，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也有許多人，因為覺悟不高，暫時還是觀望的，他們也有搖擺，但是同富裕農民比較，他們是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這是實際存在的情況。而我們的有些同志却忽略了這種情況，認為現在剛剛發展起來的幾十萬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已「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羣眾的覺悟水平」，這是看見了較少量的富裕農民，忘記了大量的貧農和非富裕農民。這是第一種錯誤思想。

這些同志還對於共產黨在農村中的領導力量和廣大農民對於共產黨的熱忱擁護這樣一種情況，估計不足。他們認為我們的黨對於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都難於鞏固，大發展更不敢設想。他們悲觀地描寫黨在領導農業合作化工作中的現時狀況，認為「超過了幹部的經驗水平」。不錯，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新的革命。過去我們只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但是怎樣去取得這種經驗呢？是用坐着不動的方法去取得呢，還是用走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去、在鬥爭中學習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實行五年計劃，不着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工作，我們怎麼能夠取得工業化的經驗呢？五年計劃中就有農業合作化的部分，我們不去領導農民在每鄉每村都辦起一個至幾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試問「幹部的經驗水平」從何處得來，又從何處提高呢？顯然，所謂現時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狀況「超過了幹部的經驗水平」這樣一種思想，是一種錯誤的思想。這是第二種錯誤思想。

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應當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如果缺乏這種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

## 七

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經驗，鼓舞着我國人民，它使得我國人民對於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充滿了信心。可是，就在這個國際經驗問題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贊成我黨中央關於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步驟應當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驟相應的方針，而這種方針，曾經在蘇聯證明是正確的。他們認為在工業化的問題上可以採取現在規定的速度，而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則不必同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而應當採取特別遲緩的速度。這就忽視了蘇聯的經驗。這些同志不知道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於這些物資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問題，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曾經遇到了，蘇聯是有計劃地領導和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法解決了，我們也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解決它。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繫起來想一想，即：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



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

在農業方面，在我們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蘇聯的經驗，在這個問題上也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孤立地互不聯系地去看這些問題。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於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這種經驗，蘇聯也已經提供給我們了，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

## 八

有些同志，又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找到了根據，拿來批評我國目前的農業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謂急躁冒進。「蘇聯共產黨歷史簡

明教程」不是告訴了我們，他們的許多地方黨組織，曾經在合作化的速度問題上，在一個時期內，犯過急躁冒進的錯誤嗎？我們難道不應當注意這一項國際經驗嗎？

我認為我們應當注意蘇聯的這一項經驗，我們必須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農民羣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的思想，但是我們不當容許我們的一些同志利用蘇聯的這項經驗來為他們的爬行思想作掩護。

我黨中央是怎樣決定在中國進行農業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準備以十八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這個計劃的。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起，到一九五二年，這三年多一點的時間，是為完成恢復我國經濟的任務度過的。在這個時間內，在農業方面，我們除了實行土地改革和恢復農業生產這些任務之外，我們還在一切老解放區大大地推廣了農業生產互助組的組織，並且着手組織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經驗。接着是從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現在已經實行了差不多三年，我們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向全國範圍內推廣，我們的經驗也增加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共有時間十八年。我們準備在這個時間內，同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上完成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的改造。這是可能的嗎？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完全可能的。蘇聯是在一九二〇年結束國內戰爭的，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時間完成了農業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六年時間內完成的。在這個時間內，雖然蘇聯的一些地方黨組織，如像「蘇聯共產黨歷史簡明教程」上所說的，犯過一次所謂「勝利衝昏頭腦」的錯誤，但是很快就被糾正。蘇聯終於用很大的努力勝利地完成了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且在農業方面完成了強大的技術改造。蘇聯所走過的這一條道路，正是我們的榜樣。



## 第二、我們在農業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採取了逐步前進的辦法。

第一步，在農村中，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号召農民組織僅僅帶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幾戶為一起或者十幾戶為一起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然後，第二步，在這些互助組的基礎上，仍然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号召農民組織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小型的小型半社会主义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後，第三步，才在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合作社的基礎上，按照同樣的自願和互利的原則，号召農民進一步地聯合起來，組織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些步驟，可以使農民從自己的經驗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覺悟程度，逐步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們較少地感到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好像是突然地到來的。這些步驟，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個時間內（例如在一年到兩年內）農作物的減產，相反，它必須保證每年增產，而這是可以做到的。現在已有的六十五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產的，百分之十幾的社是不增不減的，百分之幾的社是減產的。這後面的兩類情況是不好的，特別是減產的一類最不好，必須用大力去整頓。因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產的（增產的數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為那百分之十幾的合作社雖然第一年不增不減，但是經過整頓，第二年可能增產；最後，那百分之幾減產的合作社，經過整頓，第二年也有可能增產，或者進到不增不減的地位。所以，就整個說來，我們的合作化的發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證增產而避免減產的。這些步驟，又是訓練幹部的很好的學校。經過這些步驟，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就可以逐步地訓練出來。

第三、每年按照實際情況規定一次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控制數字，並且要對合作化的工作進行幾次檢查。這樣，就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成績的好壞，決定各省各縣各鄉的每年具體發展的步驟。有些地方是可以暫停一下，從事整頓的；有些地方是可以邊發展，

邊整頓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員可以讓他們退社，個別的合作社也可以讓它們暫時解散。有些地方應當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擴大農戶的數目。各省各縣，在發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後，必須有一個停止發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後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至於對於合作化運動的檢查工作，中央、各省、區、市委、市委和地委必須十分抓緊，每年不是進行一次，而是應當進行幾次。一有問題就去解決，不要使問題成了堆才去作一次總解決。批評要是及時的批評，不要老是愛好事後的批評。例如今年七個月內，單是中央召集地方負責同志討論農村合作化問題的會議，連同這次會議在內，就有了三次。實行這種因地制宜、及時指導的方法，就可以保證我們的工作少犯一些錯誤，犯了錯誤也可以迅速糾正。

從上述種種情況看來，難道不可以說我黨中央對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導方針是正確的，因而足以保證運動的健康發展嗎？我想可以這樣說，並且應當這樣說的，將這種方針估價為「冒進」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 九

有些同志，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錯誤地觀察了工農聯盟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很危險，他們勸我們從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趕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恰好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這裏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却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工農聯盟，這是建立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從地主手裏取得土地分給農民、使農民從封建所有制解放出來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這個革命已經過去



了，封建所有制已經消滅了。現在農村中存在的是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个体農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於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這個聯盟就有被破壞的危險。勸我們「下馬」的那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想錯了。

## 十

必須現在就要看到，農村中不久就將出現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末尾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開頭，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國將有二億五千萬左右的人口——五千五百萬左右的農戶（以平均四口半人為一戶計算）加入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這就是全體農村人口的一半。那時，將有很多縣份和若干省份的農業經濟，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改造，並且將在全國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

社，由半社會主義變為全社會主義。我們將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〇年，對於包括其餘一半農村人口的農業經濟，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改造。那時，由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改為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的數目，將會加多。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機器必定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並進，大型農業機器的使用將逐年增多，而社會改革則將在一九六〇年以後，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會主義發展到全社會主義。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通過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由於我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估計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全黨必須為了這個偉大任務的實現而奮鬥。

## 十一

要有全面的規劃，還要加強領導。

要有全國的、全省的、全專區的、全縣的、全區的、全鄉的關於合作化分期實行的規劃。並且要根據實際工作的發展情況，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規劃。省、專、縣、區、鄉各級的黨和青年團的組織，都要嚴重地注意農村問題，切實地改善自己對於農村工作的領導。各級地方黨委和團委的主要負責同志都要抓緊研究農業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變成內行。總而言之，要主動，不要被動；要加強領導，不要放棄領導。

## 十二

一九五四年八月（這已經不是新聞了），中國共產黨黑龍江省委



的報告說：「隨着農村合作化高漲形勢的形成和發展，農村各類互助合作組織和各階層羣眾，已經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動起來了。現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在籌劃和醞釀擴大社員，作為建社對象的農業生產互助組正在籌劃和醞釀擴充自己的戶數，不夠條件的農業生產互助組也要求進一步地發展和提高它們自己。羣眾有的張羅入新社，有的張羅入老社。今年不準備入社的人們，也在積極地醞釀插入互助組。動的面很廣。已經形成了一個羣眾性的運動。這是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一個新的突出的特點。但由於某些縣、區有的領導同志，未能適應這個新的特點，及時地加強領導，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龍江省的村是行政單位，等於關內各省的鄉。黑龍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單位，等於關內各省的村。）在羣眾自我對象中，已經開始產生『強找強，排擠貧困農民』，『爭骨幹，爭社員，相互鬧不團結』，『骨幹盲目集中』，『富農和資本主義思想較嚴重的富裕農民趁機組織低級組或富農社』等等不健康的現象。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在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情況下，光是從建立新社這個範圍和角度出發，考慮貫徹執行黨的政策，領導這個運動，已經不夠了，必須從全村範圍（按：即全鄉範圍）和全面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角度出發，既考慮到老社的擴大，也考慮到新社的建立，既考慮到合作社的發展，也考慮到互助組的提高，既考慮到今年，也考慮到明年，以至後年。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地實現黨的政策，使農業合作化運動健康地向前發展。」

這裏所說的「某些縣、區有的領導同志，未能適應這個新的特點，及時地加強領導」，只是黑龍江一個省是這樣的嗎？只是某些縣、區嗎？我看，這種領導落在運動後面的嚴重情況，很可能在全國許多領導機關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來。

黑龍江省委的報告又說：「双城縣的希勤村，以村為單位，採取領導和羣眾自願相結合的方法，進行了全面規劃。這是領導合作

化大發展的一種創舉。其重要作用，首先在於通過規劃，全面地實行了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加強了貧農和中農的團結，有力地開展了對於富農傾向的鬥爭。從農業全面合作化的利益着眼，適當地配備了骨幹力量。調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組的關係，從而有計劃地全面地推進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其次，通過這樣的規劃，就把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工作，具體地布置到基層領導和廣大羣眾中去，使黨的村支部懂得了如何進行領導，使老社懂得了如何向前發展，使新社懂得了如何建社，使互助組懂得了提高的具體方向，更加發揮了黨的村支部和廣大羣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充分地體現了依靠黨支部、依靠羣眾的經驗和智慧的原則。最後，正由於通過這種規劃，可以進一步地摸清農村的底，具體地全面地去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進，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從而正確地實現了中央的『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

黑龍江省委報告中所說的某些「不健康的現象」，究竟怎樣解決的呢？省委的報告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在省委報告的後面附載了双城縣委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報告說：「通過黨支部領導和羣眾自願相結合進行全面規劃的結果，排擠貧困戶入社的偏向糾正了，骨幹過分集中的問題解決了，互相爭骨幹、爭社員的現象沒有了，社組關係更加密切，富農和富裕中農組織富農社或低級組的企圖失敗了，基本上實現了黨支部的計劃。兩個老社擴大了社員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個新社的架子，整頓起兩個互助組。估計搞得很好，明年（按：即一九五五年）全村就可以合作化。目前，全村羣眾，正在積極地實現今年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計劃和搞好增產保收。村幹部普遍認為：『得虧這樣一搞，要不就亂了，不但今年搞不好，還要影響明年。』」

我看就照這樣辦罷。

全面規劃，加強領導，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 迎接和配合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新高潮

編者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召集的省委、市委和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指出了在全國農村中新的高潮就要到來；批判了在合作化高潮面前被勝利嚇昏了頭腦的右傾錯誤，闡明了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歷史發展規律和黨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應當採取的方針政策。毛主席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指示，在全國農村中已經成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巨大鼓舞力量 and 正確的指導方針。今年十月十一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上，根據毛主席上述的報告，一致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步驟和工作方法，又作了進一步的具體的指示。全國各地和各業務部門，根據這個報告和決議，應該如何迎接和配合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新高潮，就不能不成為當前的中心政治任務。

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已有悠久的歷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黨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後，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黨領導了農民更廣泛地組織了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在互助組的基礎上開始成批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多少年來的事實，特別是最近各地合作社迅速發展的蓬蓬勃勃的新氣象，充分證明了農業合作化的可能性和黨中央對於農業合作化的方針的正確性。

但，「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毛主席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上就這樣指示過。的確，根據蘇聯的經驗，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也不是沒有人懷疑過它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的。一九三三年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曾對此指出過：「而這是毫不奇怪的。的確，數百年來，大家都過着舊的生活，走着舊的道路，替富農和地主，替高利貸者和投機者出力生利。雖不可說這條舊道路，這條資本主義道路得到過農民方面的贊同。可是，這條舊道路總是一條已經走熟了走慣了的道路，而且誰也沒有實地證明可以過另外一種生活，過較好的生活。」<sup>①</sup>我們今天的情況，與此有相

似的地方，也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就是：千百年來，「大家都過着舊的生活，走着舊的道路」，「這條道路總是一條已經走熟了走慣了的道路」。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我們今天有了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先進經驗，成功的經驗，並且我們自己也有了一些親身的體驗，「實地證明可以過另外一種生活，過較好的生活」。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現在要使得大家來過新生活，走新道路，使農業合作化，還是不會不遇到困難，不遇到抵抗的。「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地工作」，毛主席的指示意義是深長的。

正如陳伯達同志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中所指出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一種新生的力量，而我們知道，任何新生力量都會遇到保守力量的抵抗，農業合作化運動當然不會是例外。」他又繼續指出：「抵抗農業合作化的保守力量，一方面來自敵對的階級，即來自地主、富農和農村中其他資本主義剝削分子，另一方面還來自農民（主要是富裕中農）本身的兩重性所包含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和農民長期個體經營的偏見和習慣。」所以我們必須警惕敵對階級對於合作化運動破壞的嚴重性，同時並須克服農民的這種「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偏見和習慣」。面臨着這樣的任務，對於我們政法部門來說，對於我們政法工作者來說，也負擔了一種嚴重而特殊的責任。

政法工作必須為經濟建設服務，這是幾年來中央所早經肯定下來的方針。在偉大的新的農業合作化的高潮當中，政法工作，必須相應地為這個運動服務，這也是不待言的。雖然如此，「但並非每一個司法工作人員對這個方針都有深刻的認識」，「在城市如何對破壞分子進行鬥爭和在鄉村怎樣保障互助合作運動的鞏固和發展，我們都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和系統的總結經驗。這些缺點和困難只有在今後實踐中逐漸加以克服。」<sup>②</sup>

「在鄉村怎樣保障互助合作運動的鞏固和發展」，我們今天正面臨着這樣緊迫的任務。同時就合作社的發展情況看，已經由今年六月為止的六十五萬個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四六頁。  
② 董必武院長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



社，發展到一百二十四萬多個社，不久就還要發展到更多的社。在這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中，政法工作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我們每個政法工作人員，特別是司法工作人員要加緊對「政法工作必須為經濟建設服務」方針的認識，加強革命法制和原來的地主、富農中的許多人和各種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一切犯罪分子對於農業合作化的破壞、盜竊等犯罪行為進行鬥爭。其次，我們政法工作者，特別是司法工作者有責任去幫助農民解決已經發生的糾紛，研究在他們當中將要產生的問題，深入羣衆，總結經驗，從政法工作方面來保障合作化的鞏固和發展。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已經對各級司法機關發出「關於加強司法工作保障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人民司法機關必須積極行動起來，努力為這一偉大運動服務。

從法律的角度上來看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不能不聯繫到上層建築與基礎的問題。農業合作化問題，已經在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的法律中得到了相應的反映。它不僅消極的反映，還正在加緊積極地幫助其基礎的鞏固、發展與加速建成。在憲法的序言中，已肯定了一「保證我國能夠通過和平的道路消滅剝削和貧困，建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在肯定了要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還肯定了要逐步完成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憲法的第七、八條，肯定了勞動羣衆部分集體所有制是組織個體農民走向勞動羣衆集體所有制的過渡形式；還肯定了國家指導和幫助個體農民增加生產，並且鼓勵他們根據自願的原則組織生產合作、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同時在前述中共中央的會議上，已經基本上通過了在試行中經過多次修改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的草案，並經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和通過。這個章程草案，將由國務院發給縣以上各級人民委員會討論和徵求人民意見，各地農業合作社可以把它這一草案作為自己的社章試用。這個章程草案將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以後，將成為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法。誠如「人民日報」社論中所指出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按照它的內容和意義來說，可以說是農村中建設新社會的最高法律，根本法律。」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運動，是從個體經濟轉到集體經濟的生產關係，是打破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束縛，這是繼土地改革第一個革命之後的第二個革命。在新的生產關係上，不能不反映一系列的新的法律關係。所以與農業合作有關的，還有行政法、刑法、民法、土地法、勞動法等。例如農業合作社的經營管理、生產管理、財務管理等，都牽涉到行政法的範圍。在上述「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中所規定的關於社員的土地、耕畜和

農具的處理等等，都牽涉到民法、土地法、勞動法的範圍。特別是對於敵人的暗害和破壞活動以及貪污、嚴重地違犯勞動紀律的行為等等，都牽涉到刑法的範圍。面對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蓬勃發展，我們政法科學研究工作，必須對由合作化所必然引起的新的階級的變動，新的法律關係——在社員與社員之間、社員與社之間、社與社之間、社與國家機關之間有關各項法律關係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發掘和總結，把生疏的東西，熟悉起來，為配合農業合作化運動貢獻我們的力量。我們希望我們政法科學研究工作同志們動員起來，在同一目的下，向不同的方面進行突擊，還請允許本刊作為發表這些研究成果的園地，把研究中所獲得的寶貴收穫，隨時寄給我們！

◎「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規範」，「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社論。

## 學術動態

### 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研究部研究小組成立並開展政法科學研究工作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研究部邀約中央和北京市各政法機關及各政法院校的有關同志舉行座談會，討論關於如何開展政法科學研究工作的問題。經過討論後，大家認為推動、開展政法科學研究工作，應即成立三個研究組——刑法研究組、民法研究組、國家法、行政法研究組。並由各組負責人及有關同志共同組成核心組。核心組的任務是：制訂計劃，推動研究工作並負責聯絡。

現在各研究組已分別舉行了若干次座談會並進行了組織活動。刑法組現已吸收中央各政法部門及各政法院校中從事刑法研究工作三十四人。該組的研究工作根據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和為業務服務的精神，準備按照各政法部門的工作需要和學校的教學需要規劃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計劃，並擬在年內先就「我國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則」問題舉行座談。民法小組除吸收了中央各政法部門及各政法院校中願意參加政法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員二十八人外，並擬吸收中央財經部門的同志以及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的會員參加。該組研究題目正在擬定中。國家法、行政法組現在也正在進行組織研究中。

為了積極開展政法科學研究工作，加強研究部的領導力量，在第一屆理事會第十次會議上又選出吳克堅同志為研究部主任，閔剛侯、張定夫、費青、陳守一、楊化南五同志為副主任。



# 对苏联司法工作的幾點体会

史 良

今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联司法部邀請中國司法工作者的代表前往訪問，藉以增進中蘇兩國司法工作者間的友誼、和交流工作經驗，從而更加鞏固中蘇兩國人民間牢不可破的偉大友誼。我作為中國的一個司法工作者，很榮幸地參加了這次訪問。我們訪蘇代表團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和法律教育部門同志組成，於四月十一日赴蘇訪問，七月十日返國，歷時整整三個月。我們先後在蘇聯莫斯科、烏茲別克共和國首都塔什干、烏克蘭共和國首都基輔和英雄城市列寧格勒，認真地和系統地訪問和學習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蘇維埃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管理機關和法律科學研究與教育機關，也附帶訪問了對犯人的勞動改造和監禁機關；此外，還參觀了蘇維埃的工廠、國營農場、集體農莊以及許多革命文物史蹟和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由於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的高度熱愛，蘇聯同志對我們工作的熱忱幫助，我們在蘇聯各地受到了感人極深的熱烈歡迎和無私幫助。現在我這裏僅就我們訪問與學習蘇維埃司法工作經驗方面的幾個主要體會來談談。

蘇聯司法工作給我們第一個深刻的印象是：蘇聯雖是建國三十多年，早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正在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國家，但由於國外帝國主義的威脅還存在，由於國內有些人們意識中還有資本主義殘餘存在，以及人與人間的關係需待法律調整，因此，作為國家機器重要組成部分的蘇維埃司法機關，是一直在加強着。而且蘇維埃司法機關，特別是檢察和審判機關在與帝國主義的奸細和基於某些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而產生的一切犯罪現象作鬥爭中，在保障國家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保護公民的權利和合法利益中，都發揮了並正在發揮着重大的作用。各級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用什麼方法來發揮它的作用呢？我們感到它是運用以下幾個主要活動，來完成國家交給它的光榮任務——鞏固自己轄區內的社會主義法制。（1）通過揭露與懲處的方法，堅決與一切犯罪現象作鬥爭。蘇維埃國家用極大的力量來鞏固社會主義的法制。對任何違法犯罪行為，都必須堅決反對與懲處。特別是反革命、盜竊社會主義財產、盜匪、流氓和投機罪犯，在蘇維埃國家內一直被視作最危險的犯罪，是司法機關嚴厲打擊的重點。由於羣眾政治警惕性高，偵查和審判等司法機關熟悉業務並

具有高度的原則性，任何違法犯罪，都能及時揭露，弄清情節，並給予應得的懲處。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建設，更是司法機關的中心任務。蘇維埃司法機關的職能乃是用嚴格鞏固社會主義法制，特別是用維護國家有關經濟的立法，來保障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蘇維埃國家為了運用法律力量來直接保護和發展農業生產，首先在立法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刑法中已有經濟上和職務上之犯罪的專門規定外，還有關於破壞農業勞動組合章程、勞動紀律（包括曠工）、出產劣質農產品、盜竊社會主義財產以及破壞合同紀律和經濟核算等應負一般法律責任和刑事責任的立法。而司法機關則是用堅決追究破壞這些經濟立法的一般法律責任和刑事責任，來直接保障和促進國家的農業生產。（2）蘇維埃司法機關除堅決與各種犯罪作鬥爭外，對調處人民內部糾紛，保護公民政治、勞動、居住及其他人身和財產權利，亦是十分週詳。此外，蘇維埃司法機關還反對輕率離婚，認真鞏固蘇維埃家庭和保護子女利益。（3）蘇維埃審判機關不僅單純處理已發生的犯罪與糾紛，還十分注意分析與追究產生犯罪和糾紛的原因，並對有關部門的工作缺點和有關責任人員作出個別裁定，送給其領導機關檢查糾正；同時還廣泛根據審判實踐總結，發現有關部門在遵守社會主義法制上的缺點，建議有關部門給予糾正，藉以消除和減少犯罪和糾紛的原因。如在處理盜竊社會主義財產案件中，不僅對盜竊犯要堅決懲處，還要分析與追究某些機關、企業在保護社會主義財產上的漏洞及其有關的失職人員，提請有關部門予以改正和處理。至於蘇維埃檢察機關在這方面的工作更是主動的。它還可主動深入到遵守社會主義法制情況不良的重點單位（如某工廠、企業、集體農莊的勞動紀律不好或不斷出產劣品等）實行檢查，或召集經常發生違法現象單位主管人的會議，來擬定消除違法和預防犯罪的措施。（4）在自己轄區內負責宣傳蘇維埃法律。人民審判員除公開審理，廣泛吸引羣眾旁聽外，常用典型案件就地審判，每月要向選民作工作報告，所有司法人員（包括審判員、檢察長和律師）都在當地黨、政統籌下，要向居民作法律講演，特別是每當新的立法頒佈，或當地某類犯罪現象較多的時候，更應分別到工廠、企業、集體農莊進行有關新的法令和遵守法制的宣傳，以加強對公民的



守法教育，預防犯罪。正因為蘇維埃司法機關通過各項措施，在鞏固自己轄區內的社會主義法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而在黨、政領導和人民羣眾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和榮譽。

蘇聯司法機關給我們的第二個深刻印象，是它的全部活動都是完全取得人民的支持，並在廣大人民羣眾監督下進行的。以審判機關為例：各級法院由選舉產生，蘇聯、共和國和省級法院的審判員（包括院長、副院長），由本級蘇維埃大會選舉；而基層法院——即人民法院更由其轄區內的公民來直接投票選舉，從而大大加強了審判人員對選民的責任感。所有各級法院的一審案件（不分簡單與複雜）都廣泛吸引不脫離生產的羣眾代表——即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人民審判員要定期分片的到工廠、集體農場等地向自己選民作工作報告。在人民審判員向選民作工作報告的會議上，如果人民審判員平日工作的好，就立即取得全體居民的支持；如果平日工作不好，在大会上就將立即受到選民的廣泛責難；從而加強了人民羣眾對人民審判員的有效支持與監督。基層法院的設置也充分貫徹了便民原則。一個區（在行政上相當於我國的縣，但人口少於我國的縣）裏一般有一個小型的人民法院，若是較大的區則有數個甚至十幾個人民法院。在城市一般是三、四萬人口，農村是五、六萬人口中即設一個人民法院。為了加強法院負責人和羣眾間的直接聯繫，由人民法院一直到蘇聯最高法院的審判員並院長都每週定期直接接待羣眾。凡是來訪的公民，必須由有經驗的決問題的和負責的幹部來親自接待。至於檢察機關為了揭露犯罪，更是緊緊依靠人民羣眾來一道與一切違法犯罪現象進行鬥爭。所有這些都反映了蘇維埃司法機關不僅在思想和工作作風上，而且還從制度上，來保證了司法工作的羣眾路線。

我們的第三個印象是由於司法工作是很強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工作，蘇聯黨和國家對司法幹部，特別對審判員和檢察員的要求是嚴格的。要求司法幹部必須具有較高的政治水平，嚴格的法律科學訓練和足夠的工作經驗。蘇聯為了培養和供應檢察、審判、律師、公證、公斷、機關企業的法律顧問和法律科學工作等各方面需要的專門人材，曾採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1）擴充和改善法律學院、大學法律系和中等法律學校，以培養新的幹部。蘇聯在衛國戰爭以後，一方面由於司法幹部在戰爭中大量轉入軍事法庭並在戰爭中有重大犧牲，再方面由於戰後國家工作亦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對法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在斯大林發起和主持下，聯共中央通過了「關於擴充和改善全國法律教育的決定」。除力求提高法律科學水平和教學質量外，還大量擴充大學法律系和法律學院每年的招生名額，建立和擴充很多中等

法律學校。高等和中等兩項法律學校合計每年訓練的法律幹部總數約為過去每年的三倍以上。經過近十年來的努力，現在蘇維埃法律幹部情況主要的已不是量的增加，而是質的提高。因此，中等法律學校在完成其歷史任務後已決定撤銷，並把法律學院（四年制）併入大學法律系（五年制），以提高幹部的質量。（2）對於在職幹部的訓練與提高，是以函授為主，調訓為輔。目前正進一步加強高等法律函授學院，号召和組織所有沒受過高等法律教育的在職幹部參加函授學習，爭取人民審判員和檢察員級以上幹部都要受過高等法律教育。同時，還舉辦有各種在職幹部訓練班。計有訓練省以上司法機關負責幹部的、高級訓練班、人民審判員及區檢察長的訓練班、偵查員訓練班、執行員和書記員的訓練班，藉以調訓各種在職幹部。（3）在日常工作中舉行的業務學習討論會（根據實踐中提出的問題，上升到理論上和立法上來討論），和下級司法幹部到上一級司法機關來進行業務實習，亦是廣泛提高在職幹部的有效措施。

還應當提出的，蘇維埃國家不僅注意培養法律幹部的教育工作，還十分注意法律科學研究工作。蘇維埃司法機關的一切活動都要有嚴格的科學根據。現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機關計有：蘇聯科學院維辛斯基法律研究所（為紀念本所創始人維辛斯基命名）和蘇聯司法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院，在六個共和國和科學院中也各設有法律科學研究機構。顯然，蘇維埃司法工作的發展與提高，是和蘇維埃法律科學的成就分不開的。

我們的第四個印象是各級蘇維埃司法機關工作的計劃性是很強的，它的工作與其他國家機關工作一樣，是嚴格按照計劃進行的。它們年度的工作部署只是制定工作要點，但季度工作則必須制定工作計劃。計劃是根據什麼來擬訂呢？第一根據國家當時的中心任務。例如當蘇共中央頒佈了加強農業的決議以後，司法機關的工作計劃就把貫徹農業勞動組合章程和其他有關加強對農業方面的法制的措施規定進去。第二是根據社會主義法制情況的反映。例如某類刑事犯罪增加，在工作計劃裏就要把加強對這類刑事犯罪的鬥爭措施規定進去。第三是根據司法機關本身的業務情況。例如本身業務那一方面情況不好，需要改進，就把對這方面的檢查和改進的措施訂在計劃裏。這樣的工作計劃是切合實際情況需要的，嚴格執行計劃，不僅能夠將各級司法機關的注意力集中於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上，保證有組織地實現與各種違法犯罪作鬥爭的措施而達到鞏固社會主義法制的目的，同時也能集中力量糾正缺點，改進工作。工作計劃制定的程序，是在每一季度之前，先由上級司法機關制定並頒發自己的工作計劃（至於上級審判機關則不用向下頒發自己的計劃），然後下級根據上級工作



計劃和本區情況來逐級制定自己工作計劃。地方各級司法機關的計劃都要經過上級領導審查。工作計劃規定的各項任務都很具體、明確，並定出每一項任務的執行人和執行期限。計劃制定後就必須堅決執行，並規定有執行計劃的嚴格的紀律，不執行計劃者要受到批評和制裁。當然計劃定後如果發生新的情況，必須提出新的問題，也可以去掉原有某些任務而增加新的任務，但修改計劃，必須要經上級批准。計劃執行以後，還要寫出執行情況的報告。蘇維埃司法機關工作效率高，這和其工作的計劃性是不可分割的。

最後，在蘇維埃各級司法領導機關中普遍樹立和採用的活的領導方法，也給我們以極深刻的印象。這是一種非常生動而實際的工作方法。蘇共中央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為改進國家機關工作，曾發佈指示，嚴厲地批評了若干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反對那種不深入實際，不用自己的具體活動來指導工作；而把主要精力耗費在搞報告、寫文件和簽發命令上。為此，蘇維埃司法機關更進一步檢查和改進了各級司法管理機關的領導方法，並把書面報告和指示文件減少到最低限度，現在除保留司法統計表（但項目也比以前簡化）、季度工作計劃和年終總結報告外，廢除了其他書面報告制度。這種領導方法的特點是：主要不是坐在機關靠向下級要報告材料來了解情況，然後再根據這些材料的綜合靠文件來指導工作；而是主要靠自己深入實際的活動來了解情況和指導工作，特別強調領導機關應對下級工作認真及時地進行檢查、總結和具體幫助。其主要方法：一是檢查工作；二是總結工作實踐。

蘇聯司法部和蘇聯檢察院管理和領導下級司法機關工作的主要方法是檢查工作。各級司法機關領導同志的主要精力和領導機關中的主要和得力幹部都是用在到下面檢查工作上面。檢查工作的目的不僅在於了解情況，發現問題，而還在於在檢查過程要就地給予實際的幫助。在檢查前必須有充分的準備，和制定檢查計劃。在檢查後必須做出全面總結和提出改進今後工作的建議；這結論和建議應在召開被檢查單位人員會議予以討論，並報告給同級黨委。檢查歸來後，如問題重大者，檢察機關方面應提交蘇聯檢察院會議討論，審判機關和司法管理機關方面應提交蘇聯司法部委員會討論。討論時被檢查單位負責人應被邀出席，然後經會議作出決議，並以總檢察長或蘇聯司法部部長名義發佈命令或指示信和限期改正缺點。然後，即以此項命令或指示信作為按期檢查與下次去檢查的根據。這是一種系統的全面的檢查。此外，還有臨時為特定問題而下去的局部檢查。

蘇聯司法機關的另一個重要領導方法，是總結工作實踐，特別是審判實踐。這可以看出案件的升降、犯罪的原因、司法機關與犯罪現象作鬥爭中的缺

點。這就不僅可以發現司法工作中的缺點，以便採取相應措施來予以改正；並且還可發現有關企業、機關和部門中的工作缺點，建議有關企業部門、有的並建議給黨、政領導來予以糾正。總結審判實踐是一種從實踐中、從羣眾中來，然後變為指示，再回到實踐中和羣眾中去的領導方法。

為了在組織上保證這種活的領導方法和克服組織機構上的官僚主義，蘇維埃各級司法機關的組織是精幹的。以蘇聯司法部為例：各業務司、處的組織首先是檢查員，都按地區分工（檢察院檢察員和法院審判員也是按地區分工），專門負責檢查和管理區內有關本司、處的業務。其次是設有少數顧問，負責幫助總結工作經驗和一些起草工作。再其次是由一、二個多至四、五個書記員組成的辦公室，負責全司、處的管理文件和一切技術工作。檢查員是主要業務幹部，並為直接的工作單位，在其下就再沒有什麼科長、股長和科員、辦事員了。經過這次的訪問與學習，使我們更加体会到蘇聯司法機關是堅強而完善的，它充分發揮了司法工作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中的強烈作用。它的工作經驗是豐富和先進的，我們一定要向它學習。誠然，我們這次訪問的收穫是很大的，但就對整個蘇聯司法工作的研究來說，我們這次的學習僅是開始。因此我們應認真繼續學習蘇維埃司法工作的先進經驗，並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加以運用，這對提高與改進我國司法工作是極其必要的。

## 學術動態

### 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蘇代表團對首都各政法業務機關和院校介紹蘇聯司法工作的先進經驗

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蘇代表團歸國後，除已向國務院、中央各司法機關做了彙報，以及對首都各政法院校介紹了蘇聯法律教育及法律科學研究工作的先進經驗外，最近兩個月內，又分別對中央及北京市的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及中央政法幹校、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師生舉行了十餘次的報告會。在這些報告中，對蘇聯司法機關的領導工作、幹部工作、司法機關與各有關部門的相互配合關係、律師工作、蘇維埃法院在鞏固社會主義法制中的作用、各級法院與專門法院及檢察機關的工作情況和經驗反覆地做了介紹。同時，為了更廣泛的傳播介紹蘇聯的先進經驗，對因公來京的各省市法院院長、專門法院院長、司法廳（局）長也做了介紹；另外，代表團還在編印「蘇聯司法工作訪問記」，準備發至全國各級法院和檢察院。

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蘇代表團歸國後所做的這些宣傳活動，對改進和提高我國的司法工作必將發生很大的作用。



# 訪問蘇維埃法院的幾點体会

曾漢周 何蘭階 林亨元

今年四月間，我們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和蘇聯司法部的邀請，隨同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學習蘇聯司法工作先進經驗。訪問期間共三個月，先後在莫斯科、烏茲別克共和國首都塔什干、烏克蘭共和國首都基輔和列寧格勒，訪問了十個人民法院、五個省、市法院、兩個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五個專門法院和蘇聯最高法院，此外還參觀了蘇維埃的工廠、國營農場、集體農莊以及各種文化建設。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蘇代表團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和法律教育部門所派出的代表組成的。我們在最高人民法院從事審判工作，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所派出的，因此我們在蘇聯訪問和學習的重點，也放在審判工作方面，現在僅就在審判工作方面所得到的幾點体会，分述如下：

一、蘇維埃法院的設置：蘇維埃各級法院是根據國家行政區劃而設置的，區設人民法院，省設省法院，自治共和國設自治共和國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國設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全蘇聯設蘇聯最高法院。全蘇聯的法院組織體系是統一的，而設置的原則，都是為了最大限度接近居民，便利人民。這一點，人民法院表現得最為顯著而突出。人民法院是蘇維埃法院體系中最基層的法院，絕大部分刑、民事案件由它受理。而人民法院的設置是採取小型制的，每個區都設有一個至數個人民法院，平均每三、四萬人口設立一個人民法院。（每個人民法院有一個人民審判員，有五十至七十五個人民陪審員。秘書、書記員、打字員、執行員各一。蘇維埃的人民法院，除陪審員外，一般的是五人至七人。）这样就从人民法院的設置上保證了法院是緊密地联系人民羣眾的。从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來看：審理每一個案件都有來自人民羣眾的陪審員參加，遇有重大教育意义的案件便進行就地審判，經常要向選民和居民作工作報告和法律講解，以擴大法律的宣傳教育，因此，人民法院的人民審判員是整天和人民羣眾接觸，深入在人民羣眾之中進行活動。

根據蘇維埃法院組織體系統一的原則，它們組織的機構沒有重疊的現象。蘇聯的城市很多，但全蘇聯除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二个城市設有市法院外，其他城市都沒有設立市法院，這些城市裏的人民法院統受各該省法院的監督。由於

城市具有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特點，一個區內的各人民法院都是集中一起辦公，不但法庭可以互相利用，而且可以適當地減少各法院的行政、勤雜人員。至於一個區內人民法院的多少，也是根據客觀的需要而增減，不是一成不變的。

以上所說的是普通法院的設置，至於專門法院的設置，都是與蘇聯軍隊、蘇聯海軍艦隊、蘇聯運輸部門的行政機構相適應的，这样就保證了法院和這些部門之間的联系更為密切，並使各專門法院的工作人員有可能了解各機關的情況和特點，順利地、正確地與各種犯罪作鬥爭。

二、蘇維埃法院在為黨和國家所提出的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中也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蘇維埃法院是黨和國家領導蘇聯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的重要武器之一，它是實現黨和國家政策的重要工具，它在蘇維埃國家從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中起着積極的作用。因此，蘇維埃法院的審判工作並不是脫離政治而孤立進行的，而是根據國內外政治形勢、社會動態以及黨和國家在各個時期內所確定的中心工作來實現它應有的職能。如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公佈「關於開墾生荒地與熟荒地以擴大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穀物生產」的決議後，蘇維埃各級法院都着重注意這方面的社會動態和發生犯罪和糾紛的問題，提前處理了關於集體農莊的案件，主動地、積極地深入集體農莊，懲罰破壞集體農莊的罪犯，幫助莊員向債務人收回欠款，從而更加鞏固了集體農莊，提高了產量，增加了收穫。

法院為中心工作服務是嚴格遵照法律進行的。每一個時期的中心任務被提出後，蘇聯最高蘇維埃就及時地制定了法律，黨和政府適時地發佈了決議、命令、指示等。這些法律、決議、命令和指示就成為法院進行工作的依據。法院嚴格地遵照國家所制定的法律處理案件，就能正確地實現人民的意志，很好地完成中心任務。如在社會主義建設過渡時期，富農潛入集體農莊，用種種方法實施破壞，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最高蘇維埃就頒佈了關於保護國家企業財產、集體農莊與合作社財產以及鞏固公有財產的法律，其中規定對於富農破壞集體



農莊最輕處十年剝奪自由，法院嚴格地執行這個法律，堅決地同富農作鬥爭，貫徹了黨和國家消滅富農的政策；又如衛國戰爭勝利之後，堅決地同盜竊社會主義財產的分子作鬥爭以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是當時主要的中心任務，因此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頒佈了關於盜竊國家財產和盜竊公共財產的刑事責任的命令，法院認真地遵照這個命令處理案件，在與侵吞社會主義財產行為作鬥爭方面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此外審判員還必須熟悉黨和國家的政策，才能理解法律的內容和實質，所以黨和政府提出中心工作後，法院與其他有關部門都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共同學習研究，以保證法院能夠正確地為中心工作服務，實現黨的政策。同時法院還採取以下的具體措施：（一）對破壞中心工作的案件必須及時審理，以推動中心工作的順利進行。法院對這類案件一般都組織巡迴法庭到案件發生的地方就審。（二）及時總結有關破壞中心工作的案件，找出犯罪發生的原因，建議有關部門改進工作。（三）上級法院協同司法行政部門派出檢查組，檢查法院貫徹中心工作的情況，以消除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保證更好地完成中心任務。

三、蘇維埃法院用其一切力量為鞏固社會主義法制而鬥爭：目前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鞏固社會主義法制的鬥爭，也就是為着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所有制，反對資本主義殘餘，提高國家紀律和勞動紀律的鬥爭。這種鬥爭對於順利地完成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具有巨大的意義。因此蘇維埃法院用其全部力量積極地參與這個鬥爭。首先我們看到蘇維埃法院的一切訴訟行為，實施各項行為的程序，都是經法律明文規定的。一切審判活動都是按照實體法和程序法來進行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表現，是國家機關一切活動的根據，法院是執行法律的機關，所以它自己模範地遵守法制原則，這對於鞏固社會主義法制，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其次表現在發揮法律威力，同犯罪現象作鬥爭以鞏固社會主義法制上，是非常嚴密而堅決的。由於蘇聯人民政治警惕性高，偵查和審訊等機關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原則性，任何犯罪都能及時揭露，弄清案情，給予應得的懲處。間諜、暗害分子、破壞者、叛國者、盜竊社會主義財產者和投機者、流氓等犯罪，在蘇維埃國家內一直被視作最危險的犯罪，是審判機關嚴厲打擊的對象。同時蘇維埃法院通過解決各種民事糾紛，來保護國家和社會的企業與機關、集體農莊和蘇聯公民的權利與利益，這對於調整內部，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蘇維埃法院對於鞏固家庭和保護子女利益，是非常重視的。它們反對輕率離婚，法律規定離婚必須經過人民法院調解，調解不成才能向省、市法院起訴。向法院申請離婚時，必須繳納一定數額的離婚稅和登報費

用。判決夫妻離婚時，都適當地解決了子女撫養和生活費的問題。蘇維埃法律這樣嚴肅地解決離婚問題，對於鞏固家庭，教育子女，培養共產主義的道德都發生了良好的效果。家庭是社會基本的細胞。這個基礎對於整個社會關係非常重大，不獨關係男女雙方的幸福，也影響着後一代的健康和道德的培養，因此蘇維埃法院也把鞏固家庭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之一。

蘇維埃法院不僅用審判來懲罰犯罪，解決糾紛，同時還通過法律宣傳教育等種種方法來預防犯罪，減少糾紛。蘇維埃法院非常重視法律的宣傳教育工作。蘇維埃各級法院，遇有重大教育意義的案件，都要到犯罪所在地或被告所在地的工廠、集體農莊、機關、團體等公共場所進行審判，以活人活事教育羣眾，更有效地發揮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作用。審判員並定期向選民報告工作，向廣大居民和機關、企業、團體講解法律，以推廣法律知識，加強羣眾的法制觀念，發動羣眾一同起來和犯罪現象作鬥爭。此外，還通過報紙刊物等進行法律宣傳教育工作，這些對鞏固社會主義法制，鞏固社會秩序，保護和促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都起了重大作用。我們在塔什干訪問了一個曾經受到蘇聯最高蘇維埃獎勵的模範審判員，他之所以成為模範審判員，主要是由於他的法律宣傳工作做得好，因而犯罪與糾紛大大減少。這個審判員在選民中威信很高，曾三次連選連任，而在去年選舉人民審判員時，他獲得百分之百的選票。此外，蘇維埃各級法院，在審判案件中，如果發現某機關、企業工作上有缺點，還作出補充裁定，送給該機關、企業，促其改進工作，各級法院還通過總結審判經驗，分析發生犯罪和糾紛的原因，藉以改進自己的工作，如在總結中發現有某些機關的工作上的缺點，也告訴這些機關，以防止犯罪和糾紛的發生。

四、蘇維埃法院的組織：蘇維埃法院的組織機構是很嚴密而精幹的，工作分工是很明確的，它是以審判為重心，院內各部門都是圍繞着這個重心服務。比如蘇聯最高法院，除各審判庭外，還設有法典編纂處、人民接待室、辦公廳等，而這些機構，如法典編纂處是為便利審判人員尋找法律資料和編纂「審判實踐」而設的，人民接待室是接待來訪羣眾，審查申訴或控訴的案件。為院長提起抗議以及法院審判案件作好準備工作。各級法院也是如此。只有這樣，才能統一目標，統一步驟，保證審判工作正確地、迅速地進行。

由於法院組織嚴密，因此機構也是很精幹的。蘇維埃法院的特點是任務重、機構小、幹部強、工作效率高。一個人民法院除一個人民審判員外並沒有另設院長。但一個人民審判員每月要結辦三十至一百件左右的案件，還要接見來訪羣眾，給人民陪審員講解法律，向居民進行法律宣傳，向選民作工作報告



等。省、市以上法院的機構，也是很精幹的，它們都是以很少的人員，做很多的工作。在這裏應該強調指出，蘇維埃各級法院的業務幹部比例大，非業務幹部比例小，這也充分說明了蘇維埃法院的組織嚴密，一切以審判工作為重心。

蘇維埃法院幹部的分工是很明確的，具有嚴密的科學性。不僅每一工作機構，就是每一個工作幹部，也都有具體的分工，責任非常明確。蘇維埃省、市以上法院的院長和副院長都有明確的分工，院長領導全院審判、行政工作的正確進行，副院長（不包括蘇聯最高法院）都兼任各審判庭的庭長，並分管院內的一些行政工作。這樣分工，就保證了法院的負責同志深入到各審判庭和各單位，了解全面情況，進行政治、思想、業務等領導，使領導集中，不陷於忙亂和分散，各單位遇有問題也便於及時請示，得到迅速地解決。省、市以上的法院的審判員，對上訴案件的審理，都是按地區分工的，分管該地區所管轄的幾個法院，總結該院所審判的該地區的案卷，協同司法部檢查該地區各法院的工作也是由該審判員來担任。審判員按地區分工審理案件，總結審判實踐，實一個地區的工作，對其所轄地區各法院的業務和審判員的優缺點以及當地社會情況，都能得到系統的了解，不僅便於幫助下級法院提高工作質量，而且也便於有計劃地積累材料，作總結工作和檢查工作的根據和參考；對於審判員本身，順利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深入鑽研業務，也有很大的好處。同時審判員按地區分工，也便於領導方面檢查工作。院或庭的負責同志只要看到統計表上該院所審理的某一地區的案卷有沒有積壓，該院對某一地區案件所作出的裁定被提起抗議和改判的多或少，就可以了解某一個審判員的成績如何。此外顧問、秘書、書記員等也都有明確的分工。由於院內各單位和各幹部分工合理，職責分明，因而工作效率很高。

另一方面，蘇維埃法院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體現了集體研究和羣眾路線的精神，這對於保證法院工作正確地、順利地進行，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從審判方面來說，由人民法院到蘇聯最高法院，各級審判庭審判案件都是採取三人合議制，省、市法院以上的主席團和蘇聯最高法院的全体會議，參與審理案件的人員更多，更擴大了集體研究的範圍。在行政方面，有內部各單位的工會會議和院或庭的業務會議，蘇聯最高法院還有院務會議，也都是採取集體領導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樣不但可以避免或減少處理問題陷於主觀、片面；而且能够集思廣益地發揮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至於蘇維埃法院羣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也是十分明顯的。這點可以從蘇維埃法院對於接待來訪工作的重視看出它們是如何密切地聯繫羣眾。蘇維埃法院院長、副院長、審判員親自接見

來訪的羣眾，對於來訪羣眾都是溫和而很有禮貌地和他們接談，耐心傾聽來訪羣眾的意見，仔細審查他們的控告和申訴，向他們解釋疑問，切實地給來訪羣眾解決問題。還有，公開審判，就地審判，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案件，審判員定期向選民、居民、企業、機關、團體報告工作等等，也都生動地說明了蘇維埃法院是真正人民自己的法院，它始終是放置在羣眾監督之下，深入在羣眾之中，迅速而準確地為羣眾解決問題。

蘇維埃各級法院的工作是按計劃進行的，這也是保證順利進行工作的必要條件。人民法院每月製訂工作計劃，省、市法院以上每季製訂工作計劃。計劃製訂後都在全院工作會議上進行討論，由院長或人民審判員批准後執行。計劃內容要反映工作的各个方面，如院內舉行各種工作會議，總結審判實踐，檢查某一審判員工作，進行業務學習等，都要包括在內。如果是人民法院還要包括向選民作工作報告，向居民、企業、機關、團體和人民陪審員講解法律等。計劃內對所規定的工作，都指定了負責該項工作的執行人以及完成該項工作的期限。由於計劃製訂得全面、細緻而具體，因此法院可以有目的、有步驟地集中力量解決主要而根本的問題，並合理地使用院內的所有工作人員。此外，開會、開庭不僅事先作了充分的準備，而且也是有計劃的進行，在進行時都抓住重點，進行討論或審問，他們在會議上或法庭上發言或提問題是直截了當的，發言不重複、不累贅，因而花費時間少，解決問題多，工作效率很高。如莫斯科市法院一個審理上訴案件的合議庭，從上午十時到下午四時，中午休息一小時，五小時內開庭審理了二十七個案件，平均每件只需十一分鐘。蘇聯最高法院全体會議討論並通過一個案件，也不過二十、三十幾分鐘。這些事實都有力地說明了蘇維埃法院工作方法的高度科學性。

五、對審判幹部的挑選和教育：幹部是黨和國家進行領導的決定力量，蘇聯共產黨和政府一向注重對審判幹部的挑選和教育。它們選用審判幹部特別注重政治品質、業務能力和實際工作經驗。因為審判活動是一種政治活動，法律反映着黨和國家的政策，反映着人民的意志，它是實現政治鬥爭的工具之一。因此審判員必須具有高度的階級覺悟，很好的政治修養，才能够實現人民的意志，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同時它們也極端重視培養審判幹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法律科學知識，保證他們能在具體事件上，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細密地分析問題，精確地適用法律。

蘇維埃國家培養審判幹部的方法是多種多样的。法律學校有二年制的中等法律學校和五年制的高等法律學校。高等法律學校，有在校學習的，有函授的。函授法律學校，使幹部不脫產而能得到學習。此外，有審判員訓練班，有執行



員和書記員訓練班有實習制度（調下級法院院長、審判員到上級法院實習，實習時期約二十天左右，實習中要指定專人具體幫助，實習結束要作實習鑑定），有業務學習討論會，一般是以省或市為單位召開，每月舉行一、二次，在較遠的農村地區則分片召開或每季一次。還有一種方法是抽調優秀的人民審判員、執行員或秘書到工作較差的人民法院去幫助工作，或者抽調工作較差的人民審判員、執行員、秘書到工作先進的人民法院去學習。同時，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夜校和文化班，以提高審判幹部的理論或文化水平。受過高等法律教育的幹部，很多在繼續努力爭取法學碩士、博士的學位。蘇維埃法院時常檢查或總結某一個別成績特優或工作上缺點較多的審判員的工作，由大家進行討論，藉以吸取經驗教訓。審判員定期向選民或居民作報告，這也能督促審判員更好地學習，除此之外，審判員要經常組織人民陪審員學習，向人民陪審員傳授法律科學知識。總之蘇聯黨和國家用盡了種種方法來培養與提高審判幹部，學習空氣非常濃厚。審判工作人員在黨和國家的教育之下也都能認真地鑽研業務努力於自己的工作。我們曾見到一個七十高齡的女審判員，她一貫埋頭苦幹熱愛自己工作，工作成績優良，因此得到蘇聯司法部長金質手錶的獎勵。我們也見過很多作過十幾年或二十幾年工作的審判員，長期以來，職位沒有調動，但他們不僅不鬧情緒，而且認為是無上的光榮。這都生動地說明了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專業化思想，是多麼崇高和純正。

六、監督程序的特點和作用：審判監督程序是蘇聯法院最突出的特點。它是訴訟程序中的特別程序。它在高度發揮審判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上，在更有效地加強審判監督的效能上，在密切法院與羣眾的聯繫上，在保證及時地、正確地解決問題上，都起了極其巨大的作用。蘇維埃法律對已生效的判決，要維持它的穩定性，但既發現了錯誤，就要依照監督程序進行糾正，以求徹底地保證判決符合客觀真實，保護國家與公民的權利和利益。監督程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院長、檢察長審查已生效的判決和裁定，提出抗議；第二階段是法院對抗議進行審理，作出裁定或決議。院長、檢察長提出抗議，固然絕大多數是根據當事人的申訴，但是當事人的申訴只是提起抗議的來源之一，此外，還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如機關、團體的建議，報紙的反映，總結審判實踐，檢查審判工作等來發現判決和裁定的錯誤，從而提起抗議以達到糾正的目標。抗議提起後，就由法院進行審理。但院長或檢察長提起抗議不受任何時間的限制，不受申訴範圍的限制，法院審理抗議案件不受抗議範圍的限制，例如一個案件，牽連到三個人，其中只有一人申訴，院長或檢察長審查的結果，

認為申訴人沒有理由，但是沒有提起申訴的那兩個人，却受了委屈。於是批駁了申訴人的要求，而對沒有提起申訴的那兩個人的判決或裁定提出了抗議。法院審理院長、檢察長提出的抗議，也有權這樣處理。這一切都說明了監督程序是高度地發揮了審判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以達到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讓一個坏人漏網。過去執行監督程序，只限於蘇聯最高法院和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一九五四年八月蘇聯最高法院主席團決定，省、市一級法院也可以適用監督程序，因而大大地加強了省、市法院審判工作上的積極性、主動性。這樣，既可以使省、市以上法院能及時地糾正錯誤的判決、裁定，為羣眾解決問題，又可以避免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因案件過多，路程太遠處理不及時的現象。

有了監督程序，上級法院不僅通過審理上訴案件來實現對下級法院的監督，它還可以通過院長、檢察長的抗議，來實現對下級法院的監督。它不僅有權利糾正未生效的判決，而且也有權利糾正已生效的判決和裁定。同時，院長發現本院審判員判決錯誤時，也可以通過抗議請法院再審，（但省、市法院院長不得對本院審理第一審案件所作出的判決提出抗議，只能對本院審理的上訴案件所作出的裁定提出抗議）藉以提高審判人員的業務水平。

對已生效的判決和裁定提起申訴和上訴不同，它不限於當事人，所有人民羣眾，只要發現判決或裁定有錯誤，都可以提起申訴。而法院對申訴人的來訪，都是由院長、審判員親自接見，為申訴人解決問題。因此法院實施監督程序的結果，促使法院更廣泛、更深入地接觸羣眾，緊密地依靠羣眾進行工作。

審判案件，是為了保護國家與公民的權利和利益。如發現判決或裁定的錯誤而不糾正，那是和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不相容的。所以必須認真地、徹底地檢查錯誤，糾正錯誤，作到審判公平合理。監督程序也就是為實現這個目的而制定的。前面所說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加強監督領導的效能，密切聯繫羣眾等，也都是實現這個目的條件。監督程序本身具備了這些優越的條件，加以貫徹執行，就能很好地完成它的任務。

由於我們政治水平和法律科學水平都很低，對於以上幾點體會，是極不深刻、極不全面的，其中也可能有不正確的地方，希望讀者加以指正和批評。我們這次在蘇聯短短的三個月裏，得到蘇聯司法工作者的熱心幫助，給我們種種學習蘇聯司法先進經驗的機會，我們所得到的收穫是很大的。蘇維埃法院工作具有高度的科學性，豐富的經驗，今後我們更應該深入地鑽研，不斷地學習，來豐富和提高我們的法律科學知識，進一步改進和加強我們的審判工作，以保障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進行。



# 苏联檢察機關工作的組織和領導

刘惠之

苏联檢察機關的任务是繁重的，多方面的，要求在工作中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精確性。同时，苏联檢察機關是一个高度集中統一的機關，各級檢察署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地方任何國家機關的干涉，只服从上級檢察長和總檢察長的領導，因此領導工作的好坏是決定檢察工作是否能够順利完成任务的主要因素。

苏联檢察機關工作組織的特點是分工科學，責任明確，高度地發揮了每个工作單位每个工作人員的積極性。

苏联檢察署在總檢察長和副總檢察長直接領導之下，按工作性質的不同，設有十九个工作單位，其中包括兩個專門檢察署——軍事總檢察署、運輸總檢察署和全苏犯罪对策科學研究所。各處、局的檢察員在正副處、局長領導之下，各有一定的分工，檢察員大部分是按地區分工，有的是按監督的對象分工，有的既按地區分工，又按監督的對象分工。按地區分工的是每一个檢察員分管一定的地區，負責掌握該地區內几个共和國和省檢察署有關本處、局的業務。例如民事審判監督處大部分檢察員是按地區分工，各對他所分管地區的民事審判監督業務負責，他經常了解研究和總結這一地區的民事審判監督工作和各種類型的民事案件，並給予具體的幫助，審查這一地區有關民事審判監督工作的報告，處理這一地區有關民事案件的申訴。同時他还負責了解這一地區每一民事審判監督幹部的業務能力和政治質量，並採取各種措施來幫助他們提高業務水平。另外有幾個檢察員則分別負責處裏的工作，一人負責處理特別交办的民事案件（苏共中央、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部長會議交办的），一人負責審查依監督程序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議的案件，一人每天負責接待公民（正副處長則每星期按規定時間各接待兩個半天），一人負責研究工作方法和編輯工作參考資料。出庭參加公判，則係由每个正副處長和檢察員輪流出庭。

在共和國和省的檢察署則根據幹部的多寡，採用另兩種分工辦法，如莫斯科

科市檢察署的一般監督處的五个檢察員除了每人分管五个區檢察署的一般監督工作之外，還分別對市一級機關關於以下五種主要法令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即：（1）關於和盜竊社會主義財產作鬥爭的法令，（2）關於技術保安的法令，（3）關於勞動法令，（4）關於和產品質量低劣作鬥爭的法令和（5）關於處理勞動人民申訴的法令。如果一個業務處的檢察員在三個人以下則一般是按監督的對象分工而不按地區分工，即分別對全區某類法令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區檢察署不設處，是在檢察長和檢察長助理間按業務性質進行分工。

偵查工作的分工是这样的：苏联檢察署和共和國、省檢察署的偵查處，都設有檢察員和偵查員，檢察員和其他業務處的一樣，是分別按地區對下級檢察署的偵查工作進行領導，偵查員則對全區內發生的重大刑事案件進行偵查。區檢察署如果有兩個以上的人民偵查員，也是分區對自己轄區內的刑事案件進行偵查。

這樣科學地進行分工，就會使工作安排得精確，不會發生有事無人做，有人無事做的現象。而是人人有事責，可以根據自己的職責範圍有條不紊地安排工作，深入地了解自己工作範圍以內的工作環境和社會情況，系統地鑽研和提高自己的業務，不斷地改進自己領導的業務。這樣可以高度的發揮每一機構每一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責任心。從而也就杜絕了產生官僚主義和事務主義的根源。

苏联檢察機關的組織是分工細，層次少，一般是局處長直接領導檢察、偵查人員，而區檢察署則由檢察長直接領導每一工作人員。各級領導幹部在領導工作上也有明確的分工，責任非常清楚。如果有幾個檢察長，就各人分別領導一項或幾項業務，有的處還由副檢察長兼任處長（幹部處和特種案件監督處一般是副檢察長兼任）。那些業務由檢察員自己負責處理，那些向副處長、處長、副檢察長或檢察長請示處理都有明確的規定。這樣做，就能够使整個機關的工作像機器一樣地很有秩序地進行，能够使領導同志擺脫事務主義和文牘主義，經常離開辦公室進行活的領導。



## 二

苏联的檢察機關為了正確地組織工作，除了以上所述的進行科學的分工之外，還非常重視工作的計劃性。各級檢察署都按季度定出工作計劃，並嚴格按計劃進行工作。這就將各級檢察機關的力量集中在當前的主要任務上，以保證有組織地與各種違法犯罪進行鬥爭而達到鞏固國家法制的目的，同時也就能够集中力量來不斷地改進檢察機關的工作。

苏联檢察機關的工作計劃是根據什麼來訂呢？第一是根據國家當時的中心任務。例如蘇共中央頒佈了加強農業的決議以後，檢察署就把對有關加強農業措施的法令的執行情況的檢查，對盜竊集體農莊財產的案件進行研究總結等規定到計劃裏去，在各地的檢察署，還可以根據當地當時對農業生產影響最大的違法情況的檢查規定在自己的計劃裏；第二是根據社會法制情況的反映。例如根據收到的材料反映出在供銷合作社系統中盜竊社會主義財產的現象很嚴重，在計劃裏就規定召集一些供銷合作社主管部門負責人舉行會議，討論加強與這種違法犯罪現象作鬥爭的各種措施；第三是根據檢察機關本身的業務情況。例如根據下級檢察署的統計報告，反映出移送法院的案件被裁定不起訴或作出無罪判決的案件很多，這就說明檢察機關和民警機關的偵查工作質量差，那麼在工作計劃裏就規定對偵查工作進行檢查，舉行偵查工作的學習會，抽調工作中有缺點或缺乏經驗的偵查處長或偵查員到上級機關來實習。如根據材料反映出某個下級檢察署的工作情況不好，就規定對該檢察署組織全面的工作檢查。

各級檢察署計劃是按季度訂的，因為計劃期間過長，就會常常遇到新的情況發生而要改變計劃，當然期間過短也不好。計劃是由上而下地制訂的，下級檢察署根據上級檢察署的計劃結合當地當時的具體情況來訂自己的計劃。下級檢察署的計劃則須由上級檢察署批准。為了保證計劃的切實執行，省以上檢察署的各個業務單位還可以根据本級檢察署的計劃來更具体地規定本單位的月度計劃，區檢察署也可根據季度計劃來制定月度計劃。但這種計劃就無須上級檢察署批准。

工作計劃規定的很具体，例如規定一項檢查工作的項目，就要具体規定檢查什麼單位？檢查什麼問題？要什麼人在什麼期間以內完成這一項計劃。不是籠統地規定「與××違法現象作鬥爭」就了事，這樣過於原則的規定，是否完成了計劃，就沒有一個明確的尺度，完不成計劃或者執行的有缺點，也看不出

誰應該負責。

計劃規定之後就適時地檢查計劃的執行情況，一般是在計劃執行的第二月或第三月初就進行檢查。如果到季度完結之後才進行檢查，那麼完不成計劃，就無法進行補救了。在檢查中還要對計劃執行人給以具体的幫助，經過嚴格地檢查和具体幫助，一般是能圓滿地完成計劃的。計劃完成後，執行機關還要寫出執行情況的報告。完不成計劃的還要說明不能完成的原因，如果是由於玩忽職守，還要根據不同的情節而受到適當的處分。

## 三

苏联檢察機關一貫和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的領導作風作鬥爭。強調運用活的領導。這種活的領導方法，主要是表現在上級檢察署對於所屬檢察署，檢察長對於所屬檢察、偵查工作人員的工作組織嚴格的檢查和總結，用各種方式對檢察、偵查人員給予具体的、直接的幫助。

苏联檢察機關反對只是坐在辦公室裏發號施令，只是根據書面報告濫發書面指示的領導方法。當然也並不是完全不要書面報告，不根據書面報告下達書面指示，而是把書面報告和書面指示減少到最低限度。各級檢察長和領導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對工作進行檢查、總結、幫助，並直接參加檢察、偵查的活動。例如苏联檢察署的各個業務處，經常有三分之二的業務人員不在辦公室裏，省和區的則更要多一些。不用說下級檢察署的，就是苏联的副總檢察長也經常親自下去領導進行工作的檢查和案件的偵查。

苏联檢察機關如何組織進行工作的檢查呢？

下級檢察署各項業務工作的進行，經常是由上級檢察署的各個業務處負責領導，並由各業務處的檢察員分別對他所負責的地區進行經常的檢查。除此之外，檢察長還須對下級檢察署組織全面的檢查，同時對他所屬的各個業務處的工作也須進行檢查，為此，在他領導之下，還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監督檢查處（省一級是專設一個檢察長助理）負責這項檢查工作的任務。

苏联檢察署對於每一個共和國檢察署工作，每隔三、四年要全面檢查一次，共和國和省則二、三年對每一個下級檢查一次。但如果根據材料的反映發現所屬的檢察署的工作缺點很多，就不到三、四年二、三年也要組織全面檢查。在出發檢查以前，由監督檢查處根據所掌握的材料作出檢查計劃，經總檢察長批准後，組織檢查組，根據檢查的重點，吸收各有關的業務處的檢察員或處長參加，由一個副總檢察長率領。檢查結束之後，寫好檢查意見書，然後在



被檢查單位的檢察長、處長、檢察員參加之下，舉行業務會議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在決議中指出缺點，分析產生缺點的原因，提出改進的辦法和改進的期間，並規定在何時下去檢查執行改進辦法的情況。最後總檢察長根據決議頒發命令。如果被檢查單位的缺點是嚴重的，則此種業務會議改在蘇聯檢察署舉行，由總檢察長或副總檢察長主持，要被檢查單位的檢察長和有關係的處長參加。

除了進行全面的檢查之外，如果發現某共和國檢察署對於執行總檢察長某項命令的情況不好，就組織對該共和國執行該項命令的情況進行檢查。如何組織檢查，檢查後如何處理，是和進行全面檢查一樣的，但與執行該項命令關係不大的業務處的檢察員就無須參加。此外，如果發現某共和國檢察署某項業務的工作有缺點，就不必組織檢查組，而是責成蘇聯檢察署有關的某業務處進行檢查，如檢查一般監督工作，就由一般監督處派人去檢查，檢查結果寫好的檢查書要由監督檢查處審查其檢查的質量如何。

對於同級檢察署各業務處的工作檢查，也由監督檢查處來組織進行。

在以上所述的工作檢查當中，如果發現了有關機關的缺點，也要向該機關提出意見書，要求予以糾正。例如在檢查一般監督工作的時候，發現某機關有嚴重違法的情況而未曾提過意見書，就應該向該機關提出，在檢查審判監督工作的時候，發現法院對某一條件的判決顯然錯誤，就應該根據監督程序對這一判決提出抗議。

檢查是逐級進行的，即蘇聯檢察署檢查共和國檢察署，共和國檢查省，省

檢查區。但在檢查共和國的工作的時候，一般同時也檢查一兩個省，共和國檢察署檢查省的工作的時候，同時也檢查一兩個區，這是為了使檢查工作更能全面，這樣的檢查可以了解被檢查單位對於下級檢察署的領導是否存在缺點。共和國對省、省對區如何組織檢查，檢查後如何處理，是和蘇聯檢察署的檢查是一樣的。

對工作的檢查，不僅是為了發現缺點，同時也要表揚成績，並對被檢查者給以具體的幫助。在檢查中發現工作有了缺點，即時向被檢查者指出之外，還教給以如何做才是正確的。例如發現抗議書做的不對，就要做出正確的給他看，統計表做得不對，就給以改正。如果發現被檢查的單位對某一項業務不熟練，缺點多，就在下一季度的工作計劃裏規定組織該項業務的學習會，或者規定抽調被檢查單位的檢察長或該業務處的負責人到上級檢察署來實習這一項業務。

領導工作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除了檢查工作以外，還有以下的方法：對檢察機關的各種業務和對各種類型的案件組織研究和總結；編發各種業務的工作方法參考資料，印發通報；如一般監督處還將各級檢察署的較好的抗議書和意見書編成「一般監督實踐」，發給各級檢察署參考，全蘇犯罪對策研究所還編印「偵查實踐」，刑事審判監督處也將較好的公訴詞印發，在審查下級檢察署的報告發現缺點時用書面給以具體的指示。

根據以上所述，蘇聯檢察機關的工作，是具備着高度的优越性，它實際上已發揮了蘇聯社會主義法制的保衛者的作用，因此它在蘇聯是享有很高的威信。

## 蘇聯司法幹部是優秀的， 幹部工作的經驗是豐富的

王懷安

今年我參加「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蘇代表團」，在訪問蘇聯各級司法機關中，給我深刻的印象之一是：蘇聯的司法幹部是極其優秀的。由於蘇聯黨和國家的培養，如同在其他部門一樣，在蘇聯各級司法機關中成長了一批具有政治修養、經過法律科學訓練、並富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優秀幹部。在我們所接觸

的所有蘇聯司法幹部中，都有一個普遍而又突出的特點，即每個幹部都是十分熱愛和忠於自己的工作。正由於他們普遍熱愛自己的工作，因而安於自己的工作，鑽研自己的工作，熟習自己的工作，從而成為自己工作的內行與專家。我們從未遇着一個幹部不愛他的工作，說自己的工作「冷門」，是「可有可



無」，相反的，不管是審判員、書記員、打字員都能深刻理解自己工作的政治意義。他們在工作職務上無高低之分，在勞動上無貴賤之別，只考慮自己在工

作上有無建樹，在勞動上有無創造。我們所接觸到的司法幹部，個個都是津津有味地講述自己所擔任工作的意義和興趣，而且普遍願以終生獻身於司法工作。比如在基層法院的人民審判員中，有很多業已從事十年以上的工作，有的甚至還從事二十五年以上。省級以上司法機關的幹部中，從事司法工作二、三十年以上的人則更多。他們不是「這山望着那山高」，更不是認為工作多年不調遷就是「沒出息」，而是以長期從事自己擔任的工作引為光榮。我們親自看到俄羅斯共和國司法部副部長馬·尼·西班牙娃是一個從十九歲做人民法院的書記員起，一直忠於自己的司法工作崗位二十九年，她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熟習自己轄區內的工作情況和精通自己的業務。這是我們在訪問過程中所遇着的無數實例之一。顯然，蘇聯司法幹部如此熱愛與熟習自己的工作，正是蘇聯司法幹部具有高度共產主義覺悟與政治修養的反映。毫無疑義，這是值得我國司法工作同志們很好的學習。

當然，蘇聯司法幹部如此熱愛與熟習自己的工作，除幹部本身的政治覺悟之外，還有工作上的原因，即蘇聯各級司法機關在幹部工作上還有一系列的優良制度。

首先，總結與推廣先進工作者的經驗，是一種鼓勵幹部與提高工作的好制度。蘇聯各級司法機關對任何建樹的幹部是大力表揚與熱情鼓勵的。在蘇聯司法機關中什麼人算是先進工作者，並應受到表揚呢？這一般要看他是否能嚴格遵守與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和在鞏固自己工作轄區內社會主義法制的的作用如何。這就是說，對一個好的人民審判員的要求，應當是他所作的判決質量要高，能及時而正確，積極地從事當地社會政治活動，能宣傳蘇維埃法令和幫助消除犯罪原因。比如，列寧格勒省嘉琴區第一段人民法院人民審判員薩維尼娃，就是這種類型的先進工作者之一。她原是人民法院通訊員，後作書記員，因工作優秀於一九五四年又被當地人民選為人民審判員。學習努力，經過中等法律學校畢業，現又在函授法律大學畢業。她所作的判決質量很高，在近五年內全部刑事判決只有兩件被上訴撤銷過。她不僅正確和及時地審理案件，還能：（一）在審理案件中很注意分析與追究犯罪的原因，作出個別裁定，指出有關部門在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中的漏洞，建議其糾正。計从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共作了這類個別裁定四十九件。（二）每月給人民陪審員上課和向選民做工作報告各一次，輪流到各村接待羣眾申訴和解答問題二次。（三）經常向居民做法律講演並經常在區的報紙上寫文章與解答問題。正因為她的判決質量很高和

積極參加當地社會政治活動，因此不僅是在全省、全共和國，而且經蘇聯司法部長發佈命令在全蘇司法機關中予以表揚。蘇聯對先進工作者的獎勵是多方面的。只要是優秀的工作者一般都能及時受到省、共和國或甚至蘇聯各級司法管理機關的表揚。共和國和蘇聯司法部除發給表揚命令外，還備有獎勵專款，作為物質獎勵，或獎給一定時間工資或贈給貴重物品（如刻字的金錶或小汽車）。這是司法系統給予先進工作者的獎勵。其次，由於一個優秀司法工作者還是工會會員，有的還是黨員，因此還要受到工會、有的還要受到黨的獎勵。如果成績特別優秀者，還要分別經共和國或蘇聯司法部部長推薦給共和國或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予以嘉獎。至於人民羣眾對於優秀的人民司法工作者更是熱忱愛戴和稱頌的。同時，所有先進工作者的經驗，更被各級司法機關廣泛傳播與推廣，並分別在本區、本省、本共和國、甚至全蘇司法機關範圍內廣泛傳播與推廣。的確，研究與推廣先進工作者的經驗，不僅是提高幹部的方法，也是一種把一般工作者和落後工作者的工作水平提高到先進工作者的工作水平，從而藉以把整個工作推向前進的有效的領導方法。

蘇聯各級司法機關對優秀幹部的獎勵是極為重視的，但對幹部的錯誤也是不姑息的。一個審判員如果（一）違反了勞動紀律，（二）因粗心大意或不守紀律在工作中造成了過失，（三）敗壞了蘇維埃審判員的名譽，就要追究紀律責任。當然有權提起紀律責任的，只能是蘇聯、共和國司法部部長及共和國司法部駐省辦事處處長或上級與本級法院院長；有權給予處分的只能是由蘇聯或上一級法院的紀律庭。處分是慎重而嚴肅的。例如烏茲別克共和國南滿崗省某人民審判員把一個不是流氓的公民錯判為流氓罪，科刑一年。由於檢察長偵查和起訴的錯誤，人民審判員又自己的過失失察作了有罪的錯判，而為被告作辯護人的律師也未給被告作無罪的辯護，這三個幹部便分別受到撤職、落選和開除的處分。這個例子正說明蘇聯國家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是最認真的，對於司法工作的質量和幹部水平的要求是嚴格的。自然，在蘇聯司法幹部中受處分的人是個別的，而被表揚的則是廣泛的。正由於蘇聯司法機關對於幹部的賞罰是如此分明，便更加鼓舞了幹部前進。

第二，司法機關有一套成熟的培養與提高幹部的教育制度，除國家廣泛設有大學法律系、法律學院和中等法律學校以培養符合標準的新的司法幹部外，對提高在職幹部還採取如下辦法：（一）動員與組織所有未受過高等法律教育的在職幹部參加高等法律函授學校學習，通過函授學校的系統教育，來實現人民審判員級以上幹部人人都要受過高等法律教育的要求。這是不脫產的在職幹部教育的主要形式。（二）設立提高各種幹部的訓練班，以調訓各級在職幹部。



(三) 各級司法機關廣泛採用簡而易行的業務學習辦法。首先是業務學習討論會。討論的內容主要是(一)檢查工作和總結審判實踐中發現的當前司法工作中的重要問題；(二)或是先進工作者的經驗報告；(三)或是新頒佈的法令和上級指示。其方法是先由一個負責人根據工作實踐中發現的問題，並上升到理論和法令上來作報告，然後讓大家討論。人民審判員的業務學習討論會，一般是以省或市為單位召開，每月舉行一、二次。在地區較遠的農村地區則分片召開，或每季開一次，一次連續討論幾天。人民審判員每月的業務學習討論會是由共和國司法部駐省辦事處主持與組織，但每次討論會的主持人(報告人)也可能是省司法處長或檢查員，也可能是剛剛作過某類審判實踐總結的法院院長或審判員，也可能是先進工作者或法學教授。這是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由於這是一種從實踐中所總結出來的問題再提到理論高度來教育幹部的方法，因而受到全體幹部的歡迎，成效很是顯著。其次是把下級司法機關某些還需要具體幫助的幹部抽調到上級司法機關進行業務實習。實習前要告知本人有何缺點，因何需要到上級機關來實習；實習中，上級機關指定有經驗的專人來作具體幫助；實習結束時還要作出實習鑑定，並附入幹部檔案，以資督促改正。

這是一種很具體的提高幹部，並藉此熟悉幹部的方法。再次，還抽調工作優秀的人民審判員、人民法院執行員或秘書到工作組織得較差的人民法院去幫助工作，或者抽調工作較差的人民審判員、執行員或秘書到工作先進的人民法院去觀摩。此外有關政治、文化上教育工作則由當地黨、政機關主持，如舉辦馬克思列寧主義夜大學和文化學校等。正因為蘇聯司法機關用各種方法來鼓勵與幫助幹部學習，所以在蘇聯司法幹部中普遍形成了努力學習、力求進步的濃厚空氣和優良習慣。

第三，還建立了司法管理機關對幹部的管理制度，即各級司法管理機關對自己所管理的幹部經常進行了解研究，並負責挑選、配備和有系統地幫助與培養工作。當然蘇聯各級黨委對司法機關的幹部，特別是主要幹部的選配是要給予關懷與幫助的。這樣在幹部工作上，既有黨委的總的管理和關懷，又有司法行政機關在業務上有系統地教育、培養和管理配備，從而更有助於司法幹部的專業化。

因此，蘇聯司法幹部的優秀品質值得我國司法工作者學習，蘇聯司法機關在幹部工作上的豐富而又先進的經驗，同樣值得我國司法機關的學習。

## 蘇聯律師的工作與組織

王汝琪

### 蘇聯律師在鞏固社會主義法制中的作用

根據蘇聯「律師條例」(一九三九年蘇聯人民委員會批准)的規定，蘇聯律師的任務是對公民、機關、團體、企業給予法律上的幫助，以保障他們在法律上的權利，其具體工作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給居民解答有關法律的問題，並提供法律上的意見。蘇聯之所以把居民有關權益糾紛上法律的問題交給律師解答而不交給法院解答，主要是因為居民在詢問之後可能向法院起訴，如果法院在未調查案情前就予解答，可能引起審理案件上的被動；同時，還可以使法院集中力量審理案件。當律師給居民解答問題時，是在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前提下進行的，既預防居民間的糾紛(對不應起訴的案件就勸居民不起訴)，又極力保護居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列寧格勒市古比雪夫區法律顧問處旁聽了一位律師給一位女公民解答有關房屋問題

的詢問：原來這位女公民家住着一位媳婦，後來她辭退了媳婦，媳婦本應搬家，但卻堅持不搬，這位女公民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媳婦搬家的訴訟。當這位女公民第一次去找律師時，律師問，媳婦住她房子不搬家是不是她住房面積超過了政府的規定，這是要弄清的的第一個問題，其次要強制搬家是不是媳婦業已經過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房屋管理委員會通知搬家而不搬家。請這位女公民先去弄清這兩個問題後帶着住房面積和房屋管理委員會的通知等證件再來找律師研究向人民法院起訴的問題。事實上這位女公民的住房面積並不過政府的規定，後來房屋管理委員會又通知了媳婦搬家，媳婦仍不肯搬，這位女公民就帶了兩個證件第二次去找律師，律師就允許了這位女公民的要求，替她寫了起訴狀。律師還從研究和總結解答詢問中發現問題，以提高律師本身的工作並向有關部門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例如列寧格勒市古比雪夫區的一個樂器工廠今年連續有三個工人到該區的法律顧問處去討論與廠方的勞動爭議問題，經該法律



顧問處的研究和總結，發現了該廠廠方違反了勞動法，經向該廠提出了改進工作的建議，該廠就不再發生這類問題了。

第二，依公民、機關、團體和企業的請求，撰寫申請書、控訴書及其他文件。蘇聯的公民、機關、團體和企業之所以要找律師代寫申請書、控訴書或其他文件，是因為律師懂得法律，寫出文件的文字更確切。但法律上並未規定必須找律師代書。

第三，作為刑事被告的辯護人，民事被告、原告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的代理人，參加訴訟。律師不僅以言詞辯論在法庭上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可以監督檢察院和法院在起訴和判決中有無錯誤。在蘇聯當法院審理第一審案件時，不論是刑事或民事案件一般都有律師參加，這是因為律師熟悉法律，更懂得從法律上去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所以當事人都願意聘請律師。蘇聯法律規定，法院對於沒請辯護人的未成年人或聾啞的被告人必須指定律師；如果在幾個利害矛盾的被告之一方聘請了律師，法院必須也為他方指定律師。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如果法院不給被告指定律師，上級法院可以作為撤銷其判決的理由。按蘇聯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律師只能從開庭審理時開始為被告辯護，故律師不能參加預審庭。

前面已經指出，不僅公民可以請求律師幫助做以上三方面的工作，機關、團體、企業也可以聘請律師做法律顧問，進行這三方面的幫助。這種幫助有的是長期的，也有的是為了解決一個臨時問題的。不少法律顧問處在工廠、劇院、科學研究機關的聘請下，派固定的律師去經常幫助工作，如派去的律師因故缺席，就須另派一位律師去代理。這種法律顧問同時受法律顧問處和工作所在單位的雙重監督。據列寧格勒市古比雪夫區法律顧問處的主任告訴我們，許多工廠、機關認為聘請律師去當他們的兼職法律顧問比他們聘請的專職法律顧問的工作效能更高，因為律師可以把他們的問題提到法律顧問處集體研究。

此外，蘇聯的律師還負有進行社會工作的義務。這包括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幫助市或區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或工會解答羣眾有關法律的詢問。二是做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法律部的報告員，向居民作法律報告，報告題目由法律顧問處與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共同決定，例如關於勞動法、蘇維埃人的道德、蘇聯憲法、反對盜竊社會主義財產的鬥爭、婚姻家庭法、對於母親和兒童的保護、住宅問題等。報告提綱由律師擬定後送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審查，然後報告人憑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通知（卡片）到工廠、集體農莊等地去作報告，報告後要由听報告機關的主持人填寫對報告效果的反映（寫在卡片的後面）。法律

顧問處對於律師的報告工作要進行監督，要找報告員談話並檢查其報告稿，使律師做好這一工作。區蘇維埃對於報告好的律師發給獎狀。從事社會工作不僅是律師必須盡的義務，同時也為律師所樂為，因為蘇聯律師有着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都充滿了為人民服務的熱情，同時，從事社會工作可以更廣泛地接近羣眾，只要自己的工作良好就會得到羣眾的愛戴，凡是社會工作好的律師，羣眾來請求給予法律幫助的也多，因此，從事社會工作也成為律師開展自己業務的重要條件。

據列寧格勒市古比雪夫區法律顧問處主任告訴我們，律師要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時間為公民解答口頭上的詢問和進行社會工作。例如該顧問處今年第一季度一個收入最多的律師的工作量是：辦案十九件，代寫文件二十五件，解答口頭詢問一一件，作報告九次。

從蘇聯律師的工作任務上可以看出，蘇聯律師在鞏固社會主義法制中的作用是很明顯的：首先，通過給公民、機關、團體和企業以法律上的幫助，成為公民、機關、團體和企業法律上的幫助者與支持者；其次，通過對於來訪者提供法律上的意見，不構成訟條件的勸其勿向法院起訴，並監督法院的審判，成為法院受理案件的第一道防線和助手；第三，通過向來訪者解答有關法律的詢問，向居民作法律報告，成為宣傳國家法令的一支隊伍。

## 蘇聯律師的組織與領導

### （一）蘇聯律師制度的歷史發展

蘇聯律師制度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1）十月革命後在各市由司法機關提出律師名單，經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批准後送法院備用，當法院辦案時可以就這一名單為當事人指定律師。這些律師都是各機關的幹部，他們做律師是兼職，在執行律師職務期間保留其原崗位的工資。由於這種兼職的律師活動是作為社會義務負擔的，故無報酬。（2）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佈了關於在省、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內設立律師協會的命令，在命令中並規定律師對勞動人民進行法律上的幫助是義務，故不收費，但律師的原工作機關必須容許律師去作辯護並保留其工資；對於資產階級的幫助則收費，收費數額由律師與請求幫助的資產階級協商。（3）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成立專職的「辯護人協會」，這個協會仍然設在省、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內。這時的律師是從原來的兼職律師中逐步脫產出來的。同年，蘇俄司法人民委員部通過了律師收費辦法，律師對於勞動人民的幫助按這個辦法收費，對非勞動人民幫助的收費數額則由雙方協商解決。從這時起並規



定律師須將其收入的一定百分比交律師協會主席團，作為律師協會主席團和見習律師的薪金、法院指定辯護人的報酬、社會保險、辦公文具等開支。(4)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蘇聯人民委員會通過了「律師條例」，全蘇的律師組織與活動均依此條例進行(詳後)。

### (二) 蘇聯律師協會的組織與任務

蘇聯的律師協會是根據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蘇聯人民委員會通過的「律師條例」進行活動的。根據這個條例的規定，為了對居民給予法律上的幫助，在各省省會(包括邊區、自治共和國)建立律師協會，城市只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市有律師協會，在不劃省的共和國就設共和國律師協會。律師協會是從事律師活動者自願結合的社會團體。凡不是律師協會會員而又要進行律師活動者須得蘇聯司法部長或共和國司法部長的批准，否則任何人均不得從事律師活動。現在從事律師活動者都是律師協會會員，又都是工會會員，得享受勞動者一切權利上的保障(如休息權、社會保險等)。律師協會會員不得在機關和企業內擔任職務，但經律師協會主席團的許可，可以任機關與團體內的選任職務，或做教員及科學工作者。律師協會的活動由其主席團領導，主席團在律師協會會員大會上用秘密投票產生(在會員多的地方可由會員選舉出來的代表會活動與主席團的活動。律師協會會員大會一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須有半數以上的會員到會才能開會)，在大会上進行以下工作：(1) 選舉主席團與監察委員會；(2) 听取和討論主席團與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報告；(3) 確定主席團的工作是：(1) 接受新會員；(2) 確定設置法律顧問處，分配接收的新會員到法律顧問處去工作並任命其主任(只有律師協會主席團是法人，法律顧問處不是法人)；(3) 確定法律顧問處的律師人數和預算；(4) 對法律顧問處的工作和全體律師的工作進行監督。

什麼樣的人才能做律師協會會員呢？根據蘇聯現行「律師條例」的規定，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可以做律師協會的會員：受過高等法律教育者；受過中等法律教育並做過審判員、檢察長、偵查員、法律顧問一年以上者；雖未受過法律教育但無年齡的規定，實際上最年輕的也在二十三歲以上。蘇聯「律師條例」草案則規定今後只有受過高等法律教育者才能做律師協會會員，但也有個別例外，即雖未受過高等法律教育，但已從事司法工作一定年限並經司法部長批准者亦可做會員。「律師條例」草案之所以這樣提高律師的條件，因為現在蘇聯已培

養了很多的高等法律學校畢業生可以做律師，而過去廢除了舊的律師制度時，必須以工農出身的幹部去當律師，故舊條例對於律師條件的要求要低些。至於被剝奪選舉權、有前科、被偵查或正在受審者當然均不得為律師協會會員。如果果要加入律師協會者被其主席團拒絕了而不服，可向共和國司法部長直至蘇聯司法部長提出控訴，蘇聯司法部長的決定是最後決定。凡是高等法律學校的畢業生被分配去補充律師協會會員的，先由律師協會分配到法律顧問處見習至少六個月，並由一個有經驗的律師指導其工作。見習期間由律師協會付給一定工資，他工作的收入也全部交給律師協會。見習期滿時，主席團可根據指導人的提議組織專門委員會進行討論，如果合格就予通過並接收其為會員；如果條件還不夠就延長其見習期；如果不適合合作律師就介紹他去別的工作。如果條件主席團還可以開除會員或給會員以紀律處分(詳後)。

### (三) 法律顧問處的工作

法律顧問處是律師協會直接幫助居民的機構，它是一長制，即由主任領導其工作，律師必須服從，如有意見可以提出。蘇聯「律師條例」規定法律顧問處主任的任務是：(1) 正確組織律師的勞動分工，合理地給律師分配工作，使之忙閒均勻；(2) 幫助新的律師完成其任務；(3) 保證供給律師以法律、法令和書籍，使他們能正確地回答詢問和進行工作；(4) 嚴格監督執行勞動紀律；(5) 確定收費數額在收費標準範圍內伸縮，也可以確定免費事項；(6) 監督每個律師的活動，如有破壞勞動紀律的情節就向省律師協會主席團反映；(7) 書面回答有關法律顧問處各種問題。

律師工作的程序是：凡是請求律師幫助的公民須先向法律顧問處的值班律師說明來意，然後分配給律師接談。對於口頭解答居民的詢問，一般不收費，但解答複雜的詢問(有關離婚、財產繼承、建築權、房屋等問題)則要收費，還可以因為請求人的經濟困難而予免費。律師辦案和代書都收費。收費數額由法律顧問處主任或副主任依照蘇聯司法部頒發的律師收費辦法決定，委託人不是直接與律師本人而是與法律顧問處簽訂合同(卡片)，在合同上要填寫被委託的事項及收費的數額，並由委託人與法律顧問處主任簽字，然後將案件分配給某個律師去辦，主辦律師須在這個合同(卡片)上繼續填寫案件處理的過程並簽字。這樣，這個合同也就同時是律師進行活動的登記卡片，是當時或事後檢查律師工作的根據。此外，為了便於進行工作與查考，律師每辦一案就須建立一個卷宗，在卷宗內保存有關案件的各种副本，並在卷皮內簡單記錄辦案經過。



法律顧問處監督律師工作的方法是檢查工作，其方法有三：(1) 指定一個律師具體檢查另一個律師的工作。(2) 檢查律師辦案的卷宗。有時是檢查一個律師在一定時期內的工作，有時檢查辦理一個案子的的工作，有時只檢查某一部分的工作情況(如準備工作、在法庭上的發言等)。檢查的結果如對改進律師工作有重要意義就在律師會議上討論，如不很重要就由檢查人或主任找被檢查者談話。(3) 還常派人到法庭上去速記律師的辯護詞，然後給予評論。評論一般都在律師會議上討論。以上是對律師個人工作的檢查。此外，還對於法律顧問處的工作進行檢查，即對整個法律顧問處所辦的某一類案件予以綜合研究，找出其缺點，以便改進工作。

給律師分配工作是法律顧問處一項最複雜的工作。因為律師是靠收入維持生活的，因而適當地給律師分配工作就很重，工作少了，收入也就會減少。法律顧問處主任、副主任根據律師的忙閒分配工作，但有時委託人要指定某個律師為他辦案，如果分配不好就可能產生忙閒不均的現象。如果被委託人指定的律師忙不過來，可由法律顧問處和委託人商量換人；如果委託人不指名請律師，就可由主任、副主任根據律師的業務水平及工作忙閒情況作統一地分配。委託人向法律顧問處的會計繳費，然後由法律顧問處按照每個律師收入的多寡分配給律師。律師的平均收入一般稍高於人民審判員(按：蘇聯人民審判員月薪為九百八十盧布)，例如列寧格勒市古比雪夫區法律顧問處的律師每人每月實際平均收入一千二、三百盧布(不包括扣除部分)。按照蘇聯律師收費辦法的規定，法律顧問處要在收費中扣除一部分作為律師公用的基金，扣除不得超過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例如列寧格勒市古比雪夫區法律顧問處每月扣除律師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其中百分之六為法律顧問處工作人員的工資，百分之六為本人的假期工資，百分之六為幹部培養費，百分之六為互助儲蓄，百分之四點五是勞動保險，百分之三點五交主席團供其開支。

#### (四) 蘇聯司法管理機關怎樣監督律師協會的活動

蘇聯司法部通過加盟共和國司法部、自治共和國司法部和省司法處對於律師協會的活動負責進行總的監督，而省司法處更對律師協會負責直接的監督責任。司法管理機關對律師協會之所以是監督關係而不是領導關係，因律師協會是羣眾性的社會團體而不是政府機關，故司法管理機關對律師協會不用指示而用信，但信的執行效力是和指示一樣的。蘇聯司法部對律師協會進行以下監督：(1) 批准律師協會的設置；(2) 根據工作的需要確定各律師協會的人數；(3) 蘇聯司法部長確定「律師收費辦法」；(4) 蘇聯司法部長確定律師協會的編制及其行政工作人員的工資。

各級司法管理機關監督律師協會活動的主要方法是檢查工作，即檢查律師協會主席團對「律師條例」和「律師收費辦法」的執行情況以及律師工作的質量等。每季各級司法管理機關都將檢查若干律師協會或法律顧問處工作的計劃訂在季度計劃內。蘇聯司法部在檢查工作中，有一次發現一個律師協會主席團不按「律師條例」在會員大會上通過預算，就通知銀行暫不讓主席團取款，並責成主席團召開會員大會通過預算。又如，在檢查工作中發現一個律師協會主席團已有兩年半不召開律師大會，會員很有意見，經蘇聯司法部派人召開會員大會的結果，主席團原有成員都被大會改選掉了。蘇聯司法部或共和國司法部在檢查工作中如果發現了重大問題，就提交本機關的部委員會討論，並邀請被檢查的律師協會主席團主席和其在共和國司法部或省司法處長參加，在討論中指出其缺點，並以蘇聯司法部長或共和國司法部長簽署的信件責令該律師協會限期改進其工作。蘇聯司法部和共和國司法部還總結律師活動實踐，並召開律師協會主席團主席的會議，以交流經驗、指導工作。

#### 蘇聯律師的獎懲

蘇聯對於律師的獎勵是很重視的。只要律師的工作在鞏固社會主義法制中作了較大的貢獻，就會受到黨政機關的嘉獎，也會受到羣眾的擁護。例如在衛國戰爭期間列寧格勒市的律師三分之一參了軍，三分之一犧牲了生命，只剩下三分之一在律師工作的崗位上。當時的工作環境是極其困難的，但他們堅持了工作，幫助了列寧格勒城市的保衛工作，因此大部分人都受到市的甚至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獎勵，其中有一位現已達七十高齡的老律師烏斯賓斯基，他當時所遇到的困難不僅是在零下四十二度的嚴寒中步行(因交通工具缺乏)到很遠的監獄去進行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當時因糧食缺乏，市內發生了對於糧食的投機犯罪，同時也有個別公民因糧食問題而犯過失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既要嚴懲糧食的投機犯罪，又要防止侵犯偶然犯過失公民的權利，劃清政策界限成為當時律師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而烏斯賓斯基却在列寧格勒的保衛戰中完成了這一項艱巨的任務，因而受到蘇聯最高蘇維埃的獎勵。

蘇聯「律師條例」規定，律師的義務是：很忠實地工作，遵守勞動紀律，按時出庭，完成任務和委託，愛護法律顧問處的財產。故蘇維埃的律師必須是確切不移地遵守法律的模範，必須具有高度共產主義的優良品質。如果有違反這種規定的就要給予嚴格的處分。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作為開除的理由：經法院判決有罪者；曾犯過損壞蘇維埃律師名譽罪行者；違反律師協會內部勞務規則



者。遇到以下情况的可以提起紀律責任：应出席法院開庭時遲到（如果因法院延期審判，屆時律師又早已按計劃安排了其他工作致不能出席，則不負遲到之責）；在法庭上故意提出枝節問題致拖延訴訟，醉酒上法庭，接受了當事人委託中途不辦，被分配做法律報告而又不辦，辦案不負責任，不認真進行學習等。在處分中除開除外，還有批評、警告、停止工作六個月等。例如烏茲別克共和國司法部去年在檢查南滿崗省的法院工作時，發現有一個人民法院錯判了

一件案子，把一個不是流氓的公民判為流氓罪，科刑一年。在這一錯判上不僅檢察長起訴錯了，審判員判決錯了，而且律師也沒有為被告作無罪的辯護。因此，不僅由檢察院方面撤銷了那個檢察長的職務，那個人民審判員不再被提為候選人，而且把那個律師的錯誤提交南滿崗省律師協會主席團討論後並予以開除。

## 苏联的法律教育

毛 鐸

苏联社会主义的法制是根据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國家觀与法律觀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障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建設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手段。苏联的法律教育是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服务的，它在培养和提高法律幹部，教育人民嚴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和与破坏蘇維埃法律的行为進行無情的鬥爭等方面，起了和起着直接的重大作用。苏联共產党和苏联政府一直重視和關懷法律教育工作，並採取了各种措施來改革、建立和發展法律教育。

苏联的法律教育制度是在徹底廢除沙俄反動的法律教育制度後依据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則建立起來的。三十多年來，它緊密地適應着國家各个時期政治經濟的發展及對幹部需要的情况而發展。在它建立和發展的过程中，並和各式各樣反馬克思主义的法律觀點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

沙俄時代的法律教育制度，像現代一切帝國主义國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一樣，是極端反動的。它的目的只是培養效忠於反動政权的官僚和維護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奴僕。在舊大學法律系受教育的都是官僚貴族、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弟。舊大學法律系的課程主要是神學、教會法以及其他維護剝削、維護反動政权的法律。這種反動的法律教育制度和蘇維埃制度完全不相容的，必須徹底加以廢除。因此，在十月革命勝利後，隨着蘇維埃政权的建立，許多舊有的高等法律學校先後停辦，剩下的只有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喀山大學等少數學校的法律系，黨和政府也隨即着手對它們進行根本的改造。

改革舊法律教育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律教育的根本問題，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則，把法律教育納入共產主义的軌道，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觀點來進行法律教育，來建立法律教育制度。

改革舊法律教育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律教育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改變學生的成份。當時，為了使那些過去不可能受高等教育的工農子弟能够進高等學校學習，曾在大學裏開辦了「工農補習學校」，使他們在這裏學習兩年後，即可直接升入高等學校。這一措施，使大批工農子弟獲得了充分享受高等法律教育的机会，從而保證了大量的學生來源和培養出來的法律幹部都是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新人才。

改革舊法律教育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律教育的另一重大措施，就是改造舊法律教師和培養新的法律師資。由於當時絕大多數舊法律教授都反對蘇維埃政权，少數的虽表示擁護蘇維埃政权，但法律觀也是反動的，不經過艱巨的思想改造，便不適宜於任教。這就要求蘇維埃政权必須迅速大量地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法律師資，來担負起培養新型法律幹部的任务。因此，特別成立了「紅色教授學院」，來專門培養各大学法律、經濟、哲學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師資。選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的都是具有實際鬥爭經驗並有相當政治文化水平的革命幹部，他們進修兩年後就到各大学去任教。這樣，就使法律系有了成批的為馬克思列寧主义政治理論和法律科学知識所武裝的工人階級自己的師資，根本上改變了法律師資的成份。

不斷改進法律教育制度及其組織形式，也是發展社会主义法律教育的一種重大措施。為了徹底廢除舊的法律教育制度，苏联在一九一九年即取消了各大



學舊的法律系，創設了社會科學系，其下設立一個政治法律部，為發展社會主義法律教育奠下了始基。其後，社會主義的法律教育便隨著蘇維埃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而日益發展起來，它的規模和組織形式也適應着各個時期國家對法律幹部的需要情況而得到不斷的擴大和改善。

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初期，在尖銳的階級鬥爭形勢面前，革命的法律幹部異常缺乏，必須迅速大量地培養和訓練法律幹部，以加強法院、檢察署和其他國家機關。當時，高等法律教育已着手進行改造，但還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因而適應急需的短期訓練班就成為當時培養法律幹部的主要形式。

隨着國家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黨提出了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以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並要求法律幹部在數量上和質量上應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法制的加強而增長。當時的短期訓練班和大學裏的蘇維埃法律與蘇維埃建設系已經不能適應這一要求。因此到一九三〇年，便將蘇維埃法律與蘇維埃建設系劃分出來，成立了獨立的蘇維埃法律學院與蘇維埃建設學院（蘇維埃建設學院後來合併於法律學院），以便集中地大量地培養法律幹部。同時教學制度和教學內容也作了新的改變，使學生能受到全面的法律教育，獲得廣泛的法律知識，以適應當時國家對法律幹部的需要。法律學院在從它建立時起的二十多年中，是培養新的法律幹部的主要形式，正如蘇聯高教部經濟法律教育司副司長阿·弗·謝巴諾夫在「改進法律幹部的培養工作」（載「蘇維埃國家與法律」雜誌一九五五年第一期）一文中所指出：在以往的時期內，法律學院培養出了大量的法律專家，他們現在在國家管理、文化和教育各部門中起着顯著的作用。法律學院在培養法律科學的科學研究幹部的事業中作了巨大的貢獻，它們培養出了今天在高等專門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裏工作的教授、教員和科學工作人員的基本部分。

到了一九四〇年以後，為了培養更多的法律師資和科學研究人員以及為國民經濟部門和國家機關培養大量的公證、公斷、律師、法律顧問等專門人才，才相繼在一些大學內設立法律系。

在衛國戰爭以後，國家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而法律工作幹部不少在戰爭中犧牲了，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趕不上國家的需要。針對着這種情況，在斯大林的親自指導下，蘇共中央通過了對加強法律教育工作和法學研究工作具有歷史意義的「關於擴充和改善全國法律教育的決定」。根據這個決定，除力求提高法律科學水平和教學質量外，法律學院和大學法律系每年招生名額也从三千增加到六千五百名，建立和擴充了三十所專門培養中級幹部的兩年制的中等法律學校，規定每年招收三千學生，有計劃地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其他城市建立和發展了提高在職幹部的各類短期訓練班，函授教育也獲得了充分的發展。由於採取了以上的各種措施，衛國戰爭結束後存在的司法幹部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的現象便迅速得到改變，從而對發展國民經濟、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起了極大的作用。

蘇聯的法律教育在它建立和發展的过程中，曾經不斷地與各式各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點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並在克服了這些反動和錯誤的觀點中獲得了不斷的發展。

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由於人民對沙皇的法律極端仇視，因而產生一種非常有害的看法，認為「法律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用不着法律」；當時，潛藏的暗害分子便乘機散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法律要消亡」、「蘇維埃法律與資產階級法律並無區別」等謬論，企圖瓦解無產階級專政，混淆無產階級法律與資產階級法律之間的原則區別，達到其取消革命法制，幫助地主資產階級復辟的目的。黨堅決地與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反動的法律觀點進行了鬥爭，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法律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工具，給了潛藏的暗害分子以迎頭的打擊，並教育了廣大人民羣眾。

以後，到一九三〇年左右，有些法學家看到富農已被消滅，就認為「隨着城鄉資本主義的消滅，社會主義法律就沒有什麼必要了」；直至一九三八年左右，也還有人認為「隨着社會主義的建成，國家和法律也要隨之消滅」。但是，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點都經不起馬克思主義法學家的駁斥，並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巨輪下被碾得粉碎。正因為不斷地粉碎了所有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的法制日益昌盛起來，社會主義的法律教育也才得到不斷的發展。

蘇聯法律教育歷史發展的這些特點，是值得我們深刻地參考的！

## 二

現在，蘇聯正處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國民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繁榮，社會主義的法制也隨着而更加完備。共產主義建設實踐所提出的新任務、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進一步發揚，以及國際關係中鬥爭的複雜尖銳，都要求法律幹部具有更高的質量。因此，當前蘇聯法律教育的任務便是：一方面大力提高現有法律幹部的科學水平；一方面進一步改進高等法律學校的教學，以期培養出質量更高的新的法律幹部。

在蘇聯，現在對新法律幹部的培養工作是由大學法律系、法律學院和中等



法律學校分別担任：大學法律系偏重於培養法律教育師資、科學研究人員、國家機關和經濟部門的法律專門人才；法律學院偏重於培養審判、檢察等機關的實際工作幹部；中等法律學校主要是培養基層司法機關的一般幹部。蘇聯高等法律教育網已普及於國內所有重要的區域，每一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都能得到熟悉該共和國語言、經濟和文化特點的法律幹部。高等法律教育逐漸統一到大學法律系的這種趨向也在加速，大學法律系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最近作了一次重大的修訂，這就保證了新培養出來的法律幹部都能具有高尚的政治品質、廣泛而深刻的法律科學知識和獨立工作的能力，成為對於任何法律部門的工作都有足夠準備的法律人才。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通過了「關於改進具有高等和中等專門教育程度的專家培養、分配和使用工作」的決議，這一決議對於進一步發展高等法律教育有着巨大的意義。根據這一決議和今後對法律幹部需要的情况，在法律教育方面採取了如下重要措施：

(一) 加強和擴大大學法律系，把許多法律學院都歸併到大學法律系裏去。這一方面改進了对年輕專家培養的条件，使他們有更長的時間來學習和研究更廣泛的法律科學和其他方面的知識；一方面，由於法律師資的集中，也有利於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和開展科學研究工作。

(二) 保留三個法律學院，但提高其招生条件。即必須年在二十一歲以上，有一定實際工作經驗，並經黨、團或蘇維埃機關介紹，始得參與入學考試。這樣，便使畢業出來的學員能够立即勝任區（相當於我們的縣）檢察長、區檢察長助理、偵查員、人民審判員等工作。

(三) 逐步撤銷兩年制的中等法律學校，因為它已完成了大量培養一般法律幹部的歷史使命。

同時，对在職法律幹部的訓練和提高工作，也有了進一步的加強，它採取了以函授教育為主，以短期輪訓為輔的方法。

蘇聯的法律函授教育特別發達。它是大量提高在職司法幹部的有效形式。函授教育的优越性，就在於它既能使大批幹部不脫離生產而受到高等法律教育，又能節省國家教育經費。現在，蘇聯有一個全蘇法律函授學院和十四個分院，十個大學法律系，三個法律學院都設有函授部，函授網已遍及於全國各地。參加函授學習的共有二萬七千名幹部，其中大都是各司法部門的領導和骨幹幹部；此外，還有國家管理機關和黨組織的幹部。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号召所有沒有受過高等法律教育的法律幹部都要參加函授學習。函授學習制度是極其嚴格的。各業務部門都極其關懷函授生的學習，支持他們並對他們經常加

以切實的督促和檢查。函授學習期限一般是五年，畢業後取得与普通高等法科學校畢業生同等的資格。

短期訓練班現在在蘇聯仍然是提高在職法律幹部的一種重要形式。法律幹部短期訓練班主要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專為州以上各司法部門負責幹部進修而設立的一年制高級訓練班，其目的着重在解決理論、政策、法律觀點方面的重大問題。一種是專為區級各司法部門負責幹部設立的六個月司法幹部訓練班，偏重講授刑、民法和刑、民事訴訟等主要法律課程，來提高幹部的法律科學知識水平和運用法律的能力。另一種是專為人民法院和區檢察署的書記員、執行員等設立的三個月訓練班，主要以解決具體工作中的問題，提高其業務能力為目的。這些訓練班均由蘇聯司法部統一領導，數目不很多，並且都設立在較大的城市。此外，在蘇聯總檢察署領導下，還有一年制的高級檢察幹部訓練班，一年制的區檢察長和檢察長助理訓練班、二年制的偵查學校。所有這些訓練班規模雖然一般不大，但對提高法律幹部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為蘇聯法律教育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

### 三

蘇聯的法律教育有着崇高的目的、正確的指導原則和科學的教育制度。這些，保證和促進了蘇聯法律教育的日益發展和昌盛。

第一、蘇聯的法律教育具有鮮明的黨性和階級性，它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觀與法律觀的基礎之上，始終不渝地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捍衛勞動人民利益，以及為發展各國人民間友好合作關係服務。從它建立的初期起，便確定了向工農兵勞動羣眾開門的方針，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理論和法律科學知識來武裝工人階級自己的法律幹部。三十多年來，它培養出了大量的忠於蘇維埃政權的法律專門人才，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強大和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因為它能够完全適應於無產階級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要求，能够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以及和勞動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就為自己開闢了迅速發展的道路。同時，也正因為它能够賦予每個法律幹部以明確而高尚的目的，使他們每個人都自覺到自己是共產主義大廈的創建者，是工人階級優秀的戰士，這也就鼓舞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了他們的榮譽和責任感，從而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孜孜不倦地鑽研業務，改進工作。

第二、蘇聯的法律教育貫徹着不可動搖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不論是在高等法律學校還是在短期訓練班，理論與實際聯繫都被當作教學和科學研究的



基本指導原則，而得到特別的強調和全面的貫徹。

理論與實際聯繫的原則的具體運用，首先表現在各類法律學校和訓練班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都是切合實際的，它們適應着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的發展，因而就使整個教學工作能夠遵循着正確的方向進行，並且保證培養出來的法律人材能合乎國家的需要。

也表現在對每一具體的教學環節都強調密切結合實際，聯繫現實，反對教條主義。例如，要求講課內容必須反映科學上的最新成就，必須概括實際工作的經驗；要求課堂討論必須引導學生用所學的科學知識去理解實際問題，以及重視生產實習、實習課和邀請業務部門幹部講課和作專題報告等。

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由於學校與業務部門的緊密結合和相互幫助而得到了更好的實現。在蘇聯，業務部門非常關心和重視學校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從各方面給以一切必要的幫助，如經常供給學校以許多實際材料，吸收教師們參與有關的總結工作會議，經常派人為教研室或學生的科學小組作報告，有些業務部門的負責人還直接參加教研室工作（如烏茲別克共和國司法部副部長便兼任着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刑訴教研室主任），尤其是中等法律學校和訓練班，業務部門幹部參與教學工作的就更多。學校也非常重視深入到業務部門和實際生活中去搜集資料，了解實際工作情況，以豐富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內容。同時，學者們經常為業務部門幹部作理論或科學方面的報告，輔助他們提高法律科學知識，或者幫助他們寫科學論文以取得學位，還經常幫助業務部門從理論上研究和解決運用法律上的一些疑難問題和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或者擔任業務部門的法律顧問，特別重要的是學者們還經常被邀請參加各種立法工作。在蘇聯，學者和業務部門幹部之間是互相尊重的，業務部門幹部常說：「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上，沒有科學我們就不能前進。」學者們也常說：「科學是從實際中來的，也是為實際工作服務的。」這便充分反映了業務部門和教學研究機關的密切關係。

正由於在法律教育中堅決地正確地貫徹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這就保證培養出來的年輕專家們都是既具有廣泛的法律知識，又能勝任實際工作的法律專門人材。

第三、蘇聯的法律教育是建築在廣泛而深刻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基礎之上的。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統一，是蘇聯一切法律學校的一大特色。

宏偉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的實踐，為蘇聯的科學研究工作開闢了廣闊的前途，推動着科學研究工作不斷地發展和取得新的成就。在蘇聯的法律學

校中，科學研究工作得到了十分的重視和廣泛的開展。每個學校、每個教研室和每個教員都訂有科學研究工作計劃，並規定每個教員一般應以各半的時間從事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他們認為：一個教員只有經常進行科學研究工作，才能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很好地完成教學任務，如果只片面地滿足於當前的教學，而不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就不能成為一個好教員。在學生中也組織有各門課程的科學研究小組及領導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研究協會。

學校的科學研究工作範圍很廣，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實踐中的問題以及法律實際工作和教學實踐中的問題，其基本精神是服從教學、聯繫實際。學校的科學研究工作是以前多種形式來進行的，如編寫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寫科學專著，總結審判工作，檢察工作和國家管理工作的經驗，寫博士和候補博士論文，為報刊寫論文，組織科學討論會，舉辦科學報告會等。

黨和政府對學校的科學研究工作採取了一系列的鼓勵辦法。早在一九三六年，便建立了學位學銜制度，這對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有着巨大的作用，不少學校的科學研究工作是圍繞寫學位論文而開展起來的。此外，如由高教部批准給予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教員以一定的專門休假，或由教研室適當減輕從事科學研究的教員的工作量，甚至免除編寫教科書的教員當前的教學工作任务，以及給予科學著作以充分的發表機會和優厚的稿酬等，這些對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都有很大的鼓勵作用。

科學研究工作廣泛深入地開展，就使學校有了科學水平很高的師資，不僅老的師資能在科學研究工作中不斷獲得提高，新的師資也能在科學研究工作中不斷地培育出來；也為學校提供了質量很好的各種教科書和參考書。這些，都是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和改進教學法的可靠保證。

第四、蘇聯的法律教育有着科學而統一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各種學校和訓練班的教學計劃都有着三個特點：一、它是統一的，在同一類型的學校和訓練班，教學計劃都是一致的，但也照顧到各民族的特點和需要；二、它是學校和訓練班的根本法令和進行教學的根本依據，非經主管機關批准，不得擅自修改；三、它是根據政治經濟和實際工作發展的要求而不斷修訂和改進的。各種不同類型學校和訓練班的教學大綱也是統一的，它不僅確定各門課程的範圍、結構和內容，而且還是指導教學過程的教學法文件。它是根據國家在各個發展階段對法律幹部的要求、科學發展的水平 and 培養對象的特點而製訂的，並且在實踐中加以不斷的充實和改進。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統一，就保證了各類法律學校和訓練班的教學質量以及培養出來的人才合乎國家需要的規格。

第五、蘇聯法律教育中的研究生制度，是培養師資和科學研究人員的最有



效形式，苏联許多教授、教員和科学研究人員都是从研究生制度中培养出來的。現在，苏联对研究生的錄取标准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研究生不僅一定要在高等學校畢業，而且強調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經驗。他們準備一方面將高等法律學校畢業生选拔作研究生的，先送到業務部門去鍛煉一个時期，然後再回來進行學習和研究；一方面注意选拔業務部門幹部有从事科学研究兴趣的來当研究生。这样的研究生，在具有高度科学水平的教授指導下，進行为期三年的（函授研究生）系統的学习和研究，便能够成为合乎嚴格要求的、具有較高科学素养的人才，从而滿足教育和研究机关的需要。

此外，在苏联，對於法律教育的領導和管理也是集中的、統一的。在革命勝利初期，法律教育會由苏共中央直接領導。其後一个相当長的時期內，會基本上由司法人民委員部領導或管理，現在則主要由司法部和高等部分工領導。司法部領導各類法律幹部訓練班和中等法律學校，高教部則領導高等法律院校（包括函授）。兩個部都設有專門司、处的領導機構，它們之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交流經驗，特別是在招收与分配學生問題上更是緊密合作。而且這兩個單位的領導成員，不少是學者或做過教学工作，有的現在仍在任教，这样就能更好地做到領導与教学相結合。他們對於各院校和訓練班的領導，主要是通过制訂（或修訂）教学計劃和教学大綱，以及經常地深入檢查工作來實現的。此外，他們也負責審閱和組織學者編寫教科書和教材，定期舉行教学工作會議，研究教学工作中的專門問題，有計劃地幫助教員提高教学水平等。

學校組織形式的特點是層次少而精幹（訓練班尤其如此），完全服從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法律學院和大學法律系在院長或系主任領導之下，設有若干副院長或副主任分別負責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等（苏联高等院校均不設教務長）。院、系均設有學術委員會，由行政負責

人、教研室主任及著名教授組成，它是學校內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中心，是院長、系主任的諮詢機關，又是集体領導的體現。教研室在學校內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它是在院長、系主任直接領導下進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環節。各類法律幹部訓練班和中等法律學校則在班主任或校長領導下設教學委員會，其組織成員和工作任务大体上与高等院校的學術委員會相同，由於它們專任教員較少，所以也不設教研室，而是依据課程的性質分別設立若干不同的課程委員會，代替教研室發揮其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中心作用。各類學校和訓練班在整个的領導工作中，主要抓緊三个方面，即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又是与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密切結合的。

为了加强學校的領導，學校的領導人員不少都是由富有实际工作經驗和理論修养的負責幹部來充任；同時，學校的行政負責人一般也都担任教学和進行科学研究。这是各類學校領導上的共同特點。

我們在苏联訪問學習了三个月，在苏联同志無私的兄弟般的幫助下，學習了不少的东西，深深地感到苏联的法律科学和法律教育經過革命勝利後三十多年來的不斷發展提高，已經从理論、原則到制度、方法，創立了一套新型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科学和法律教育的体系。遺憾的是：這裏不能詳細地系統地把它完全介紹給讀者，而只能述其概略。我們願和全体法律工作者一道，勤勤懇懇，实事求是地來學習苏联的先進經驗，以期对我國法律教育和法律科学作出一些有益的貢獻。

## 苏联的法律科学研究工作

郭 綸

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苏代表团的同志，怀着对先進苏維埃法律科学的崇高敬意，訪問了苏联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苏联科学院維辛斯基法律研究所和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律科学研究院，还熱誠地訪問了其他一些全苏的和加盟共和國的

法学研究機關。这些單位的負責同志們為我們介紹了他們進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宝贵經驗。我們衷心感激苏联同志的真诚幫助！本文試对苏維埃法学研究工作的某幾方面的情况，作一概略的介紹。



## 一 蘇維埃法律科學對蘇維埃國家的光輝貢獻

蘇維埃法律科學是具有強烈階級性的科學。蘇維埃法律科學自其誕生之日起，即在為反對國內外敵人、加強蘇維埃國家、推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鞏固社會主義法制而進行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蘇維埃法律科學一向在蘇維埃思想戰線上肩負着嚴重的思想鬥爭任務。蘇維埃年代初期，蘇維埃國家的敵人曾力圖瓦解這個年青的國家，圖謀使資本主義勢力復辟。敵人行使的陰謀手段之一就是在这个被列寧稱為「比其他一切問題更加牽連到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國家問題上，散佈暗害性的「理論」。他們當蘇維埃國家正需要極度加強國家政權的時候，却叫嚷着「國家消亡論」，要「取消」它，「炸毀」它；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斯大林一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與法律，是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的槓桿，是實行共產主義改造的槓桿，但，敵人卻硬說蘇維埃的法律是「不公平的法律」，是資產階級的法律，是「垂死的法律」，他們要取消這個法律部門，要消滅那個法律部門，直至要消滅整個的蘇維埃法律。這些論調，實際上就是主張在這個緊要時刻削弱蘇維埃的軍隊、偵查機關、法院、檢察機關等國家槓桿和鬥爭的工具。他們企圖以此種種暗害性的「理論」來毒害蘇維埃理論思想界，毒害司法機關的組織和全部實際工作。事實上，也確有一部分人受了敵人的毒害影響，附和了這種「理論」。但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蘇維埃法學家們，在黨的領導之下，堅決地展開了對於這種謬論的反擊。他們徹底地揭露了敵人的偽造和歪曲。鬥爭的發展，事實最後證明了，原來這些謬論的捏造者就是一個裝扮着面孔的奸細和叛徒集團！蘇維埃法學家為肅清這種毒害影響，在長期不懈的鬥爭中，以唯一正確的國家與法律學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與法律理論武裝了年青的蘇維埃法律科學工作者，蘇維埃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全體勞動人民，從而為鞏固年青的蘇維埃國家，加強蘇維埃國家政權，推進蘇維埃法律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蘇維埃法律科學一向在研究和總結國家建設經驗，在探討國家與法律方面的重要問題上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嚴整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確定了蘇維埃法律科學研究活動的廣闊內容和範圍。因之，蘇維埃法律科學必須對一系列的國家建設問題進行研究和總結，以使這些建設工作在更高的科學認識水平上進行。維辛斯基法律研究所和全蘇法律科學研究院的同志們為說明這種情況，曾為我們介紹了他們一

九五五年的科學研究計劃。這個計劃完備地規定了他們所要探究的對國家建設具有極其迫切意義的法律問題。計劃規定，要探究蘇維埃國家與法律在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創造性作用；要總結國家機關在領導發展國民經濟方面的立法和實際工作；根據蘇共中央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五年歷次全體會議關於進一步發展國內農業的決議，來研究、總結中央和地方蘇維埃國家機關實際工作，以闡明蘇維埃法律制度在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and 社會主義所有制中的作用。在計劃中規定的題目還有：關於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法律形式；國家收購農產品組織的法律形式；進一步加強和改善蘇維埃國家機關的方式和方法；根據審判實踐的總結，來研究與侵害社會主義經濟的犯罪鬥爭的問題和關於保護個人利益的問題等。在司法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院的研究計劃中，更着重指出：在今年對於集體農莊法和土地法的研究應佔重要地位。

在我們訪問烏克蘭科學院所屬的一個法學研究機關——國家與法律部時，我們也看到了他們在這方面所獲得的巨大成就。過去一個時期，他們對於地方蘇維埃，特別是對於村蘇維埃的工作曾作了深入的實際研究，他們圍繞着村蘇維埃的各項工作問題寫作了近十篇的科學論文，這些著作不僅廣泛傳佈於烏克蘭共和國內，而且還流傳於其他各兄弟加盟共和國。廣大的地方蘇維埃工作人員給他們來信說：「需要你們的這些著作，像需要空氣一樣！」可以想像這個工作對於幫助地方蘇維埃工作人員，對於改進農村工作所起的巨大作用。

蘇維埃法律科學為協助解決立法實踐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為協助編纂各項全蘇法典，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法律科學工作者對於改善各項立法有關的理論問題，對於為提請頒佈某些新法律的問題，經常舉行討論並作出一些實際建議。他們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給蘇維埃的立法工作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據和實際根據。

蘇維埃法律科學是發展和提高蘇維埃法律教育工作的基礎。蘇維埃法律科學經常不斷地提供出來許多優秀著作，充作各法律教育、訓練部門的教科書和教材，從而保證了優良的教學質量，對蘇維埃法律教育事業作出光輝的貢獻。自一九四七——四八學年度起，黨還決定在所有研究經濟、歷史、哲學、語言學和各高等學校內，以及在培養中等學校教師的教育學院和師範學院內，在中央和地方的黨校內，都開始講授「蘇維埃國家與法律基礎」（其中包括蘇聯憲法）一項課程，以使這些大學生和學員都能了解最重要的蘇維埃國家建設原則和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最重要部分的基礎。所以蘇維埃法律科學的教育影響是更為



廣泛的。

蘇維埃法學科學的科學成就還直接普及於廣大人民羣衆。蘇維埃法學家們採取了各種方式向人民羣衆傳播法律知識，這對於鞏固社會主義法制起了很大的作用。烏克蘭科學院國家與法律部主任考列茨基院士曾以他們的實際活動作例子說：「我們的科學著作不僅出版成書，並且還常在報紙雜誌上發表，在廣播中發表，在居民中講演。一九五四年我們一共作了一百五十多次的講演。黨的機關對於我們的這種活動，很為重視」。蘇維埃法學科學就是這樣緊密的接近着人民羣衆。

三十多年來，蘇維埃法學科學日益發揚光大，在國家生活中愈益顯示了它的巨大作用。維辛斯基早先曾這樣論斷說：「歷史證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法已發展到很高程度。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法才有發展的牢固基礎。對於法的發展，對於法制的發展，對於法和法制的勝利，最有利的時代不是帝國主義時代，而是社會主義時代。」<sup>①</sup>我們在三個月的訪問中所看到的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現實，更令人信服地證明瞭這個論斷的完全正確。

## 二 法學研究機關和法學研究活動

蘇維埃法學科學在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列寧和斯大林的親切關懷指導之下，在傑出的蘇維埃國家活動家、大法學家維辛斯基的長期主持之下，已發展成為一門興盛的科學。蘇維埃法學科學工作者三十幾年來積累了豐富的組織建設和進行科學活動的經驗。

蘇維埃法學研究組織創立已久，它的名稱和形式也會隨着國家對於法律科學發展的实际需要而有若干次的變動，但在緊張的科學活動中，它一直是在發展着。現在它已組成為一支強大的隊伍。

著名的蘇聯科學院維辛斯基法律研究所和蘇聯司法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院構成了全蘇法律科學活動的中心，共同擔負着蘇維埃法學科學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它們在分工上是，前者更多地擔負着對於國家法、國際法、國家與法律理論和歷史，以及有關刑法、民法等各種法律問題進行研究，此外並對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國家與法律問題進行研究，還擔負着培養高級法律科學研究人才的任务；後者的任務是在研究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法律科學問題，對審判和檢察實踐進行科學總結，為高等、中等法律學校編寫教材和參考資料，同時並培養一部分法律教育師資和教學專門人才。兩個研究機關的活動有着密切的聯繫和配合。推動、指導全蘇法學研究活動的刊物——「蘇維埃國家與法律」雜誌，就

是由這兩個研究機關共同出版的。

黨和政府為發展蘇維埃法學研究工作，還在六個加盟共和國的科學院內設置了法學研究機構——國家與法律部。六個加盟共和國是：居於中亞細亞南部五個共和國的中心的烏茲別克斯坦、波羅的海沿岸的愛沙尼亞和立陶宛、西部最大的共和國別洛露西亞、南部最大的共和國烏克蘭和東南部的哈薩克斯坦。這些機構的地區分佈，是有其實際意義的。這些研究機構的任務，考列茨基院士說：是更多地擔負着研究共和國範圍內的國家建設中的一些問題。但他緊接着又說：當然這絕不意味說這種研究工作是与全蘇的國家活動脫離的；由於階級上政治上的一致，使烏克蘭的科學活動與全蘇的科學活動密切相聯。

國家與法律部是未來的共和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萌芽，是為準備建立法學研究所創設條件的，是一種過渡式的組織。它的組織機構，考列茨基院士謙稱是「簡陋的」，但我們却看到了他們的令人敬佩的工作效能。

蘇聯各大學法律系、法律學院、軍事法學院、法律函授學院的各法律學科教研室，可以視為是法學研究活動的基礎。許多法學家在這裏進行着教學和科學研究活動。

在蘇維埃法學科學的研究工作上還有一些專業性的研究機構，這就是犯罪搜查學科學研究院、司法鑑定研究所，以及屬於蘇聯衛生部領導的司法精神病學研究所等研究機關。這是科學研究活動上的另一重要環節。

這些研究機關組成了強大的科學研究網，廣泛地開展了法學研究活動。蘇維埃法學家適應各方面的要求，他們的研究活動是多樣的。

法學家通常重要的一項研究活動，是就國家所面臨的迫切重要的法律問題作專題研究，寫成專論。由於專論是一種便於比較少的篇幅集中、深入、及時地解答問題的方式，所以許多研究單位對於一些迫切的研究命題都是以寫專論的方式來完成。維辛斯基法律研究所在一九五五年的研究計劃中就曾規定：「對擬定的諸問題將準備出版專論，並就若干具體問題作出實際建議」<sup>②</sup>。

法學家的另一重大研究活動是編寫各法學門類的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

黨和政府對蘇維埃法學科學界所提出的要求是：要在最近三、四年內訂定既穩定而質量又高的基本學科的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要求這些教科書以不太大的篇幅來闡明現代法律科學上的成就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經驗。現在有許多法學家正從事於這項創作勞動。他們給我們介紹了這項工作，他們說：由於要求教科書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必須是確切的，科學水平必須是很高的，所

① 維辛斯基：「國家和法的理論問題」，法律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九一頁。  
② 「蘇維埃國家與法律」雜誌，一九五五年第二期，第一三二頁。



以編寫一本教科書，其本身就是一項艱巨的科學研究活動。

法律科學工作者還對各項紛繁的法規進行整理工作，做好這項工作就便於國家機關幹部掌握法律規範，對鞏固社會主義法制具有重大意義。在進行這項工作上，他們需要去研究對整理各項法規有關的理論問題，並要把一些立法文獻整理出來。與此相近的一項工作，就是他們還須為在職的國家機關幹部編訂各項「必讀」叢書。蘇維埃法學家在這方面已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在這方面已出版的書刊，我們曾得到了他們的熱心的贈與。

蘇維埃法學家為廣泛地大量地培養法律科學的新生力量，還進行着勤懇的輔導工作。他們的輔導對象不僅為在學的研究者，可貴的是他們還對許多有志於科學研究工作的在職幹部進行輔導。他們幫助這些人寫學位論文，提高科學水平。在我們訪問法律研究所時，研究所的負責同志就曾告訴我們：「研究所最近即要幫助一位農業機器站站長候補博士論文的答辯工作」。

蘇維埃法學家還參與其他諸種研究活動。蘇維埃法學家的這種多樣的研究活動，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範例。

### 三 優良的科學研究作風

蘇維埃法律科學研究工作，在實踐中，在不斷改進自己的工作的過程中，創造了一種新型的研​​究作風。這種研究作風更好的保障了蘇維埃法學研究工作的蓬勃發展。

一、蘇維埃法學家非常重視研究工作與實際工作的密切結合，他們經常對離開這一方針的現象進行嚴格的批評；他們在工作中採取了多種的方式來保證這一方針的貫徹執行。

首先，在擬訂研究計劃上，他們的選題是根據國家機關所存在的迫切現實問題而提出的。研究機關經常與國家機關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徵求它們的意見，看它們所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然後給以考慮，定入研究計劃。因此，這種研究計劃，不僅是符合實際需要的，而且，另有其意義的是，他們的這種研究工作就更多的獲得了這些機關的直接協助。

其次，在研究部門的最重要的科學研究組織——學術委員會的成員中，他們很注意吸收實際工作部門的代表參加工作。在維辛斯基法律研究所和全蘇法律科學研究院的學術委員會的成員中，都有蘇聯司法部和蘇聯檢察署的代表參加；在後者還有俄羅斯共和國最高法院的代表參加。很明顯，這種作法的好處是，這將為研究工作聯繫實際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其他各種方式是：

研究人員根據計劃，親身到實際工作部門去研究總結實際工作經驗。去年就有不少研究人員分頭到各司法機關、國營農場、集體農莊、農業機器站和地方蘇維埃機關去做這項研究工作。

研究部門與實際工作部門之間經常互相作報告以交流工作經驗和科學研究成果。研究工作者並經常邀請實際工作者來校訂他們的科學著作。

二、在科學研究工作上所樹立起來的另一優良作風是蘇維埃法學家們對於科學問題所持的開展自由討論和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

從社會主義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偉大建設事業的日新月異的發展，不斷地在蘇維埃法學家面前提出一系列的新的問題，法學家們對於這些新的問題所作的廣泛探討，起初，也常常有一些不一致的看法。蘇維埃學者對於這些認識上的分歧，不是把它擱置起來，任其自以為是，也不是用投票或通過決議的辦法來解決的。蘇維埃科學界堅決地反對不同意見的相安無事的消極現象，並同樣堅決地反對採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來解決爭論問題的現象。

蘇維埃學者對於不同意見的解決是以舉行廣泛的自由討論來解決的。因為蘇維埃學者深信，共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論的立場上所進行的自由討論，經過相互攻錯，最終必能取得認識上的一致。

在三個月的訪問期間，我們曾為蘇維埃學者這種認真對待科學的研究作風所感動。

在若干次座談會上，我們常看到對某些問題具有不同見解的學者，他們週詳地論證了自己的見解，批判對方面的見解。一致的結論雖然暫時還沒得出來，但我們却清楚的看到，一個疑難問題經過這樣認真的爭論，在認識進程上是大大前進了一步了，爭論的核心揭示得更清楚了，這就有助於對這一疑難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蘇維埃學者的這種自由爭論有其鮮明的特色。

首先，這種自由討論是嚴格遵循着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的唯一可靠指針——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論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來進行的。蘇維埃科學家認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所進行的自由討論才會是有效的討論。過去，有若干法學家在研究工作上一度地離開了這一指針，陷入資產階級法學的有害影響之中，進行了一些煩瑣的因而是不可能得到結果的爭論。這種情況及時地受到了嚴格的批判，若干法學家對於自己的這一錯誤亦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從而糾正了這種無謂的爭論而轉到正確的自由討論的軌道上來。

其次，這種討論要求，必須對所要討論的問題進行深刻的研究和考察，使



討論具有建設性，反對那種淺薄的主觀主義的妄發空論和學術上的壟斷作風。在若干次的座談會上和報告會上，我們感受到若干學者在辯白他們的爭論的時候，他們所仗持的都是那種具有力量的論據。我們看到，每一方都是以提出自己的博人信服的理論根據和事實根據來證明自己的論點正確並批駁對方。

再一點是，由於這種討論常常是圍繞着國家建設和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而進行討論的，因而它就極具吸引力，能夠動員最廣大的力量，其中包括實際工作者的力量來參加討論，使討論具有羣眾規模。這就大大地豐富了討論內容。這樣的自由討論，實際上已成為一種科學力量的動員，這是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術界所不能想像的。

三、表現在蘇維埃法學研究工作上的另一優良作風是科學工作者們積極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工作的熱忱，和他們為完成共同的科學命題而表現出來的整體觀念和集體主義作風。

蘇聯法學家認為，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如不善於獨立地進行自己的日常研究工作，不及時地掌握現代科學上的最新成就，以適應現代科學的發展水平，那他的工作就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們非常重視自己的日常研究工作，他們依靠着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修養和豐富的業務知識及對實際事物的深刻理解，對各項科學問題進行着深入的研究，不斷地為科學提出自己的創見。

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創造了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地組織科學工作的可能性。蘇維埃法學家為解決國家當前所急待解決的法律問題所具有的共同責任感，是他們研究工作上的整體觀念和集體主義作風的思想基礎。一定時期內的集體的研究工作是通过擬定的共同研究工作計劃而實現的。

維辛斯基法律研究所和全蘇法律科學研究院在它們的研究計劃裏包括了全蘇各個法學部門的最迫切的命題。其他各個研究單位也都有他們自己的研究計劃。計劃的擬定，首先就表現了他們的集體主義。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主任拉申同志為我們介紹了這種作法。他談到，為了集中科學智慧深入地解決科學中的主要問題，同一研究單位的研究工作者有必要在一定時期內共同圍繞一個問題進行研究。他舉例說，如：國家與法律理論教研室準備在二年之內研究「社會主義民主制」一題，但這個題目是可以從多方面來進行研究的，可以從社會主義的民主性這一方面來研究，也可以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各項組織機構來研究；這樣，對同一問題，分題研究，就可能使大家互相啓發，互相幫助，達到把一個問題從各方面研究得很透徹的目的。他還提到，過去，由於民法教研室沒有注意到組織這樣的研究工作，結果是，在同一單位之內，有的人在研究農業機器站和集體農莊的合同問題，有的人在研究羅馬法，另有些人在研究家庭法，

互不相關，所以他們雖然也會討論彼此的研究成果，但這種討論是形式主義的。拉申同志說，在一門學科之內問題是這樣，全系統是如此。如果在一個時期之內，相近的幾門學科互相配合，圍繞一個更重大的問題分題進行研究，這就會使全體科學研究工作者的步調一致起來，就能對一個重大問題作出更深入的研究。他還補充說：應該注意的是，在確定總的研究題目時，應特別慎重，不要草率肯定。因為作不好，是會浪費力量的。蘇維埃法學家在研究工作上完全有其自由，因此對那些只願研究自己具有興趣的問題的人，也只能採取說服的办法，使他自願地參加到集體性的研究中來，不能勉強。

蘇聯高等教育部高等經濟、法律學校管理總局副局長謝班諾夫同志和拉申同志還給我們談到，在最近幾年來他們更廣泛地採用了集體編寫教材和教科書的方式；在基輔，國家與法律部的同志也給我們談到：為慶祝蘇維埃政權四十年紀念所擬定的論文題是：「烏克蘭人民怎樣在俄羅斯人民的幫助之下建立起自己的蘇維埃國家？」而參與這些研究工作的就不僅是他們國家與法律部的成員，同時還吸收了烏克蘭其他法律院系的一些學者們共同參加工作。他們感到集體編寫的教科書和教材，集體進行的重大科學論題的研究，更能深入地詳盡地敘述某門科學問題。

蘇維埃法學研究工作上的優良作風還有其他諸種表現。這種優良作風，保證着他們嚴肅不苟的克服着工作上的缺點，改進着工作質量，而把工作推向前進。

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是法律和法制昌盛的國家。蘇維埃法律科學在黨和政府的密切關懷指導之下，亦已發展成為一門昌盛的科學。蘇維埃法律科學在鞏固社會主義國家，在建成社會主義和促進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中所起的廣泛的巨大的作用亦已為確切的歷史事實和現實生活所肯定。蘇維埃法律科學在科學研究工作上所積累起來的工作經驗是豐富的。現在正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從事勤懇勞動的我國法律工作者，應當從蘇維埃法律科學方面學習更多的東西。

## 更正

本刊今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頁下欄第十三、四行「具備」二字應刪掉，「客觀要件（行為的社會危險性）和主觀要件（故意或過失）」應改為「四項要件（即主體、主觀要件、客體和客觀要件）」；第三期第二十四頁上欄第十四、十五行「一九五二年」應為「一九五一年」；第十六行「中央人民政府」六字應刪掉，「非法的」應為「非合法的」。



# 从國際法論和平共处的原則

周鯁生

苏联部長會議主席布尔加寧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在日內瓦四國政府首腦會議上的發言中說：「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很明確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始終主張國際和平，主張一切國家和平共處，而不問這些國家的內部制度如何，也不問這些國家是君主制的還是共和制的，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因為任何一個國家中現存的社会和經濟制度問題都是那個國家的人民的內部事情。」八月四日在苏联最高蘇維埃第三次會議上的關於日內瓦四國政府首腦會議的結果的報告中，布尔加寧又說到，蘇維埃國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礎過去是，現在是而且將來會仍然是列寧所指示的關於各种社会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偉大原理。顯然，布尔加寧之說这番話，並不是宣佈一個新的政策，而只是確認一個事實，那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是苏联多年在國際關係上一貫的主張的原則。而這項主張也符合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民主和平团体（如亞洲國家會議、世界和平大會）的共同願望和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中，重申「我國根據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同任何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的政策」，也就是體現和平共處的原則。年來通過一系列的條約、宣言和國際會議的決議，和平共處的原則更進一步在國際文件中被確認而鞏固下來，廣泛的接受為現代國際關係的指導原則。

首先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印兩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裏標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印政府「雙方同意基於（一）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內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處的原則，締結本協定。」接着在同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中印兩國總理聯合聲明中提到上述協定，重申這些原則，並認為「在他們與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中也應該適用這些原則。如果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各國之間，而且適用於一般國際關係之中，它們將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堅固基礎，而現時存在的恐懼和疑慮，則將為信任感所代替」。在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緬兩國總理在仰光發表的聯合聲明，提到中國和印度所協議的五項原則，認為也應該是指導中國和緬甸之間關係的原則，並且斷言如果這些原則能為一切國家所遵

守，則社会制度不同的國家的和平共處就有了保證。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兩國總理聯合聲明的第二項也說：「兩國總理對於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的原則的基礎上作為良好的鄰邦和平相處，表示滿意。兩國總理深信，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將會進一步發展。」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中蘇兩國政府聯合宣言又特別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苏联將繼續把它們同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的各个國家以及其他國家的關係建立在嚴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各項原則的基礎之上，而兩國政府對於對日關係的聯合宣言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苏联政府對日關係的政策，是根據不同社会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的原則。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聯合公報也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願意根據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正常的和友好的關係，特別是同周圍的國家建立親善睦鄰的關係。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苏联和南斯拉夫兩國政府宣言中也鄭重重申了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特別是強調，「兩國在彼此的關係中以及在同其他國家的關係中都應當尊重他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並且互不以任何（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或是思想體系上的）理由干涉內政」。同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部長會議主席布尔加寧和印度總理尼赫魯聯合聲明，也認為，「在（蘇印）兩國關係中必須繼續遵循下列原則：一、互相尊重彼此領土

早在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斯大林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中就說過，兩種對立的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会主义體系的存在並不排除它們之間合作的可能性。（詳見「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〇九頁）又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答覆美國前任副總統華萊士的公開信中斯大林也曾說：「苏联政府認為那怕在苏联和美國之間存在着經濟體系和意識形態的歧異，這兩個體系的並存並和平調處其爭執不僅是可能，而且在普遍的和平利益中是絕對必要的。」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日亞洲國家會議關於政治問題的決議十二：關於五項原則。



的完整和主權；二、互不侵犯；三、互不藉任何經濟、政治或意識形態性質的理由干涉內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處。他們並且認為，「最近得到越來越普遍的承認的這些原則」，可以更廣泛地加以應用。同年七月十八日蘇聯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聯合公報也聲明，「兩國政府在兩國關係上將遵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同時指出，「上述原則作為廣泛和有效的國際合作的基礎，正日益廣泛地為各國所承認和採取」。

特別重要的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採入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舉行的、由二十九個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的決議。二十四日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庚）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和平合作的宣言聲明，各國在共同接受的十項原則的基礎上，作為和睦的鄰邦彼此實行寬容、和平相處，並發展友好合作。如周恩來總理關於亞非會議的報告（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所指出，亞非會議「在宣言中採用了聯合國憲章序言中的『和平相處』字樣。事實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相處就是和平共處」。宣言提出十項原則，作為有關國家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基礎，但如周恩來總理在報告中所說明，「這十項原則中關於『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以侵略行為或侵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五項原則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中關於『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四項原則是完全相同的。」

在上述各項宣言和決議中，關於和平共處的原則，在發表的方式上，在措詞上，儘管多少有些差異，但是接受這些原則作為和平合作的國際關係的基礎，則基本上是一致的。

作為法律問題來研討，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應當被認為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原則的，又是現代國際法的發展。首先就和平共處這個原則本身而言，它應當被看做現代國際關係的維持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也就是現代國際法發展的前提。國際法是規律國家間的關係的規範。而從現代國際法的觀點上說，唯一正常的國際關係是和平關係。早在一九二八年世界各國已經通過普遍參加的巴黎非戰公約，約定不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工具，亦不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的整個精神也在消除國際戰爭。因此，現代國際法所規律的國際關係，一般地是和平關係。在現代國際法中，戰爭法已經失去了它在傳統的國際法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和意義，它的適用範圍將大大地

縮小。在另一方面，隨著國家間的和平關係，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關係的發展，旨在規律或調整這類關係的國際法也將有相應的發展。不待說，和平共處的局勢是最有利於這類國際關係的發展，因而最有利於現代國際法的發展的。

必須指出的是，和平共處這一原則，不當只是在口頭上或文字上被接受，而應當體現於事實。國家相互間、不同制度的國家相互間和平共處，必有所以共處之道。在國際關係上假若造成一種環境或氣氛，使得一些國家經常處於受其他國家威脅或敵視的地位或局勢下，那顯然不是和平共處之道。如美帝國主義者所叫喊或實行的甚麼「先發制人戰」、「冷戰」、「遏制政策」、「原子戰」、「實力地位」政策、「禁運」以及其所進行的建立軍事基地、組織對立性軍事集團和製造國際緊張局勢等等活動，則都是有以造成上述那種環境或氣氛，根本否定或妨礙和平共處之道的。為着實現和平共處，首先要消除或改變那些不利於和平共處的環境或氣氛。以蘇聯為首的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政策就是朝着這一方面努力的，特別是主張以國際會議、和平協商方法解決國際

#### ① 亞非會議通過的十項原則如下：

一、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二、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三、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四、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五、尊重每一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六、（子）不使用集體防禦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丑）任何國家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七、不以侵略行為或侵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八、按照聯合國憲章，通過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決等和平方法以及有關方面自己選擇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來解決一切國際爭端。九、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

最近（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印度總理同老撾太子和首相發表的聯合聲明也表示他們同意：「世界和平和各國之間的友誼的最好保證，是遵循彼此的主權、獨立和完整，互不侵犯，平等和互相尊重，不干預任何國家的內政和促進和平共處的条件等原則」。

#### ②

聯合國憲章首先在序言中標明「和平相處」的原則，而在第一條又標明「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宗旨，並規定：「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

#### ③

至於在民主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則更是如何熱夫尼科夫教授所說，直接屬於所謂「戰爭法」的全部規範都從社會主義國際法關係體系中完全被排除掉。（从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著作的見地來看若干國際法問題，譯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國際公法論文集。）



問題，以集体安全組織代替对立性軍事集团，普遍裁軍和禁止原子武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取消外國軍事基地，訂立大國間和平公約，以及在國內頒佈「保衛和平法」，禁止戰爭宣傳。實際上由於社会主义陣營方面國家的努力，去年的關於遠東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恢復了印度支那的和平，今年的四國政府首腦日內瓦會議，為和平協商解決歐洲問題開闢了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亞非國家萬隆會議，在發揮和平共处的精神和原則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於苏联的主動，多年成為懸案的奧地利國家條約終於最近訂成，苏联和西德之間也成功地通過談判，建立外交關係。而社会主义陣營方面這些主張、措施和活動，是完全符合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的要求，也是其他採取和平政策的國家政府所贊同的。

為着實現和平共處，如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發言中所闡明的求同存異的精神和態度也是必要的。在世界各國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会制度的。但是這一事實的存在並不妨碍國家間和平共處。根本重要的是大家必須本着求同存異的精神，從爭取和平的共同願望上建立共处的基礎。亞非會議的成功証實了在國際關係上求同存異的精神的重要作用。相反地，如美帝國主義者之堅持立異的精神，一味強調不同社会制度的排它性，甚至，如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日內瓦四國政府首腦會議中所表示，還要過問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治地位，那就根本有和平共處之道了。

至於中印兩國總理聯合聲明中規定的其他四項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等互利」，則一向都是國際法的重要原則，是國家在國際社会應承擔的義務，而作為國際關係的指導原則，也是實行和平共處那個基本原則的必要條件。顯然地，如果這些條件不遵守，國家間的真正和平共處將是不可能的。首先就「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一個原則而言吧。這裏所稱「領土主權」實即包括「主權」和「領土完整」之兩個觀念。這兩個觀念也是相關聯的，不過分開來說明，使得意義更明確。「國家主權」不論是作為最高的「權力」或作為獨立的「狀態」來看，自近代國際法誕生以來，向來是國際法上的一個基本觀念。主權原則就是國際法最重要的原則，也就是一切國家的生存、獨立和發達的法律保障。尊重他國主權是一切國家應承擔的義務，也就是和平共處的一個必要條件。有些西方資產階級的法學家，例如美國的耶塞普，企圖從理論上推翻或削弱國家主權而代之以所謂「國際主權」、「世界國家」、「世界政府」的思想，並不是正確地反映現代國際法的發展趨向，而只是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張目罷了。主權觀念並不妨碍國家自願地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對他國承擔某些義務，因而對自己的主權的運用有所

限制。任何一項國際協定都必然意味着對於國家主權多少加以限制；而這些限制，為着各國交往的利益或國際和平和安全是有必要的。聯合國憲章對於會員國所加的許多義務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國家自願地承擔某些義務，也就是行使主權的行為。可是如美帝國主義者強加於他國的所謂馬歇爾計劃、集體防務或共同安全協定、軍事基地辦法，直接間接對他國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乃至行政的、司法的行為加以控制或干涉，則都是對他國主權的侵害，是違反國際法原則，更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特別是第二條）的。領土完整之不可侵犯也就是尊重國家主權的具体的一面，而這一原則更依聯合國憲章的明文規定（第二條，第四款）獲得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確認，不待說這當然也是實現和平共處的必要條件。固然國家間為某種理由，依和平協商方式，作土地的交換、邊界的調整，因而多少發生領土的變動，也是常有的事，這並無傷於領土完整的原则。殖民地或附屬地的獨立或解放更不能以領土完整的藉口而被阻碍或禁止。但凡是國家公然以武力或武力的威脅佔他國的領土或阻撓他國領土的收復或統一，以及用任何其他方法促成他國領土的分裂，或拒不退出原屬他國整個不可分的領土，則就是破壞他國的領土完整，不合於和平共处的原則。現時中國的台灣、印度的果阿、印度尼西亞的西伊里安都由於受到外國的阻撓或霸佔而未獲解放，則正是侵犯領土完整的最顯著的例子。這種局勢的維持下去將是國際局勢繼續緊張的因素，也就是和平共處的障礙。

互不侵略是國家間和平共處絕對必要的條件，也是國際法要求國家遵守的義務。真正尊重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必須互不侵略。侵略本身是國際強盜行為，是根本破壞國際法律的秩序的。一九二八年的巴黎非戰公約莊嚴地摒斥了侵略戰爭，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特別是憲章第三十九條，重在制止侵略。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國際上已有許多的建議和決議，例如一九二八年的泛美會議的決議，宣告侵略戰爭為「國際犯罪」<sup>①</sup>。紐倫堡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原則也是如此。而從事侵略戰爭的國家便將喪失其在國際法上交戰

- ① 本年八月開會的第四十四屆各國議會聯盟大會提出的決議案中，也說認識到，「要維持各國間和平共處和逐漸建立有信心的合作，就需要所有的政府忠誠遵守國際法規則，特別是遵守下列原則：（甲）互相尊重每一個國家的領土完整、主權和平等，（乙）放棄對其他國家內政的一切干涉，（丙）互不侵犯。」
- ② 耶塞普：「現代國際法」（Philip C. Jessup: "A Modern Law of Nations"），第四〇——四一頁。
- ③ 一九二三年的互助條約草案和一九二四年的日內瓦議定書（未批准的）都聲明侵略戰爭為國際犯罪。



國的权利，如所謂「布達佩斯解釋條款」(Budapest Articles of Interpretation)所肯定的<sup>①</sup>。聯合國憲章不只是在原則上肯定侵略的非法性，並且在程序上規定對於侵略的制裁措施(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不過聯合國憲章關於侵略並未下定義，一旦遇着具體的事件，在特殊情況之下，可能發生爭執或引起不公正的決定。其實聯合國憲章在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制定的時候所以未規定侵略的定義，主要由於美國一貫反對作侵略的定義，但是它那反對的理由，連英美資產階級的國際法學家也是不同意<sup>②</sup>。相反地，蘇聯不但是從一九二五年蘇土條約以來曾經同許多外國分別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例如同阿富汗(一九二六)、波斯(一九二七)、芬蘭(一九三二)、波蘭(一九三二)、法國(一九三二)各國，並且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同阿富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斯、波蘭、羅馬尼亞和土耳其訂立關於侵略定義的公約，通稱倫敦公約。同樣侵略定義條約也訂立於蘇聯和捷克、羅馬尼亞、土耳其、南斯拉夫諸國間。

依照一九三三年關於侵略定義的倫敦公約(第二條)，凡在國際衝突中，首先犯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視為侵略者：(一)對他國宣戰，(二)武裝侵入他國領土，(三)以陸、海或空軍力量攻擊他國的領土、軍艦或飛機，(四)海軍封鎖他國的海岸或港口，(五)幫助在一國領土組成而侵入他國的武裝匪徒，或拒絕在本國領土上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取消對上項匪徒的援助或保護。公約並且聲明，不論是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或其他任何考慮都不得作為進行侵略的理由。上述公約所作的侵略定義原是以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國際裁軍會議安全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the Politis Report)為基礎，而那個報告又是根據蘇聯代表的提案而作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又不斷在聯合國大會提議確定侵略定義，指出這一措施在爭取國際和平和安全的鬥爭中的重要性。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蘇聯向第五屆聯合國大會提出關於侵略定義的建議，仍是以一九三三年的公約規定的定義為基礎。到了一九五三年八月蘇聯代表向聯合國侵略定義專門小組委員會(第七屆聯合國大會依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決議組成的)提出侵略定義的建議，除基本上根據倫敦公約的規定外，又採納有些亞洲、阿拉伯國家的主張，補充了關於間接的、經濟上的和思想上的侵略定義，並且聲明各國的其他行動如在具體案件中經安全理事會決定認為構成進攻或經濟、思想或間接侵略行動，得被視為侵略<sup>③</sup>。一九五三年八月蘇聯的建議，全面考慮到侵略的內容，這是侵略定義進一步的發展。由於美國的一貫反對，侵略定義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決定。為着實行互不侵略原則，為着保證聯合國公正而有效地行使維持和平和安全的職權，侵略定義的確定是必須繼續

努力求其實現的。

互不干涉內政是主權原則所要求的。干涉他國的內政就是不尊重他國的主權。國際法一般地禁止干涉他國的事情。非干涉原則是傳統的國際法原則。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也否認對於任何國家的內政事情進行干涉(憲章第二條第七款)。事實上如果各國間進行對內政的干涉，和平共處也會是不可能的。國際關係史上不乏干涉內政之事，也如不乏侵略之事一樣，那都是同和平共處的原則或願望不相容的。以近事而論，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如果外國以任何方式來過問或阻撓，就是干涉中國的內政，就是違反國際法，也違反和平共處的原則。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干涉和「非干涉」是不可以作形式的機械的看法的。帝國主義者有時借用「非干涉」的美名，縱容侵略，實即構成間接干涉。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在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中英法諸國發起的所謂「非干涉協定」和「非干涉委員會」，使得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終於被法西斯勢力推翻。又如斯大林所指出，帝國主義的干涉出以多種的方式，武裝的，財政經濟的，乃至派遣間諜、恐怖分子、破壞分子和利用商業組織的偵探活動<sup>④</sup>。美國年來推行所謂「共同安全法」，撥用大批款項對外國，特別對人民民主國家，進行顛覆活動就是干涉內政之最露骨而惡劣的方式。要實現和平共處原則，必須消除這一切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偽裝的對他國內政的干涉。在另一方面，

① 所謂「布達佩斯解釋條款」是國際法協會(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在一九三四年匈牙利利國都布達佩斯會議中所通過的對於巴黎非戰公約的效力的解釋，共為七條(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ct. 1939, Section Two-Documents, p. 825—826)。美國哈佛法學院國際法研究部(Harvard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Law)所發表的關於侵略事件中國家的權利和義務的公約草案(Draft 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in Case of Aggression)代表資產階級公法家的意見，也基本上同布達佩斯條款一樣，肯定侵略者不能主張國際法上交戰國應有的權利(詳見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ct. 1939, Section Two-Documents)。

② 奧本海國際法「第二卷第一分冊，法律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九八頁。」「(O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 II, 6th ed., p. 156; 7th ed., p. 189—190.) 古特利區和哈姆勃羅：「聯合國憲章解釋」(Goodrich & Hambro: "Charac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英文本第二版，第一〇四頁，二〇七頁，二六三——二六四頁。

③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第四版。  
④ 斯大林論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世界知識社一九五〇年版，第四一——四八頁。



西方帝國主義者又把顯然具有國際重要性的民族自決問題和種族衝突問題（例如法國對於非洲阿爾及利亞問題、南非聯邦對於印度人待遇問題），以屬於內政問題為藉口，反對提出聯合國討論，那就是歪曲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了。

最後，平等互利也是增進和平共處的重要條件。國家平等是傳統的國際法原則，也是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一款）強調的一個基本原則。平等原則同主權原則是不可分的。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一向主張大小國家平權的原則，這是从和平政策的觀點出發，完全符合國際法的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的。互利和平等也是相聯的。在國家交往上，互利才是真正的平等。比方片面的條約，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國家過去強加於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條約、協定，總稱為不平等條約的，就是公然破壞國家平等的原則的。甚至條約在形式上雖然作互利的規定，而由於締約兩方經濟的地位懸殊，實際上偏利於一方而他方

## 朝鮮停戰協定的法律觀

華沙大學法學院教授 穆斯克特博士

編者按：穆斯克特博士是波蘭華沙大學法學院教授、朝鮮停戰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機關刊物「法律為和平服務」的編輯。這是他給本刊寄來的文章，特致謝意。

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第四海牙公約所附陸戰法規及慣例第五章很明顯地規定，停戰就是由交戰雙方根據所締結的協定中止敵對行動。

如果停戰的時期未加確定，交戰雙方隨時可以重新採取軍事行動，只要是依照停戰條款規定在適當的時候通知敵方。停戰可以是全面的或局部的。全面停戰就是在整個戰場上停止敵對行動；而局部停戰只是在某些部隊之間和在一定範圍內停止敵對行動（第三十七條）。訂約的任何一方嚴重違背停戰，則對方就有廢除停戰協定的權利，並在緊急情況下立即重新採取敵對行動（第四十條）。

海牙公約因此指出，停戰協定的條約性質和一切法律上的效果是由於締結國際條約而產生的；但海牙公約同時指出，停戰協定是臨時性的。

只要拿海牙公約的條款同朝鮮停戰協定的條款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朝鮮停戰協定是一個特殊的協定。這個協定具有條約的性質，但是並不像海牙公約中所規定的那樣臨時性質。

受其剝削，如一九四六年美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政府訂立的所謂中美商約就是最顯著的例子；那就是既非互利，也非平等的交易。相反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間以及同其他國家間所訂的條約或協定，例如一九五〇年中蘇條約和其他協定以及一九五四年中印協定，都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訂約的典型。這樣，國家間和平共處的原則才真正可以實現。

國際法應當是為人類和平服務的。闡明有利於和平的民主原則而豐富其內容，應當是現代國際法科學的基本任務。上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屬於這類的民主原則。年來它們已經被各國愛好和平的政府，用外交條約、宣言和決議的方式，作為國際關係的指導原則肯定下來；它們更應當受到國際法學家的注意和研究。不待說，在這個方向，促進現代國際法的發展，就是鞏固國際和平的法律基礎。

朝鮮停戰協定的條款表明，這個停戰協定具有確定的性質，如協定遭到破裂，將不可避免地引起新的侵略行為。這就表明，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協定，同歷史上為人所周知的其他停戰協定是不能比較的。也不應該機械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些停戰協定相比。但是，這個協定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停戰協

① 海牙公約陸戰法規及慣例條約附件並肯定這個論點，即停戰的生效不是根據對停戰的批准。本附件第三十八條僅規定停戰應及時通知有關軍事當局。通知後，如沒有發生任何其他事故，敵對行動應立刻停止。

② 海牙公約第四十一條規定，如違背停戰協定出於個人本意者，則祇有要求處罰該犯，如有損害得要求賠償之權。

③ 在最近一世紀所締結的停戰協定，經常包括處理佔領戰敗國問題的條款。參看西伯爾先生著「國際法上的停戰」，一九四三年巴黎版，第五頁、第二十七頁。參看例如，對意大利、對羅馬尼亞簽訂的停戰文件：「關於對意大利停戰條件的文件」，一九四五年倫敦版，「對羅馬尼亞的停戰條件」，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簽訂於莫斯科，倫敦版，英國政府文書局出版。



定有許多相同之處，因為那些協定曾考慮到蘇聯的主張，或者是有蘇聯參加締結的。

這些停戰協定處理軍事問題，同時也常常處理經濟和政治問題，這就不單是決定停戰問題，而且在敵對雙方之間為建立和平關係開闢道路。由於蘇聯的努力和國際形勢的新的因素，這些文件不再是和以前的一樣，並在原則上構成了準備締結未來和約的條例。這就是朝鮮停戰協定的主要任務。

這個停戰協定的特殊性也可以從簽字雙方的性質上以及依照協定某些未直接參與朝鮮戰爭的國家所負義務的內容上看出來。承擔這種義務的方式是：在某種情況下，通過一些國家的正式宣言；在其他情況下，通過一種可以推定那些國家同意承擔這種義務的行動。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都不可能用片面的行為來履行這些義務。

朝鮮停戰協定的一方是由美國將軍克拉克簽字的，他是所謂「聯合國軍」的總司令，實際上是執行着美國政府的命令。所以，朝鮮停戰就給予美國政府以權利和義務。干涉的策劃者用以掩飾他們的侵略並在簽訂停戰協定時也使用的招牌：「聯合國」——從形式上看——實際上已變成了交戰的一方。這種情況使得聯合國在朝鮮衝突中不能起到公平的作用，雖然聯合國只有十六個會員國參與干涉，而且為了干涉所通過的非法決議並未遵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程序。當然，聯合國機構在其職權範圍內，一直有權過問朝鮮問題。

朝鮮停戰協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元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簽字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金日成元帥代表他的政府。因此，朝鮮停戰就給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權利和義務。作為停戰協定的一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事實上為聯合國同樣也為美國政府所承認。因此，任何有關朝鮮問題的決議，沒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同意都是無效的。

停戰協定簽字人已建議有關的雙方政府進行商談以保證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問題在於，如果不考慮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所採取的立場，這個國家的利益及其意願，這種建議是不會實現的。因此，停戰協定不僅承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北朝鮮的權利，而且還要承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參加解決整個朝鮮問題的权利。這個事實也肯定了对民族解放鬥爭的合法性的承認。這個鬥爭使朝鮮民族的自決權和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权利得以實現。

停戰協定另外還規定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各中立國小組所擔負的主要責任。

這些國家接受執行中立國監察委員會（前四國）的任務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任務。在這個組織中有聯合國的會員國，也有非會員國（瑞士）。因此，很明顯，就是享有為其他強國保證永久中立地位（例如瑞士享有的名義）和因為這個理論而不能參加任何軍事衝突的國家，有權利甚至有義務參加旨在鞏固和平的一切行動。這個事實足以使人了解到，停戰協定的序言——承認這個協定具有純粹軍事性質並且僅僅涉及交戰雙方的規定，構成純粹正式性質的宣言。可是不能這樣狹隘地解釋這個宣言，因為這和本協定的其他條款的精神和文字是違背的。

我們試分析序言中所載的宣言的效果。依照海牙公約，這個宣言認為朝鮮停戰是戰爭法的規定。因此，任何政府違背朝鮮停戰的條款，從國際法的觀點看來就會構成侵權行為，而個人的違背，經常被認為是戰爭罪。

我們已談到，第四海牙公約規定個人違反停戰協定就給予對方要求處罰犯罪人的權利，這種處罰應該根據和處罰戰犯相同的原則。正如停戰協定序言所宣佈，根據戰爭法和戰爭習慣，對於朝鮮停戰的可能破壞應該予以制止，很明顯，進行這種破壞的人應該被認為是戰爭罪犯。這個事實不僅對於破壞停戰的李承晚之流，就是對於他們的主子美國也同樣是一個警告。

在戰爭法的範圍內，資產階級的學說對於停戰的法律效果存在着爭論。然而大多數人同意在停戰期間有關各方可以在分界線以外進行一切活動以準備新的軍事行動，包括準備新的攻勢的活動。因此，根據這個意見，各方可在其轄區內輸入武器和軍火。至於解決在軍事分界線上或在雙方非武裝區域（如果有這種區域的話）是否允許進行軍事活動的問題，意見是不一致的。

① 比較以下停戰協定：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由馬里諾夫斯基元帥簽字的對羅馬尼亞的停戰協定，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由日丹諾夫將軍簽字的對芬蘭的停戰協定，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由屠爾畢爾斯元帥簽字的對保加利亞的停戰協定，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由伏羅希洛夫元帥簽字的對匈牙利利的停戰協定。特別是在這些文件中，我們找不出有關投降的條款。

② 尚未失去現實性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有趣論點，在漢堡英國軍事法庭的判決理由中可以看到。一個納粹中尉哈爾德·格魯姆特由於違背投降條件而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被漢堡英國軍事法庭判處五年徒刑。參閱聯合國戰犯法庭關於戰犯審理的法律報告，一九四七年倫敦版，第一冊，第五十五頁。一九四六年七月該法庭發生過類似的案件，一個納粹海軍上尉愛·斯蒂文由於類似的罪就被判處七年徒刑。

③ 對格魯姆特特審判的審判，表現了資產階級學說所採取的立場。參看聯合國戰犯法庭第五號案件「逃走的德國潛艇案件」第六十八頁，這裏並引用了奧本海——勞特派特關於這個問題的同樣的意見。



把停战协定中關於禁止增加各方軍事潛力規定確實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這種絕對明顯的條款同上述的意見比較一下就够了。——這就是說，企圖把朝鮮停战当作其他一切停战的努力是徒勞的。

朝鮮停战协定並不構成在預定日期內的停止戰鬥或停火，也不是依照戰爭法說來使重新發生敵對行動成為可能的停战，而是同意肯定地中止戰爭行動並和平解決衝突的表示。因此政治因素支配着軍事因素。

朝鮮停战协定在反動侵略的一方和民主和平的另一方的談判過程中雖有爭執，但這是一個合乎現代國際法原則的文件。首先這是通過和平途徑代替暴力手段解決爭端的原則的勝利。

朝鮮停战协定的性質超越了傳統的停战範疇，它使人回想起最初的和平談判，也使人回想到在其他停战中很少得到解決的某些問題，如：移交人員問題，外國軍隊撤出戰場問題，關於在發生戰爭的國家領土上重新建立統一和國家獨立自主的協商問題。戰俘問題的肯定解決而不僅限於傷病人員的安排，這在過去的停战中也是少有的事情。

我們在朝鮮停战中發現為中朝方面所接受的表示某種妥協的因素，——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停止敵對行動和開闢鞏固和平的道路。

關於「不直接」遣返戰俘的條款，就是這種妥協的表示。但是總的說來，朝鮮停战协定的特點不僅是在於它的純粹進步性的決定，而且也是在於上述的政治情況。在這個協定的條款中沒有明確表明朝鮮人民應如何通過民主選舉實現統一和自主權利的方法，這也顯示了停战协定的妥協精神。關於撤退外國軍隊和朝鮮問題的肯定的、和平的解決，也只有舉行政治會議的總的規定。

由於這種同樣的妥協精神，因此停战协定中沒有規定保證朝鮮人民自由地決定其命運和擺脫外國影響的條款，這些國家曾參與武裝干涉朝鮮，因而它們有危害和平和進行戰爭的罪惡的責任。雖然朝鮮停战协定有這一切不完善的地方，侵略者只希望朝鮮停战是不涉及政治情形的、非常特殊的軍事性質的國際協定，並且只能臨時停止軍事行動，但他們的企圖遭到了失敗。應該把這個協定看成是「Pacta de Contrahendo」（承諾訂約的協定），看成是為鞏固朝鮮的和平而締結協定的協定。

朝鮮停战协定是實現和平的預備行為，這樣，就不但堵塞了可能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重新採取敵對行動的道路，而且根據法律的規定使侵略成為非法。

必須指出，所謂「大韓民國」的李承晚政府代表沒有在停战协定上簽字。李承晚的代表沒有在停战协定上簽字，絲毫不能減少他們尊重這個協定的

責任。

這就是中朝方面在談判過程中的態度，美國人作了記錄的。

「我們認為，全世界人民應該知道你方所給予的保證是什麼。」在締結停战協定時，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團首席代表在他的宣言中，就這樣指出。

所以，朝鮮停战协定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不僅是從朝鮮人民利益觀點出發，而且也是從這樣的事業為出發點，即為鞏固亞洲和全世界的國際安全以及為鞏固發展法學為這個目的服務而進行鬥爭。

不僅是停战协定的簽字者，而且是簽字者的政府和其他許多接受停战协定規定的義務的國家政府，對於這個文件的生效都是有責任的。毫無疑問，各國人民將盡他們所能地來抑制朝鮮停战的敵人和防止他們破壞停战。

（鄭聯譯）

## 學術動態

### 印度法律工作者代表團來我國訪問

接受中國政治法律學會邀請來我國訪問的印度法律工作者代表團一行十五人，由團長全印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納·魯·達斯古普塔率領，於九月二十九日到達我國。代表團到達我國後，先後在北京、瀋陽、鞍山、撫順、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參訪，已於十月二十六日歸國。

代表團在中國訪問期間，曾會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宋慶齡、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負責人，並與北京的法律、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舉行了多次座談會。代表團還參觀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和監獄，並在北京市中級市人民法院和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法院旁聽過案件審理情況。

代表團對我國的司法制度、審判工作及對犯人的勞動改造工作很感興趣，作了很細緻的考察和了解。

由於代表團來中國的訪問使中印兩國法律界的人士進行了直接的接觸，這就大大增進了兩國法律工作者之間的了解、友誼和合作，對於中印法學研究方面今後的學術交流、團結互助將產生很有益的影響。



# 人民審判員卡梅柯夫同志的工作經驗

蘇聯白俄羅斯共和國司法部視察室總視察員

耶·伊林娜

卡梅柯夫同志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在薩拉托夫中等法律學校畢業以後，開始擔任了莫洛金諾市第一轄區人民審判員的工作。卡梅柯夫同志富有生活經驗，對於受託工作具有高度政治責任感，又能在審判實踐中竭力保證正確地適用蘇維埃法律，因而他在行使社會主義審判權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績。

這位年輕的審判員在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難，但都被他不屈不撓地、頑強地克服了，因此他不斷地改善了審判工作，充實了自己的學識和提高了人民法院整個機構的工作水平。

卡梅柯夫同志一開始工作起，就十分注意正確地組織人民法院的工作，因為整個審判工作的成就，在很多方面有賴於這一工作的順利實行。

這個法院的工作是嚴格地按照計劃進行的。在工作計劃中規定有：預備庭和審判庭的開庭日期，檢查辦公室工作的日期，向選民做總結報告和工作報告的日期，總結審判經驗的日期，以及指導法院工作人員學習的日期。卡梅柯夫同志在選擇報告題目和將去做報告的企業或機關時，總是考慮到人民法院受理這個企業或機關的案件的特點。

例如，卡梅柯夫同志根據研究違反勞動紀律案件的審判實踐的結果，判明近來鐵路樞紐站內違反勞動紀律的現象越來越多。於是他就這個問題做了幾次報告，並向地方黨組織提出關於鐵路樞紐站羣眾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缺點的意見。此後，違反勞動紀律的現象即顯著地減少了。

卡梅柯夫同志親自指定案件的開庭日期：刑事案件在預備庭上指定，民事案件在周密進行審前準備工作之後指定。在指定案件開庭日期時，他總要考慮到案件是否複雜，是否迫待審理以及審理案件所需的時間。這個人民法院把延期審理案件的數字降到最低限度。

為了改進法院傳票的送達工作，卡梅柯夫同志會同郵電管理局工作人員舉行了數次座談會。遇有未及時送達傳票的情況時，法院即採取適當的方法。人民法院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做出關於莫洛金諾省和明斯克省郵電工作人員對待法院傳票送達工作的粗枝大葉態度的局部裁定。這個裁定送交白俄羅斯共

和國郵電部代表及莫洛金諾省郵電管理局局長。那些以疏忽態度對待自己職務以致造成過錯的郵電工作人員受到了處分。現在，他們都能及時地送達傳票和把傳票回執退還人民法院。

卡梅柯夫同志善於和靄地接待來訪者。他每天上午九點到十一點接待選民，仔細地听取他們的聲請和申訴，並給予正確的答覆和意見。

往往有些選民對人民審判員提出不屬於人民法院職權範圍以內的問題，來向自己的當選人——人民勤務員請教。卡梅柯夫同志總是注意地傾聽並提出意見來幫助他們，必要時還設法恢復被侵犯的權利。

卡梅柯夫同志認為研究和總結人民法院的審判實踐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幾年來，卡梅柯夫同志系統地分析和總結了審判實踐。這位人民審判員研究了關於盜竊國家財產和盜竊公共財產案件、違反勞動紀律案件、職務犯罪案件、偷盜公民個人財產案件等等的審判實踐。在選擇各種類型的案件來進行總結時，卡梅柯夫同志總要考慮到法院轄區內的犯罪狀況和守法程度，並把總結材料報給地方領導機關和省檢察署。必要時，卡梅柯夫同志把從審判實踐中所發現的原則性問題提交黨組織和蘇維埃機關解決。

卡梅柯夫同志在研究盜竊國家財產和盜竊公共財產案件的審判實踐時，發現省手工業聯合社「自由」勞動組合的會計賬目混亂不清，以致屢次造成重大的盜竊公共財產案件。卡梅柯夫同志就這一問題向白俄羅斯共產黨（布）莫洛金諾市委員會提出意見。一個專門委員會前往該勞動組合檢查工作。白俄羅斯共產黨（布）莫洛金諾市委員會執行局討論了檢查結果。該勞動組合主任馬里萬邱克和會計員伏也多娃被撤了職。

這位人民審判員在總結有關違反勞動紀律案件的審判實踐時，查出在省建築托辣斯中所以發生很多曠工和擅離職守的現象，是由於工人居住條件很壞。卡梅柯夫同志就這個問題向白俄羅斯共產黨（布）莫洛金諾市委員會和省工會理事會提出意見。市委會和省工會理事會即組成一個委員會對省建築托辣斯工人的居住條件進行了檢查，白俄羅斯共產黨（布）莫洛金諾市委員會執行局也听取



了黨組織書記和托辣斯主任的報告。隨後就採取了措施改善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條件。

由於分析區財政科申請追索稅款欠額的審判實踐而查出，市財政局送交法院的都是一些款項很小的案件（八盧布到十盧布），而對那些惡意不繳納稅款的人却未交付法庭審判。卡梅柯夫同志根據這些事實向白俄羅斯共產黨（布）省委書記提出意見。在省委員會召集的法院、民警、檢察和財政各機關工作人員的會議上討論了財政機關工作中錯誤的問題。卡梅柯夫同志又把這個問題送交市蘇維埃常會討論。市財政局局長也接到了指示。這樣，財政機關的工作缺點被糾正了。

卡梅柯夫同志根據母親關於追索撫養費的申訴，對機關和企業依照執行票扣款是否正確，進行了檢查。結果他查出很多工作人員利用自己的職位逃避支付撫養費。於是卡梅柯夫同志便向白俄羅斯共產黨（布）莫洛金諾市委員會書記提出意見。後來那些有過錯的人受到了嚴厲的黨紀制裁。

根據許多已審理過的民事案件（主要是私人對機關和企業提起的訴訟），証實有些機關和企業的某些領導人規避法律，藉勞動協議的形式和私人訂立巨額款項的合同。卡梅柯夫同志就此問題向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意見。

在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間，卡梅柯夫同志曾就從審判實踐中所發現的原則性問題，向各地方領導機關提出了十次意見。

卡梅柯夫同志不僅系統地分析審判實踐，同時也為糾正其他機關和企業工作中促成違反法制的缺點而進行堅決的鬥爭。

卡梅柯夫同志十分注意人民陪審員的工作。他每月都以擬定的專題指導人民陪審員的學習。在審理案件前，卡梅柯夫同志一定要和人民陪審員談話，使他們了解將在審判庭上所審理的案件。這就保證了人民陪審員積極地參加審判工作。對於被選拔作臨時代理人、審判員職務的人民陪審員，卡梅柯夫同志進行了許多工作。他同這位人民陪審員一起研究立法原則，吸收他參加審理最複雜和最難以解決的案件，委託他製作刑、民事判決。

卡梅柯夫同志非常珍視選他作人民審判員的羣眾的信任，他通過做法院工作報告和闡明蘇維埃法律的講演同選民保持着密切聯繫。在一九五〇年他共同選民做了十二次工作報告和十五次講演，在一九五一年則做了十八次工作報告和十二次講演。

對每一次工作報告卡梅柯夫同志都經過很好的準備。事前他先同機關和企業的領導人、黨組織書記及工會委員會主席商談對選民作報告的內容。在準備報告時，卡梅柯夫同志還對過去受理該機關或企業的案件加以審查，這樣便能夠

在工作報告內舉出審判實踐中最典型的例子。

每次報告以後，選民向這位人民審判員提出許多關於蘇維埃立法和法院工作方面的問題。卡梅柯夫同志在報告後，通常要用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時間來和選民們座談。

正確地組織人民法院的工作在很多方面保證了審理刑、民事案件的高度質量。

卡梅柯夫同志花去很多精力從事於案件開庭前的準備工作。他仔細地研究即將提交預備庭的刑事案件。在預備庭上，卡梅柯夫同志常根據案情做出關於傳喚補充証人（控訴意見書中所沒有的）或關於調取其他証據的決定。

根據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法令（即「關於盜竊國家財產和盜竊公共財產的刑事責任」法令——譯者註）第二條規定，諸娃什被檢舉負刑事責任。在訊問時，諸娃什把她在犯罪期間弄得的貴重物品，說成是用農業收入、經營土地、養豬、養羊的收益買來的。人民法院審理該案前，從市財政局調閱了有關文件，証實諸娃什並沒有土地，也沒有牲畜。這樣一來，被告人的謊言便被戳穿了。

正確和及時審理民事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審前準備工作做的全面和周密。

卡梅柯夫同志在受理訴狀時要和原告進行詳細的談話，弄清所有不清楚的問題並考慮需要哪些証據。如果原告獲得某項書面証據有困難的話，卡梅柯夫同志便發給他向有關機關領取文件的公函。對許多案件，卡梅柯夫同志依審前準備程序傳喚被告，告訴他已被提起訴訟，並讓他閱看訴訟材料。這時，被告常常會提出由他提供某些証據的請求。為了查清問題，審判員有時候還依審前準備程序同時傳喚原告和被告。

在指定案件開庭日期之前，卡梅柯夫同志查閱必要的立法材料。因此往往有必要調取補充証據。只有在採取這些措施以後，才指定案件的開庭日期。常常在雙方當事人同時在場下指定案件開庭日期，這樣便可把傳票當場交給當事人本人並通過他們轉交給証人。

這樣的案件準備工作保證以更短的期限審理案件和避免審理的拖延。

卡梅柯夫同志所進行的訴訟程序具有高度的政治水平和法律水平。其保證就是：仔細地進行案件開庭前的準備工作，使人民陪審員了解案情和主要的訴訟法規，再加上人民審判員本身有很好的修養。在必要場合下，人民審判員組織就地審判庭審理案件。卡梅柯夫同志在查明鐵路樞紐站違反勞動紀律事件日趨增多後，便在鐵路俱樂部審理了數個案件，並吸收大量職工旁听。



这个人民法院因在審理刑、民事案件時正確地適用了法律，而保證了同特別危害的罪行進行無情的鬥爭。

例如，在一九五一年間，對於那些盜竊國家財產和盜竊公共財產分子、流氓分子、投機分子、殺人犯和偷盜個人財產分子，卡梅柯夫同志沒有不採用各種剝奪自由的懲罰方法的。

在人民法院的實踐中，從來沒有發生過毫無根據地將蘇聯公民定罪或者毫無根據地宣告犯罪人無罪的事實。對於毫無根據地檢舉公民負法律責任的事實，法院採取了原則性的對待方法。

在一九五〇年，人民法院宣告公民謝爾蓋無罪，他是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關於製造和售賣私酒的刑事責任」法令第一條而被控告的。在審判庭上查明，對該案的偵查工作粗暴地違反法律和侵犯被告人的權利，顯然這是別有用心。人民審判員卡梅柯夫同志就這案件做出了局部裁定，並向省檢察長提出意見。後來，民警局負責偵查該案的人被解除了工作。上級審法院往往把有些審判機關已審理過多次的複雜案件的刑事判決撤銷後，發給人民審判員卡梅柯夫同志審理。

省法院撤銷了關於依·克·博格莫洛娃使其丈夫的母親阿·斯·博格莫洛娃重傷致死的刑事判決。莫洛諾市第二轄區人民法院會根據白俄羅斯共和國刑法典第二一九條(乙)的規定判處了博格莫洛娃五年剝奪自由刑。案卷中附有省法醫鑑定人關於受害人身負重傷的鑑定意見書。卡梅柯夫同志研究案卷材料以後，對於鑑定意見書是否正確發生了懷疑。於是他把案件送交白俄羅斯共和國衛生部總法醫鑑定人重新鑑定。後來的鑑定以及在審判庭上判明，受害人只負有輕傷，而在被告人博格莫洛娃的行為和受害人的死亡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因此，法院根據白俄羅斯共和國刑法典第二二三條(甲)的規定將博格莫洛娃改判。

日里克·安東盜竊沃洛加區「五一」農業消費合作社倉庫價值四千五百盧布商品一案，被送交卡梅柯夫同志審理。其他審判機關會不止一次地審理過該案，但在每次審判庭上日里克都頑固地否認自己的罪行。卡梅柯夫同志把在勘驗犯罪現場和勘驗發現商品被竊地點時在場的証人以及被告人為証實自己無罪而舉出的証人，一齊傳喚到庭。經過周密調查和正確判斷証據以後，這位審判員揭穿了日里克的罪行。法院根據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法令第四條判處日里克十年勞動改造營監禁並沒收其全部財產。

人民法院還堅決地、認真地保護蘇聯公民的財產權、居住權、勞動權和其他權利以及國營企業和國家機關的合法利益，以保證法院轄區內嚴格遵守社會

#### 主義法制。

一九五一年九月多爾瑪德到人民法院去詢問她是否能向列金達索取子女撫養費。多爾瑪德和列金達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間曾有过事實上的婚姻關係，但目前她並不知道列金達住在那裏。卡梅柯夫同志告訴多爾瑪德說，她有權向子女的父親索取撫養費。法院受理訴狀後即宣告找尋被告，後者終於被找到了，於是在翌年一月二十九日法院做出多爾瑪德為撫育子女而向列金達追索撫養費的民事判決。

這位人民審判員在案件開庭前周密的準備工作，他的高度熟練的才幹，善於正確地了解案件情況和正確地依據蘇維埃法律來判斷它們，這些都是刑事案件的正確審理的保證。

在一九五一年，所有上訴的該人民法院的刑、民事判決，除了一件改判以外，都維持原判。在一九五〇年，有一件刑事判決和一件民事判決被撤銷。

人民審判員卡梅柯夫同志不僅竭力保證在實質上正確地審理案件，並且還竭力在審判庭上查明促成發生犯罪行為和違反法制的因素。對於這些問題，人民法院不但做出局部裁定，並且還堅決地力求其執行。

加涅茨卡婭原先曾因盜竊行為被判過刑，後被莫洛諾市技術工具管理處錄用為會計員。由於該管理處的領導人對她的工作不進行監督，致使她又有機可乘盜竊國家資金。法院就這一事實做出了局部裁定。以後省技術管理部主任通知法院說，他們已擬定了具體辦法改進會計工作。

這個法院在同犯罪分子作鬥爭所進行的艱巨工作，從審判實踐中提出所發現的問題，以及對蘇維埃法律的宣傳工作，無疑地這是法院轄區內犯罪現象減少的原因之一。

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和被判刑人的數字一年比一年地減少了，特別是因盜竊國家財產和盜竊公共財產、偷盜公民個人財產及因投機行為而被判刑的人的數字更為減少了。

卡梅柯夫同志深信，偵查工作的高度質量乃是幫助人民法院改進工作的原因之一。因此，法院用做出局部裁定或向省檢察長提出專門建議的辦法來嚴肅地對待調查機關和偵查機關工作中的缺點。法院的局部裁定也有助於偵查機關改進工作。莫洛諾市的法院、檢察署和民警機關的工作人員定期舉行機關聯席會議，以幫助消除審判和偵查機關工作中的缺點。

卡梅柯夫同志對於所謂「自訴」的案件，做了很多工作。他在收到受害人的申請書以後，便把申請人和被告人傳來，同他們進行談話，使他們認識到他們的糾紛並不嚴重，被告人的不當行為乃是人們思想意識中舊社會殘餘的



一種表現。被告訴人和受害人往往承認確是一時意氣用事，而沒有什麼重大理由提起刑事案件，於是雙方就在人民審判員的辦公室內和解了。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訴案件已顯著地減少了。

人民法院正確的組織工作、開庭前周密的準備工作、以及給當事人的傳票及時送達，就能保證絕大多數案件在法定期限內審理完畢。

卡梅柯夫同志非常注意法院辦公室的工作以及工作人員思想水平和業務能力的提高。他每週領導法院工作人員進行學習，學習內容是當前政策問題及研究指示和文書工作。

每月底，法院舉行工作會議，討論一個月來法院的工作總結並擬定消除缺點的方法。這樣的會議帶來了良好的效果。法院的文書工作基本上能按照指示的要求進行，開庭的筆錄工作顯著地改進了。刑、民事判決也能及時地執行。

卡梅柯夫同志還親自經常對法院執行員的工作進行監督。未執行的判決降到最低限度，絕大多數都能在十五天的期限內執行完畢。他對於定期執行工作也進行監督。在一九五一年，法院檢查了所有受託根據執行票進行定期執行的機關和企業辦理執行的情況。這種檢查工作大多是由卡梅柯夫同志親自進行的。

卡梅柯夫同志對於用共和國的名義，亦即用人民的名義所宣告的刑、民事判決的政治意義，有着正確的估價，因而他對審判文書的製作特別注意。製作法院的刑、民事判決要通順，還必需完整和有說服力，並指明作為法院判決依據的理由，和援引實體法律。

人民法院的工作所以取得顯著成績，是和卡梅柯夫同志不斷地充實自己的政治和法律知識有關的。現在他在法律函授學院四年級學習，他按時參加考試，成績優良。卡梅柯夫同志很關心審判實踐活動，他訂閱「社會主義法制」、「蘇聯最高法院審判實踐」彙編和全蘇政治與科學普及協會的演說集。他藏有很多法律書籍和文藝書籍。卡梅柯夫同志經常閱讀文藝作品，並注意新著的出版。

卡梅柯夫同志還組織法院的資料編纂工作。他有一個專門卷宗存放重要立法文件、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決議、指示等材料，並按照法的部門和各個制度分了類；關於房屋案件方面的、追索罰款方面的、繼承權方面的等等。在卷宗裏有立法和指示材料的目錄索引。當他收到新的文件時，就把它們放在適當部分並在索引上註明。

此外，卡梅柯夫同志有幾本簿子專門記載民法、刑法、民訴和刑訴方面的資料。在簿子裏他按民、刑法和民、刑訴的各個問題分成專門章節。在每一章

節內簡明地記載着重要的指示材料，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決議、蘇聯最高法院審判庭就典型案件所做的裁定和蘇聯著名法學家著作的摘要。每一個新的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決議、審判庭裁定和指示材料來後，他就把它們列入適當的章節內。這些資料簿使卡梅柯夫同志便於掌握重要立法材料和迅速查到必要的文件。

人民審判員卡梅柯夫同志以布爾什維克原則忘我地執行着國家和黨託付給他的職務，因此他受到居民的尊重。他被選為莫洛金諾市蘇維埃的代表和白俄羅斯共產黨（布）莫洛金諾市委員會的候補委員。市蘇維埃代表卡梅柯夫同志還是市蘇維埃法律講座的主持人。根據市委會和市蘇維埃的指示，卡梅柯夫同志有系統地在本市各機關和企業內做演講和報告。卡梅柯夫同志以市蘇維埃代表的資格把從審判實踐中所發現的若干問題，如關於改進學校工作、改進建築工人俱樂部工作等等問題，提交市蘇維埃常會討論。卡梅柯夫同志待人謙恭，富有同情心。選民們經常向他請教和要求幫助。工作中的同志也時常就法律問題和他商量。卡梅柯夫同志對於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年輕的人民審判員古波列也夫同志幫助很多。

在人民法院籌備改選時期的總結會上，選民們對於人民法院的工作評價極高。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卡梅柯夫同志再次被選為莫洛金諾市第一轄區的人民審判員。

卡梅柯夫同志並不滿足於現有的成就。他認為，法院在進一步消滅犯罪現象和加強法制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法院還必須改進民事判決的執行工作。卡梅柯夫同志打算在函授學院畢業後進刑法教研室的研究班學習。

卡梅柯夫同志因他的審判工作做得好而受到蘇聯司法部兩次獎勵。莫洛金諾市第一轄區人民法院以其對刑、民事案件的審理工作、對審判實踐的研究工作、對蘇維埃法律的宣傳工作以及其全部活動，時時刻刻地在教育勞動人民遵守蘇維埃法律和忠於共產主義事業方面，起着偉大的作用。人民審判員卡梅柯夫同志的巨大功績就在於此。

不久以前，這位共和國優秀的人民審判員卡梅柯夫同志已被選為白俄羅斯共和國最高法院的審判員。

（大誠譯自蘇聯「社會主義法制」雜誌一九五二年第九期）



# 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並報告工作

建 國

——北京市司法工作实践中的經驗——

一。  
我國的人民法院是人民革命勝利的產物，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武器之

根據我國憲法第八十條的規定，作為國家最高審判機關的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包括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則分別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這一規定表明，人民法院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是我們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的國家是人民民主國家，劉少奇同志說，「工人階級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標誌着我們國家的根本性質。」同我們國家的根本性質相聯系的，是我們所採用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人民就是要以這樣的政治制度為重要工具，來保證國家邁步走向社會主義社會。

由於中國人民真正掌握了國家的一切權力，他們便可以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充分發揮管理國家的能力，粉碎人民敵人企圖破壞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切陰謀，來保護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利益。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它們都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我國的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都是分別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或者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產生的，受其所由產生的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對它們負責並報告工作。這充分說明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國家權力機關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全權機關，是掌握國家一切權力的人民真正行使權力的機關；它們不只是議事機關，而且又是工作機關。

在以「三權分立」為標榜的資產階級國家裏，號稱代表機關的議會只是「民主」的幌子，是用來裝飾門面的，只具有列寧所謂「清談館」的意義。國家大權實際上掌握在直接執行壟斷資本集團意志的總統或者內閣手中，法院只不過是在「司法獨立」的掩飾下盡力維護資產者利益的工具。在它們那裏，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高於一切，一切國家機關都按照壟斷資本集團的意旨辦事，高高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仇視人民，鎮壓人民，用暴力強制執行違反人民意志

和利益的行为；廣大勞動人民的權利處於毫無保障的地位，他們對於掌握在剝削階級統治者手中的政權只有憎恨、厭惡和反抗，因而不會也不可能去過問或者監督國家機關的工作。

在我們人民民主國家裏，一切國家機關的活動都是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人民法院如同其他國家機關，是來自人民和屬於人民的。人民法院是人民手中鎮壓敵人、保護人民的强有力的武器，它們都要在本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下，運用自己特有的審判職能，實現國家交給它們的任務。因此，人民法院必然會廣泛地受到人民的愛護和支持，它們也必能經常保持同羣眾的密切聯系，傾聽羣眾的意見、接受羣眾的監督。

上面已經說過，人民法院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是我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个組成部分。北京市的經驗證明，認真貫徹人民法院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這一制度，可以產生顯著的良好效果。

首先，通過向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可以全面地聽到人民代表所反映的羣眾意見，加強人民羣眾對法院工作的監督，密切法院與人民羣眾的聯系，從而推動和改進法院的工作。今年三、四月間，北京市十個區人民代表分別向各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報告了一九五四年的工作。從這次人民法院的報告工作中可以看出，人民代表們不僅能以主人翁的態度對人民法院的工作進行了認真的審查和討論，並且也把人民羣眾對法院工作的意見帶到人民代表大會上去，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提出了五百四十多條意見；這些意見經歸納為三百八十五條，其中屬於表揚的有六十四條，屬於批評的有二百一十一條，屬於建議的有一百一十九條。這些批評和建議都是很寶貴的，而且是十分公正和嚴肅的。各區人民代表在意見中提到：各區人民法院處理了很多案子，特別是認真審理了有關保障國家經濟建設的案件，懲辦了危害社會秩序的流氓分子，解決了許多民事糾紛，對保障國家經濟建設、維護公共秩序和保護人民權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各區人民代表對法院在審判案件時實行了陪審、迴避、公開審理、辯護等審判制度，也深表讚揚。各區人民代表在意見中對有的法院工作人員存在有特權思想、部分審判人員办案拖拉、不負



責任、主觀臆斷、不深入調查研究、偏听偏信、草率辦案以及個別區法院不努力執行各項審判制度，法紀宣傳做得不够好等也提出嚴肅的批評，希望法院切實予以改正。許多區人民代表大會並且根據人民代表的意見對法院工作作出決議，責成法院鞏固成績，糾正錯誤與缺點，認真貫徹人民代表大會決議，保障法院的審判工作做到更有效地鎮壓反動，保護人民，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障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進行。

為了推動和協助各區人民代表大會的批評和建議，並認真地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北京市司法局召集了各區人民代表大會和中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以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見作為全市司法工作人員檢查工作的一面鏡子，研究和討論了改進法院工作的問題。在各區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後，各區人民代表大會先後將人民代表大會的意見，向全體幹部傳達並組織討論，並根據人民代表的意見檢查和改進工作。海澱區法院接受人民代表的意見，把巡迴法庭幹部固定下來，常駐法庭，以便及時解決人民羣眾的糾紛，更好地為農村生產服務。東單區人民代表建議法院審理案件要多吸收人民羣眾旁听，進行法紀宣傳。該區法院從四月份起開始就在法院門前公佈審理案件的時間、地點、案由等，歡迎羣眾旁听；同時又利用區裏派出所的黑板報和街道居民讀報組向廣大居民進行法紀宣傳教育。許多區人民代表在討論人民代表意見、研究改進工作時，也先後訂出加強政治理論和業務學習的計劃，努力注意克服審判工作中主觀臆斷等唯心主義思想和作風，積極貫徹人民代表大會決議的要求，加強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指導等，使人民代表大會對法院工作進一步符合人民代表大會的要求。

第二，人民代表大會對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可以教育幹部，使他們進一步認識到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依照憲法第十八條的規定，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從憲法和法律，努力為人民服務。在人民代表大會決議以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和各區人民代表大會分別選舉出了高、中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市十三個區人民代表大會的院長，這就使法院幹部通過具體实例從思想上根本地認識到我們國家的一切權力是屬於人民的。在北京市各區人民代表大會的幹部研究和討論人民代表的意見時，大家着重批評了個別幹部過去只重視領導意見而對人民羣眾意見不够重視的錯誤思想，指出服從領導和傾听羣眾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領導的意見是從人民羣眾中來的，真正尊重領導的幹部，必然會傾听人民羣眾的意見，反之，不傾听人民羣眾意見的幹部，是不會很好地領會和實現領導的意圖的。事實證明，結合思想批判，會使法院幹部在改進法院工作中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提出合理化建議，不斷提高與改善法院的工作。東單區法院在根據人民代表意見檢查工作時，全體幹部提出了二十多條切

實可行的建議，這些建議付諸實施後，對改善審判作風和加強審判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人民代表大會對人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又是向廣大人民羣眾進行法紀宣傳的一個重要方法。人民代表是來自各個階層和各個不同工作崗位的社會活動人士，他們同羣眾有一定的聯繫，通過代表們的活動，就能夠影響和教育廣大羣眾。這次北京市各區的人民代表有的在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後，向選民作了傳達報告，介紹了法院的工作，這樣，既充實了法紀宣傳的生動內容，同時也教育了廣大羣眾，提高他們的政治積極性，更好地以主人翁的態度去監督法院的工作。

由此可見，人民代表大會如果不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對待自己同人民代表大會的關係，或者在對人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時一味虛誇自己的成績，而不老實誠懇懇懇地對自己的工作加以全面的探討，並提出今後改進工作的具體辦法，那末，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便會成為一句空話，人民代表也就沒有受到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同時，還必須指出，把人民代表的正確意見變成法院幹部自己的行動，從而有效地改進工作，是做到人民代表真正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的重要一環。為此，我們司法工作同志們必須切實樹立起羣眾服務的觀點，並深刻地認識到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這一制度的政治意義，以便隨時傾听羣眾的意見，接受羣眾的監督，不斷地改進人民代表的工作。北京市個別區法院的有些幹部還存在着錯誤的認識。有的認為人民代表大會對人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是「走形式」，因而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有的存在着驕傲自滿情緒，認為「法院工作做得不壞了」，對人民代表提出這些意見「感到驚奇」，有的甚至認為人民代表提意見是「挑毛病」，因而在檢查自己的工作時採取消極抵制的態度，拒絕檢查。所有這些錯誤的想法和態度，都是因為對於我們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性質沒有正確的認識，對於加強人民民主法制以保障國家經濟建設事業的意義沒有深刻的體會。因此，必須本着實事求是、忠誠熱情的態度，努力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和人民代表的意見。人民代表大會對法院工作的決議，應分出一時做到尚有困難的，也應該積極創造條件。人民代表提出個別案件處理不當的問題，應該立即調閱卷宗，調查研究，迅速而又慎重地進行處理。關於我們司法工作同志們的一般思想作風問題，則必須通過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找出思想根源，來進行改造。至於人民代表提出的具體問題與真實情況有出入的，也要經過研究分析後，誠懇地向人民代表進行解釋。總之，一切應本着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保證使人民代表的意



見件件有交代，事事有結果。北京市許多區人民法院對人民代表的提案，意見在檢查、處理後，均分別向原提案和原提意見的代表本人作過了答覆或解釋，普遍受到了人民代表的讚揚。

人民法院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人民代表的監督，與「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的精神實質是完全一致的。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是指人民法院處理具體案件時，不受他人或其他機關的干涉；任何個人、機關、團體或上級法院都不能對法院某一案件作出如何判決的指示，以保證人民法院能夠根據客觀真實情況，正確地適用法律，公平合理地作出判決。但是這並不是說人民法院是一個對人民獨立、對黨獨立的機關。相反的，它必須接受黨的領導，依法受上級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監督，受人民羣眾

的監督，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人民代表大會檢查、監督法院的工作，可以促使人民法院更好地依靠人民羣眾，密切聯繫羣眾，更好地按照國家的政策、法律和法令辦事，在審判工作中嚴格執行法律，更好地行使國家的審判權。所以，我們國家的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的原則，與資本主義國家欺騙人民的所謂「司法獨立」是根本不同的。

人民法院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是我國憲法所規定的一項重要制度，它體現了我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和人民法院必須接受人民羣眾監督的實質。我們應當充分認識這項制度的重要意義，認真地予以執行和貫徹，使人民法院能夠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 關於檢察機關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 幾點初步體會

金 珂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頒佈已經一年多了一年多以來，我國人民檢察機關積極地貫徹執行了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了檢察工作的組織與業務，進一步發揮了檢察機關維護法律統一和正確地實施，保障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順利進行，保護人民民主權利的作用。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於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決議、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實行監督；對刑事案件進行偵查，提起公訴，監督偵查活動和審判活動以及判決的執行是否合法，並提起或參加有關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的訴訟。這些規定包括着社會主義類型檢察工作的全部職能，即：一般監督職能和在國家訴訟活動中的職能。現僅就作者一年來在檢察工作崗位上，執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關於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能的規定，所感到的幾點初步體會寫在下面。由於體驗不深，很不成熟，缺點和錯誤在所難免，希予指正。

第一，人民民主法制是我們國家活動的最重要的指導原則之一。它要求一切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及全體公民必須嚴格地、確切地遵行國家的

法律。作為為鞏固國家法制而鬥爭的人民檢察院，更必須使自己的活動完全符合法律上的一切要求。

經驗證明：人民檢察院在參與刑事訴訟活動中，只有堅定不移地、絲毫不苟地貫徹法制原則，才能正確地發揮它在刑事訴訟中職能的作用。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規定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應保障偵查工作和審判工作嚴格地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保證準確地、有效地打擊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並切實地保護人民的民主權利。因此要求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一定要具有高度的原則性和堅決性。對一切犯罪行為必須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檢察工作人員應時刻記住列寧的訓示：「稍微違反法律，稍微破壞蘇維埃秩序，便已經是可以立刻被勞動者底敵人利用的缺陷」<sup>①</sup>。對於違反法律的人採取任何寬容姑息的态度，都是與人民檢察院所負的莊嚴任務不相容的。人民檢察院在發現並確認有犯罪事實的時候，必須認真的追究；

① 列寧：「關於戰勝高爾察克事致工人農民的信」，「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二七頁。



对公安机关要求逮捕而且应该是逮捕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应坚决地、及时地批准公安机关把他们逮捕起来；对侦查终结后应该起诉的案件，必须迅速地提起公诉。另一方面，应保证只有在发现并确认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才进行侦查工作，如果发现追究犯罪的根据不足，应当立即终止侦查；对不应逮捕和不该起诉的案件，一定要坚持不批准逮捕和决定不起诉或撤回自己的起诉；而且应监督法院惩治犯罪的工作绝对符合法制的要求。这样，坚持法制，实事求是，才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应起的保证不使有罪的人逃脱法網、不使无辜的人遭受冤獄的作用，才能使检察机关在事实上成为維護國家法制、維護人民利益的工具。

在這裏需要談一下關於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必須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程序問題。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逮捕拘留條例規定了人民檢察院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程序，人民檢察院必須切實遵守這些規定。但是，在檢察實踐中，有人把這些程序只簡單的理解為「製做訴訟文書」，因而感到「程序」是「形式」，甚至「嫌麻煩」。有的不認真履行法定的程序，沒有發揮每個程序應起的作用，甚至不履行。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有的檢察幹部不了解訴訟程序的實質和意義，不了解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所規定的行使職權的程序，保障着人民檢察院能夠正確地實現它的任務，並表現着人民檢察制度的特點和优越性。事實證明，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處理案件，不僅不是「節外生枝、自找麻煩」也不是「形式主義」，而是能够保證有效追犯罪，並保護人民的民主權利與合法利益。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接受的告發案件中有百分之二十未提起刑事案件一事證明，「提起刑事案件」的程序，保證着對偵查刑事案件必須採取非常嚴肅慎重的態度，防止無根據地追究犯罪。再如，檢察機關如果不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審查批准公安機關逮捕人犯和審查起訴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顯然會大大的削減了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職能的作用。所以，絕不應將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程序視為「負擔」或置之於「可有可無」，而應該做為人民檢察院貫徹法制原則的一個重要方面。

當然，所謂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絕不是脫離實際鬥爭，忽視羣眾切身利益，死搬硬套法律條文。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對受理的安秀英虐待養女案，經初步調查已完全証實，本可立即起訴，但為了「履行法定程序」，竟又用將近五十天進行偵查然後才起訴。顯然這種做法是錯誤的，首先是影響了及時地打擊犯罪分子。可見，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不僅要坚持法制原則，而且也必須經常地向教條主義者進行鬥爭。

第二，我國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和逮捕拘留條例規定了公安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之間的關係，規定了刑事訴訟的各項基本原則和各項具體制度。一切反革命案件和各種刑事案件，必須經過偵查機關的偵查、人民檢察院的起訴、人民法院的判決三個階段，才能完成刑事訴訟程序。這些規定，表現着我國上述三個機關在惩治犯罪、保護人民的共同任務中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作用，也表明了我國刑事訴訟是追求客觀真實，保護人民民主權利的。根據這些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活動中，與公安機關、審判機關之間的關係最為密切。所以，正確地發揮檢察、公安、審判等機關之間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作用，就成了檢察機關正確地發揮其在刑事訴訟中職能作用的重要環節之一。

我國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和審判機關之間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制度，是在憲法頒佈後，人民民主法制已走上更正規的階段的時候，開始逐步健全的。一年多以來，已有很大進展，對於保障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民主權利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於為時尚短，經驗不多，尚存問題，集中表現在一部分公安、檢察和審判工作人員思想上認識還不够清楚。譬如曾經有人談論：「誰大誰小」「誰管誰」的問題，有人認為公安機關逮捕人經人民檢察院批准、起訴案件由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太麻煩」；有的檢察幹部只強調說「監督」，也有的不敢談「監督」；有的認為「檢察院是專門找岔子的機關」；也曾有人說「打擊犯罪的」，還有人會認為「公安、法院等機關偏重於揭露犯罪和懲罰犯罪的工作，檢察院主要是監督公安和法院機關，保護人民民主權利」。顯然，所有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正由於這些不正確的思想認識沒有徹底根除，在實際工作中，有時會偏重於「制約」而忽略了「配合」，也有時強調了「配合」而放鬆了「制約」。因此，端正有關幹部思想認識，是正確發揮互相制約、互相配合作用的一個帶有關鍵性的問題。

一年來的實際經驗證明，必須使有關幹部明確認識公安、法院、檢察等部門具有共同的對敵鬥爭及與犯罪行為作鬥爭、保護人民民主制度、保護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利益的任務，而且三者都是站在與犯罪作鬥爭的最前綫的為法制而戰鬥的機關。它們應該運用不同的職權，通過不同的活動，來共同實現上述任務。因此，必須在各自積極負責的基礎上，與有關部門密切合作，才能够更有效地打擊敵人，打擊犯罪，保護人民，保護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具體到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正確的偵查和逮捕活動，對法院正確的審判活動，必須予以支持；發現公安、法院等部門有錯誤，就應該



实事求是，調查清楚，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提出要求糾正；也應該虛心的接受公安、法院等機關的監督。在彼此監督之間，尤其重要的是絕不能滲雜任何個人成份。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的發揮法制的威力。

第三，憲法第十七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羣衆，經常保持同羣衆的密切聯繫，傾聽羣衆的意見，接受羣衆的監督。」這個規定總結出我國人民幾十年來革命的一條重要經驗。同樣，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活動也必須時刻地與廣大人民羣衆取得密切聯繫，取得廣大羣衆的擁護和支持，才能完成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任務。

許許多多的事例說明，人民檢察院在處理一切案件的時候，都必須深入羣衆去了解案情和搜集證據。也有舉不盡的事實說明，人民羣衆的檢舉和控告，是人民檢察院發現犯罪的基本來源之一。

因此，檢察機關應該防止使自己在刑事訴訟中的活動神秘化，相反的應該使每個公民都了解它、支持它。檢察機關應該使自己的刑事訴訟活動成為向人民羣衆進行守法教育，動員羣衆向犯罪行為進行鬥爭的主要方式之一。譬如証人的証言在刑事訴訟中是一種最普遍的證據來源，絕大部分案件，都需要有証人參加幫助檢察機關弄明案情，正確地解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但是在工作常常遇到証人顧慮很多，不願直言不諱。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就應該向証人說明訊問証人的意義，並向其進行教育，使他理解到真實的作証是每個公民對國家應盡的光榮任務。否則，很難設想証人會毫無諱忌，據實陳述。再如，對比較重大的、有教育意義的案件，人民檢察院必須出席法庭支持公訴。這樣做的好處很多，既可以通过這種形式接受羣衆對檢察機關的偵查起訴工作的監督，又可以向羣衆不斷的進行守法教育，使羣衆了解檢察工作的職能，更積極地支持檢察工作。

認真負責地接受並處理人民控訴的案件，是加強檢察機關與人民羣衆的聯繫的一個重要方面。自憲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頒佈後，人民羣衆向檢察機關提出控告申訴的案件有顯著增加，如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一九五五年一至九月由人民羣衆的檢舉控告中，發現的犯罪線索比一九五四年全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七。檢察機關必須以關心的態度，迅速而正確地處理人民羣衆的控訴，應該使每一個公民都相信他的合法權益是受到國家特別設置的檢察機關的保護的。唯有如此，才能日益擴大檢察機關與人民羣衆的聯繫。但是，在目前實際工作中，還會發現有人對人民的控訴缺乏應有的責任感，特別是有人強調所謂「不屬檢察機關管轄範圍」，而以粗暴的態度推出去，或者受理後「一轉了之」，這是絕不能容忍的。檢察機關應對這種以官僚主義態度對待人民控訴的檢察工作

人員進行無情的鬥爭。對真的「不屬檢察機關管轄範圍」的事件也必須耐心的負責的告訴他到何處解決。對一經受理的案件，檢察機關必須負責到底，即或轉交其他機關查處，也應該負責到處理這一控訴的機關作出正確的決定並已全部施行的時候，才算處理終結。

第四，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所具有的職能是非常重要的、莊嚴的。因此，要求檢察工作人員在維護法制上應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原則性，堅定地站在法制鬥爭的最前哨，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憲法和法律這一銳利的武器，向反革命分子和各種違法犯罪分子進行堅持不懈地、勇敢地鬥爭。應該有「不畏強禦」的精神，「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同時，要求檢察工作人員必須實事求是，全面地、客觀地，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研究案件，具有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應該認識到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活動，關係到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任何粗枝大葉，先入為主，偏聽偏信，主觀臆斷，任何少許錯誤也是不能允許的。檢察工作人員應該以蘇聯前總檢察長維辛斯基曾說過的一句話經常的警惕着自己：「再也沒有比毫無根據地把一個人當做被告而交付審判這樣的事，對於國家利益，對於國家威信更有害更使人痛心的了……這是在人民面前敗壞法院威信，同時也是敗壞整個國家政權機關的威信」。

檢察機關是國家重要統治工具之一，在檢察機關工作的人們負有光榮而重大的任務，必須像生產戰綫上的工人，像保衛祖國的戰士們一樣，忘我地、兢兢業業地、全心全意地努力工作，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同時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檢察工作人員必須精通國家的法律法令，正確的掌握國家的方針政策。因此要求檢察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地、堅持不懈地學習、學習、再學習，學習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法令，學習檢察業務。必須如此，才能夠把工作做好。

關於檢察工作人員應精通國家法律而且必須堅持正確的立場，具有正確的思想作風，雖然有些同志了解這些道理，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仍有人常常做出與檢察工作人員的身份不能相容的事情。而且不正確的立場和思想作風，又常常是產生各種錯誤和缺點的源泉。「人民日報」揭發的「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為什麼不受理劉志英反革命案」①就是一個具體的事例。所以檢察機關必須充分發揚民主，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應該向一切不正確的立場和思想作風進行經常地、堅決地鬥爭，忽略了這點，必然會使檢察機關的威信受到非常



嚴重的損害。

第五，更重要的是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活動必須緊緊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圍繞着國家在過渡時期總任務，圍繞着國家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進行。

我們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毛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曾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國家機關只有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才能完成它的任務。所以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同樣應該而且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才能夠更大的發揮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職能作用。

多年來的檢察工作實踐證明，為有效地更大地發揮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能保障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的作用，檢察機關必須堅定不移的貫徹檢察工

## 編後記

中國司法工作者訪蘇代表團已於本年七月十日歸國，在本刊上期的「學術動態」中，已有所報道。本期共發表了史良部長等七篇論文，都是該團訪蘇歸來的收穫。這些豐富的先進的經驗，都是我們珍貴的學習的材料。我們應該特別向讀者推薦，同時也應該對作者表示謝意！

和平共處的原則，已成為現實國際活動中的指針。周鯁生先生從國際法的角度詳細論證了這個原則，使我們更可以看出這個原則的正確性和重要性。

朝鮮停戰協定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波蘭穆斯喀特博士特別為我們寄來了這一篇文章，專從法律觀點，指出了對朝鮮停戰協定的正確看法。

「人民法院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關於檢察機關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幾點初步體會」這兩篇文章，是一年來從貫徹執行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所取得的一些經驗。本刊以後將陸續刊登這一類的文章。

毛主席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是一篇偉大的富有歷史意義的文件。我們應該如何根據這些指示，以迎接和配合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新高潮，是我們政法工作者、政法科學研究工作者的主要任務。本刊在篇首登載了毛主席的報告並且還發表了一篇短論，提出了我們的看法和請求。希望同志們對此多提意見並多供給我們關於這一類的研究論文。

早在年初，有的讀者向我們提意見，要印出去年各期的總目錄。這個工

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服務，為中心工作服務的思想。北京市丰台區人民檢察院，配合當地糧食統購統銷的中心工作，及時偵查起訴了破壞糧食統購統銷的犯罪分子樊配軍等，嚴重地打擊了違反糧食政策的犯罪分子並教育了農民，有效地保障了這一中心工作的順利進行。由此可見，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為中心工作服務的實現，主要是運用人民民主的法制，通過具體的訴訟活動，從檢察工作方面和各種危害當前中心工作的各種違法犯罪分子進行鬥爭，保障中心任務的順利完成。那種脫離中心工作孤立辦案的思想 and 作法，必然會大大削弱了檢察工作在國家建設中應起的作用。

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任務是非常繁重的，而且這項任務本身也是非常複雜的。以作者所在的工作崗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來講，還沒有取得系統的、全面的經驗，仍有待於繼續摸索，不斷提高，以更好地為完成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所賦予的莊嚴任務而努力。

作，我們一直沒有忘記。現在又是一年的結束，我們特一併把創刊號以來的各期，印成總目錄附上，供讀者裝訂之用。

關於本刊本年第五期悠生同志所寫的「民法繼承法在我國過渡時期的意義」一文，本刊讀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石子淵同志來函指出兩點：一為對中國將來民法典也應包括繼承法在內的問題，說原文容易使人誤解為我國的繼承法，是因為外國有、國民黨有，所以我們也有。應提為：我國「將來研究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應包括繼承法在內」是由於繼承法所調整的對象是民法所調整的對象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的原因。二為關於蘇聯繼承法中對於「個人私有財產」的問題，應為「個人財產」。我們已將這兩點，函送原作者徵求意見，他答覆是說：「批評意見很好，我很感謝石子淵同志的這種批評精神」。

關於刑事證據分類的問題，本刊本年第二期和第四期先後刊載了郝双祿、胡復申、戈風三同志的文章。本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政法學院「教學簡報」第九期上登載了一篇陳光中、時偉超兩同志所寫的「關於刑事證據分類與間接證據的幾個問題」一文，對本刊以上三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我們已將此文分送以上三同志，並已得着了覆信。郝双祿同志來信說：「其中所持觀點我基本同意」。胡復申、戈風兩同志還提了些新的意見。我們認為他們所爭論的問題，在蘇聯的先進法學理論上已取得了結論，似乎我們不應該再把很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这样的問題上，所以我們只將後兩同志的意見送陳、時兩同志，讓他們相互間作個別的討論，本刊就不再為發表。讀者如有興趣，請參考北京政法學院「教學簡報」第九期。



# 我國訴訟制度中實行

## 民族語言原則的重要意義

時偉超 楊蓉馨

訴訟中實行民族語言原則是社會主義類型國家民族政策在司法制度中的表現，所以在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裏，才能實現這一「民族平等」的原則。憲法第三條指出，各民族一律平等，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第七十七條規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人民法院對於不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當事人，應當為他們翻譯。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雜居的地區，人民法院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審訊，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佈判決書、佈告和其他文件。」這是新中國人民法院組織與活動的基本原則之一，這是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革命鬥爭勝利成果之一。

同時只有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國家才願意真正實行訴訟中的民族語言原則，它是根據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總任務——鞏固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權利方面的平等，實行區域自治，逐漸發展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幫助落後的民族提高到先進民族的行列，共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所制定的，因為要達到鞏固祖國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就必須使各民族權利平等，而訴訟中的民族語言原則正是保證各民族在一切權利平等方面的一個重要環節。

在舊中國反動統治的歲月裏，反動統治階級把少數民族作為壓迫與掠奪的對象，把中國變成了各民族的牢獄。因此，根本否認少數民族在政治上、訴訟上的地位，不給予平等的訴訟權利。我們知道，在舊中國反動統治時期，各民族之間經濟聯繫的主要形式是當時漢族地區日用工業品（布、鹽、耕具等等）與少數民族的畜產品、土產品（皮毛、腸衣、桐油、貴重藥材如麝香、鹿茸等等）的交換。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及大富商們，乘此機會就對少數民族進行大肆欺騙性的掠奪，其犯罪手段有：不等價交換，如解放前少數民族的鄂倫春人以一架三斤重的鹿茸只能換二百斤小米（解放後可換到四千斤小米），低價欺騙收買，大秤入小秤出，慘酷剝削，更惡劣的是利用少數民族居住深山，不了解

市面「惡性通貨膨脹」、物價波動、「鈔票似冰」的情況，騙子手們用過時不值錢的偽法幣、金圓券，進行血腥的掠奪，而少數民族對此實在忍無可忍發生爭執時，即使能到反動法院控告，但語言不通困難重重。偽法院組織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法院為審判時應用中國語言」（實際上國民黨指的是漢語），實際上偽法院並不為少數民族的當事人設立翻譯，因此少數民族人民的訴訟權利就無法得到保障，何況其法官正是這些強盜的走狗呢！再加上國民黨法院那套「繁瑣遲緩」「刁難人民」的訴訟程序，更使少數民族有冤莫伸了。如在解放前，貴州桐梓山區苗族同胞常出售桐油給貴陽大桐油商們，一次曾被訛詐賤低價格而起訴到偽桐梓地方法院，因不通語言，不懂「法律」，不能「舉証」而遭到「敗訴」的結局。至於少數民族的人民成為刑事「被告」時，多是被蔣匪苛捐雜稅、拉兵徵糧及地主剝削不能聊以爲生的人們，他們為活下去有時對地主富豪或反動政府進行反抗，而被國民黨軍隊及地主武裝圍剿逮捕，按「盜匪」加以鎮壓治罪。試問對這些無辜的兄弟民族，反動法院能不想到了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而給予翻譯的幫助，使之充分得到辯護的機會呢？顯然是不能的！他們是被鎮壓的對象，反動的法官審問他們時是用「漢語」並強迫他們用不熟悉的「漢語」回答問題（這是指各民族雜居區粗通漢語的兄弟民族），如果實在一句不懂，則反動法官叫當地略通少數民族語言的偽法警解釋幾句，即行定案而判重罪。因此他們的人身自由與訴訟權利是絲毫得不到保障的！

同一剝削類型資產階級國家的法院，其訴訟制度同樣反映民族歧視壓迫與不平等這一特徵。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法院，特別是宗主國在殖民地設立的法院，其審判時一般均以佔統治地位民族的語言進行訴訟，即所謂採用「國語制」。如意大利一九三二年訴訟法規定：「法院審理案件應用意大利文。」法西斯恐怖統治的美國對黑人的審判，黑人必須用「英語」進行辯論，根本不容許說其他語言，否則將遭到不利的判決。而在沙皇時代的俄國，民族眾多，但法律同樣規定一切法院內均用「俄語」進行訴訟。應該指出：問題的階級實質在於採用「國語制」對訴訟中不通曉所謂「國語」的勞動人民是最為不利的，因為這些資產階級國家少數民族底勞動羣衆不懂得「國語」。歸根到底，剝削階級的表現，是資產階級實現其民族壓迫與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之具體措施。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蘇聯勞動人民勝利地掌握了政權，實行了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消除了民族壓迫，在訴訟上史無前例的規定了「訴訟程序應當用本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或者自治省的語言進行，保證不懂這種語言的當事人能夠經過翻譯完全明瞭案件材料，並且有權用他本民族的語言在



法院講話」的原則。列寧在「民族問題提綱」裏教導我們說：「……社會民主黨不承認『國語』。」斯大林在「論黨在民族問題上的當前任務提綱」中同樣作了如下指示：「……由懂得當地居民日常生活與心理的本地人來組成自己的法院，行政機關，經濟機關和政權機關，並用本族語言進行工作。」由於蘇聯共產黨及偉大的革命導師們一致認為訴訟語言問題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因此訴訟中民族語言原則已成為蘇維埃國家一項憲法原則，規定在蘇聯憲法一一〇條，並且蘇聯最高法院經常監督這條憲法規定的切實實現。各級法院對任何案件的处理，違反了這一原則，其判決都將被廢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對法院用民族語言進行訴訟的問題早已重視。遠在一九三四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四條及一九四一年「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十七條中均規定實行民族平等的原則。審判機關本此精神就給予少數民族在進行訴訟時有使用民族語言文字的权利。當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先於「共同綱領」第九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據此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所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九條及前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數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權利的決定」第五項均規定各兄弟民族在法庭上以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必要時，人民法院應為之設立翻譯等等。這說明黨及政府深切關懷着少數民族在訴訟上的平等權利。現在又把它更確切具體的規定在我國憲法第三條、第七十七條及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六條上，使它不僅成為一項重要訴訟原則，並提到憲法原則的高度。

人民法院訴訟活動中實行民族語言原則其巨大的意義是在於：

一、此原則保障了少數民族能够平等地享受一切訴訟權利：首先保證刑事案件被告辯護權的徹底實現，因為僅規定被告人有權進行辯護，如他不懂訴訟上使用的語言仍是空洞規定，只有切實實行了這一原則，少數民族的刑事被告，在人民法院內進行訴訟時才能充分獲得辯論的機會，反駁對方的控訴，說明自己無罪或罪輕。其次在民事案件中，少數民族的原告與被告，則可以通過這項原則更好地保護被侵犯或被爭議的民事權利。

由於新中國司法建設事業中貫徹民族平等政策的方針，少數民族聚居區或多民族雜居區的人民法院，選拔了少數民族幹部參加工作，他們懂得當地兄弟民族的語言習慣，使兄弟民族便於獲得真正的訴訟權利。黨及政府這種英明的措施受到各兄弟民族極大的歡迎。如內蒙古自治區河套行政區狼山縣（多民族聚居區）一位蒙族同胞說的好：「過去反動黑暗的歲月裏，法院是國民黨的，『札拉卡』（打官司之意）是『有理茶三塊，無理三塊茶。』法院裏連一個蒙族的『畢切也其達拉卡』（書記員）也沒有，不通漢語有冤也沒法伸。現在我們头上的石頭被搬掉了，政府裏有本族人，我們有事就敢到縣裏來了，這都是毛

主席領導得好。」又如烏蘭查布盟忠厚聯合旗的蒙族羣眾反映：「過去反動統治時期，反動政府裏蒙族連一個幹科長的都沒有，現在我們族的人被選當人民政府主席，在法院裏甚至『好仁達拉卡』（院長）居然有蒙族人啦！他們辦事了解我們的風俗習慣。現在法院裏又能使用蒙族話爭論是非，太方便啦！真是作夢也沒想到。」

因此生活在新中國的各兄弟民族勞動人民，讚美着自己偉大光明的時代，歌頌着幸福民主的生活：「毛主席啊！大恩人，政府法院啊！都選有蒙族的人。」

二、此原則保證審理案件能符合客觀真實情況：少數民族地區人民法院執行審判任務時，固然在訊問上運用當地通用語言才能把案件案情問明白，並且為了搞清楚案件實際情況，法院幹部非用羣眾路線的工作方法進行深入調查了解不可。那麼在少數民族地區法院工作的每一幹部都必須通曉當地民族語言及該民族的風俗習慣，才能深入羣眾得到案件真實情況的反映，也就是說：用當地民族語言完成「調查」等項重要訴訟行為，以求最後作出正確的判決。由此得出結論：民族語言原則不僅是實現民族平等的原則，也是保證少數民族自治區及各民族雜居區人民法院之審判人員順利地執行審判工作，並使案件之解決更符合客觀真實情況的重要條件之一。

三、此原則保證人民法院實行公開審判之目的的徹底實現：因為只有在少數民族聚居區或多民族雜居區運用當地通用語言進行審訊，才能使所有出席法庭的人正確地了解案件審訊的內容和結果，受到法紀教育，才能起預防刑事犯罪及民事糾紛的作用，同時只有貫徹這一原則，少數民族地區人民法院的工作，也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羣眾的監督。在司法實踐裏是有不少例子可以說明這一問題的：如一九五一年在一個多民族雜居區，有一個兄弟民族的公民，因放火燒林園捕野獸，而引起森林火災。該地人民法院一方面對放火人予以適當的懲罰，另一方面針對這一事件通過公開宣判的方式，對出席法庭的各族人民，用當地通用的語言講明政策，指出各族人民均應遵守國家法律，嚴禁放火燒山，加強團結，保護祖國的資源財富。這樣一來各族人民深深受到教育，提出保證要嚴防火災，自覺訂立防火制度，並在政府的領導下組織了護林隊，果然幾年來再未發生森林火災。並且聽到這樣反映：「感謝毛主席教育我們的人改正了錯，知道怎麼作，這樣我們才有光明的道路。」通過這一事實生動地說明法院如不使用當地民族通用語言進行審判工作，那能收到如此良好結果呢！它不僅保證人民法院對公民法紀宣傳教育任務的實現，同時，使法院審判也配合了黨及政府民族政策的宣傳教育工作。

綜上所述，訴訟制度中採用民族平等的民族語言原則，為社會主義類型國家的階級本質所決定，也即是為我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性質所決定，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書刊  
評介

# 介紹「蘇維埃勞動法教程」

關 懷

亞歷山德洛夫著

蘇聯國家法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出版

李光謨、康寶田譯 沈其昌校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出版

勞動法是調整社會勞動關係的法的部門，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內它具有不同的性質和作用。

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法是鞏固資本家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它直接地實現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和血腥的鎮壓，它是無產階級的枷鎖和桎梏。

與資本主義國家勞動法所根本對立的是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勞動法，過去被用來維護剝削的工具而破天荒第一次成為了消滅剝削的工具，成為了調整與鞏固社會主義勞動關係和社會勞動組織的有力武器。

蘇維埃勞動法在蘇維埃社會主義法的體系中一直是佔着重要地位的，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日子裏，蘇維埃政權即迅速地頒佈了許多重要的勞動法令，例如革命勝利後的第五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頒佈了「關於八小時工作制的決議」，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月期間又作出了「關於社會保險的決議」，這兩個著名的決議，保證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朝夕渴求而不能得到實現的八小時工作制及社會保險制度的切實實現。接着不久，年青的蘇維埃國家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頒佈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保護勞動者利益的「蘇維埃勞動法典」，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又頒佈了「蘇俄勞動法典」。這些勞動立法方面的偉大貢獻，蘇聯共產黨及國家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共

（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對於一九一八年的「蘇維埃勞動法典」曾作出詳細的論述，認為這一勞動法典所規定的各種規範制度，標誌了社會主義政權已經完全地實現了勞動保護的最低綱領。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九屆全俄工農兵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常會上，列寧稱讚一九二二年所通過的「蘇俄勞動法典」是蘇維埃政權的偉大成就。僅僅從蘇維埃國家創立初期這一系列的勞動立法活動來看，便可以充分地了解到蘇維埃勞動法是如何地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幾十年來蘇維埃勞動法已經有了很多的發展，也積累了創造了許多寶貴而又豐富的經驗，為了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我們應該很好地學習蘇維埃勞動法科學。

「蘇維埃勞動法教程」一書的翻譯出版，在幫助我們學習與研究蘇維埃勞動法來說確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它將幫助我國政法工作者、勞動工作者、工會工作者們更好地了解蘇維埃勞動立法的原理和經驗。

「蘇維埃勞動法教程」全書共分為總則、分則兩大部分，共十五章。它是蘇聯高等教育部所審訂的法學院和綜合大學法律系的教科書，法學博士亞歷山德洛夫教授以豐富的內容對於蘇維埃勞動法作了全面的深刻地論述。

在總則部份闡明了蘇維埃勞動法的對象、體系、基本原則、歷史、調整勞動關係的規範性文件以及社會主義勞動法律關係等重要問題。精闢地分析了蘇維埃勞動法的特點和作用，同時也尖銳地揭

發和批判了資本主義反工人立法的本質，使我們明確地体会到蘇維埃勞動法的無比優越性。

亞歷山德洛夫教授從歷史的角度用較多的篇幅詳細地研究了蘇維埃勞動法的發展過程，為了使人們更好地了解蘇維埃勞動法的產生和發展，首先還概括的介紹了革命前沙皇時代俄國反動的勞動立法情況，然後針對蘇維埃國家每一歷史時期的勞動立法都作了透徹的分析，我們可以對蘇維埃勞動法在不同階段的變化、發展與特點得到清晰的認識。在蘇維埃國家發展的第一階段，蘇維埃勞動法的任務是組織和鞏固社會主義勞動關係並限制尚未完全消滅的資本主義的勞動關係，在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鬥爭中，蘇維埃勞動法都起了偉大的作用，這一階段的勞動法歷史對於我國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

分則部份以很大的比重論述了工人、職員勞動關係的法律調整，具體的分析了勞動合同、集體合同、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工資、勞動保護、勞動紀律、勞動爭議解決程序、國家社會保險以及機器拖拉機站勞動者勞動關係的調整等勞動法律制度。

社會主義的勞動合同是吸收職工參加工作的基本形式，它保證了職工不受剝削而實現自己的勞動權利，是蘇維埃勞動法主要制度之一。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合同則成為了具有強制剝削性質的僱傭契約，資本主義國家法的體系中把這種關係與買賣契約一樣看待，他們用調整財產關係的民法來調整僱傭關係，「拿破崙法典」即把這種關係列為財產租賃關係的一種，認為是勞動力的租賃而與物的租賃、畜類的租賃平列一起。在「德國民法典」以至於國民黨反動的「六法全書」，統統都把僱傭關係納入民法規範，這表示了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人格歧視與侮蔑，同時他們也企圖藉此從法律上把這種血淋淋的剝削關係披上「契約自由」的外衣，以



掩飾其剝削實質。社會主義的勞動法則完全不同，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勞動合同不再隸屬民法規範來調整，而是勞動法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在勞動合同這一章內亞歷山德洛夫教授闡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勞動合同的特點、內容、訂立勞動合同的一般程序，同時也研究了有計劃地統一招募工人時勞動合同及對各種學校畢業生的分配工作與錄用等問題，還特別着重地探討了工人、職員的調動工作、辭退工作等制度，這些對於我們在實現勞動力的組織、調配方面確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工會組織與企業行政共同締結集體合同是完成與超額完成生產計劃及不斷提高職工文化、物質生活條件的有效方法，我國目前也正在逐步推廣這一制度，「蘇維埃勞動法教程」在集體合同制度方面也作了許多的介紹，關於集體合同的簽訂程序、履行情況的檢查，和對違反集體合同時所應負的法律責任的分析，對於我們推廣集體合同制度會有很大的幫助。

關於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工資、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等制度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也都是極端值得重視的問題，解放以來在我們的企業生產中已經建立了許多正規制度，但是有不少的制度仍然很不健全，例如對於加班、加點的限制與管理，對於女工的勞動保護條件等方面，還都是應該深入研究的問題，亞歷山德洛夫教授在這些具體制度方面都作了非常詳盡地闡述。

勞動紀律是組織社會勞動的基礎，是進行社會勞動的必要制度，也是保證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必要條件，馬克思曾指出：「一切直接社會的或共同的較大規模的勞動，都多多少少地需有一個指導，以便使個人的活動得以調和，使那種由生產總體運動（與其獨立器官的運動相別而言）發生出來的一般機能，得以履行。提琴演奏者可以獨展所長，一個

樂隊却不能不有樂隊長。」○這就充分地指出了企業生產中建立鞏固的勞動紀律與秩序的必要性。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為了徹底實現社會主義必須把鞏固勞動紀律的工作經常化。劉少奇同志在全國工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曾強調指出，為了完成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我們必須對工人羣衆加強共產主義的教育，提高工人羣衆的覺悟程度，……反對官僚主義，反對破壞勞動紀律的各種現象，大大地鞏固勞動紀律。」○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四日我國已公佈了「國營企業內部勞動規則綱要」，而且已取得很大成績，但是還應該使鞏固勞動紀律工作更加深入和經常化。「蘇維埃勞動法教程」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培養勞動者自覺自願的紀律，如何與違反勞動紀律現象作鬥爭，介紹了蘇維埃國家在貫徹說服教育與強制相結合原則下所採用獎勵制度、紀律處分、物質責任的經驗。

由於社會制度的根本改變，在蘇聯不可能產生由階級矛盾而引起的勞動糾紛，列寧在論及職工會在新的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與任務時，曾分析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爭議的發生是由於無產階級國家中官僚主義分子的曲解而侵犯了職工的利益，或由於勞動者政治落後與文化落後而引起爭執，是由於資本主義思想的殘餘影響而發生，它和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的對立和衝突根本不同；由於性質不同以及勞動爭議本身與企業生產有着密切的連系，因之蘇維埃勞動法採取特殊的程序，利用協議程序、審判程序、隸屬程序等不同方式來處理勞動案件。這種解決勞動爭議的办法，也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

除了對職工勞動關係的法律調整作了系統的研究以外，在本書的最後部份，介紹了蘇聯工藝合作勞動組合勞動關係的法律調整，闡明了工藝合作勞動組合的工資報酬、社會保險等制度，這對我們在實現各種生產合作社勞動關係的法律調整則具有很

大的意義。

蘇聯共產黨中央一九五三年九月全會和一九五四年二月——三月全會所擬定的大力提高農業生產的計劃中，對於加強機器拖拉機站的工作給予了高度地注意，因之勞動法科學也必須加強對機器拖拉機站工作者勞動條件法律調整的研究，但是過去這方面作的非常不夠，以前出版的蘇維埃勞動法教科書，例如一九四九年版、一九五〇年版、一九五二年版都沒有涉及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因之曾受到過蘇聯科學界的批評，在亞歷山德洛夫教授的這本著作中則對這一問題作了專門的研究，這確是蘇維埃勞動法科學中新的成就。

在編寫這部教科書中，亞歷山德洛夫教授對過去的某些自己的論點曾作了正確的修正和補充，所以這本教科書比較過去的勞動法教科書的確有很大的進步，例如在論述社會主義制度下公民勞動權利能力問題上，在一九五〇年蘇維埃勞動法教科書中，亞歷山德洛夫教授曾把蘇維埃勞動法規定兼職工作應遵守的條件，和由於近親屬關係存在而不得在同一个國家機關（企業）內擔任有隸屬性、監督性職務看成對公民勞動權利能力的限制；這種論點曾受到其他法學家的批評，認為應該都看作為是公民實現勞動權利能力時應該遵守的條件，亞歷山德洛夫教授在本書新的著作中已採納了這種意見，這都可以看出本書是綜合了許多學者的寶貴意見的，這也就保證了這本教科書有較高的質量。

總的來看，「蘇維埃勞動法教程」不僅是一部好的勞動法教科書，而且也是一部學習蘇聯勞動組織和勞動關係法律調整先進經驗的寶貴讀物，他對我們的勞動立法工作和實際工作將有很大的幫助。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三九六頁。

○「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主要文件」，工人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三頁。



# 法律出版社出版

## 人民陪審員手冊(增訂本)

布拉圖斯著

本書扼要地論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法的學說，並簡明而中肯的介紹了蘇維埃刑法、民法、勞動法、集體農莊法，以及蘇維埃法院組織、刑事訴訟、民事訴訟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對蘇聯法院辦理各類案件的基本程序和實際作法，也着重的作了生動而具體的敘述。本書是蘇聯司法工作人員，尤其是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學習業務知識的主要參考書籍。

原書在蘇聯已出了三版，極受讀者歡迎。本版中譯本是根據蘇聯國家法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最新出版的增訂第三版原文譯出的。這個新版本由蘇聯法學家 H. C. 布拉圖斯等九人集體編寫而成，並經 П. И. 庫德利亞符采夫審定，比五年前(一九五〇年)出版的第二版在內容方面，作了很多重大的補充和修正，並增加了四萬多字的篇幅。本書寫得深入淺出，使人易讀易懂，便於初學，其着重寫辦案的程序和具體作法之處，尤其是本書的特色，且寫的非常提綱挈領，明白曉暢，又總結了工作中的實際經驗，對從事司法工作的同志，頗有幫助。在這次增訂版內關於法律名詞上又經過仔細校訂。

全書共約二十三萬字，是我國各級司法工作人員尤其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方面不可缺少的讀物。  
(即將出版)

## 蘇俄民法典

蘇俄民法典是自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施行的，隨着蘇維埃國家的發展，也相應地作了些補充、修正，並廢除了一些條文。

本民法典分總則、物權、債、繼承等四編，並附錄有蘇俄民法典施行法。這是蘇維埃國家解決一切民事糾紛——一切所有權問題，國家機關、企業、團體和公民間的財產關係問題，和某些人身關係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也是研究社會主義民法科學的法律根據。它在我國民事關係日益發展的今天，對解決實際糾紛、科學研究和民事立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學習和參考材料。  
(排印中)

## 蘇俄刑法典

蘇俄刑法典是由第十二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並根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從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二十多年來，已作過許多次的補充和修改。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法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俄文版譯出，書中的條文是根據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以前歷次有關的法令補充和修改過的。

本書還附有「對於蘇俄刑法典中若干條文的補充資料」。

本書可供我國立法工作人員、大學法律系教學、司法工作幹部參考之用。(排印中)

## 蘇俄民事訴訟法典

定價：0.80 元

蘇俄民事訴訟法典是蘇聯現行法典之一，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施行，以後並作了一些補充、修正，並廢除了一些條文。

本民法典共分五編，分別規定了：民事訴訟的總則；一般訴訟程序；特別程序；上訴和再審；以及判決和裁定的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頒佈以後，解決訴訟程序問題已成為當前司法界的重大任務之一，茲特譯出此書，以供需要。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法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的新版本重新譯出，譯文不僅力求忠實，而且力求通順，名詞用語亦經反覆校訂，以便於廣大司法工作人員和理論工作人員的閱讀和研究。

# 新華書店發行



